

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革命文集

A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ings



Table of Contents

项目简介	1.1
关于本书	1.2

Content

克鲁泡特金：生平和学说的意义	2.1
克鲁泡特金的一生	2.2
《反抗精神》的摘要	2.3
《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基础和原则》的摘要	
I	2.4.1 2.4
II	2.4.2
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补充说明	
《一个叛逆者的话》后记摘录	2.5 2.4.3
《无政府主义道德》的摘要	2.6
I	2.6.1
II	2.6.2
III	2.6.3
IV	2.6.4
V	2.6.5
VI	2.6.6
VII	2.6.7

VIII	2.6.8
IX	2.6.9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和理想》的摘要	2.7
《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的摘要	2.8
无政府主义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	2.8.1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之前的革命	2.8.2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	2.8.3
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公社	2.8.4
巴枯宁与国家	2.8.5
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观点	2.8.6
劳动报酬	2.8.7
无政府主义与法律	2.8.8
经济法	2.8.9
行动手段	2.8.10
结论	2.8.11
《法律与权威》的摘要	2.9
I	2.9.1
II	2.9.2
III	2.9.3
IV	2.9.4

《监狱及其对囚犯的道德影响》的摘要	2.10
监狱是一所犯罪学校	2.10.1
监狱的徒劳	2.10.2
监狱内外的罪犯	2.10.3
监狱劳动	2.10.4
断绝社交关系的影响	2.10.5
意志力理论	2.10.6
监狱服装和纪律的影响	2.10.7
狱警	2.10.8
我们该如何处理违法者？	2.10.9
犯罪原因	2.10.10
物理原因	2.10.11
生理原因	2.10.12
社会原因	2.10.13
如何治愈罪犯？	2.10.14
总结	2.10.15
《革命政府》的摘要	2.11
议会	2.11.1
独裁统治	2.11.2
革命政府的无能	2.11.3

《俄罗斯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摘要	2.12
致西欧工人的信	2.12.1
怎么办？	2.12.2
《呼吁年轻人》的摘要	2.13
致“知识分子”	2.13.1
致医生	2.13.2
致科学家	2.13.3
致律师	2.13.4
致工程师	2.13.5
致教师	2.13.6
致艺术家	2.13.7
你能做些什么	2.13.8
致工人阶级青年	2.13.9
关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文章的说明	2.14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	2.14.1
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无政府主义	2.14.2
克鲁泡特金革命、历史和社会学著作部分书目	
英语小册子	2.15.1 2.15
其他语言	2.15.2
面包与自由	2.15.3

伦理	2.15.4
田野、工厂和车间	2.15.5
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2.15.6
互助论	2.15.7
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2.15.8

无政府主义：革命文集

开始阅读：【[在线版](#)】【[下载版](#)】

0x00 如何阅读

- 【PC/手机】用户均可从这个链接[直接阅读](#)
- 【手机】用户若加载时间过长，也可以阅读纯文字版：
 - [注册](#) 一个 Github 账号
 - 点击此项目仓库([ACRW-web](#))右上角的 **Star** 和 **Fork** 按钮
 - 从 Google/App Store 搜索并安装 APP 【Github】并登录
 - 在【仓库】中找到 [ACRW-web](#)，点击打开
 - 点击【浏览代码】可打开仓库文件，在路径 `gitbook/markdown/zh` 下即为各个章节的内容
- 希望热心的读者能积极参与纠错、反馈阅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电报群：[未竟共同体](#)

0x10 内容预览

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

革命文集

A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ings



0x20 项目简介

这是《无政府主义：革命文集》WEB版的汉化项目，也是[re0-web](#)的一个fork。全书的完整汉化流程包括：

1. 翻译（英 -> 中）
2. 润色（使得上下文表达语句意思更贴近中文环境）
3. 校对（专有名词修正、所有章节一致化）
4. 编排（文档格式）

这是一个知识开源计划的项目。翻译环节用的是[电子书翻译器 \(ETCP\)](#)的自定义引擎(DeepL+自定义词汇表)，润色和校对环节用的是Qwen2-Instruct，但每个环节同样**需要每个读者的参与和反馈**（欢迎随时提issue/开discussion）、优化排版和修复注释链接（欢迎直接pr、私信、加群讨论译法）。

更多翻译详情请见[汉化电子书经验谈](#)

当一个文本与真理和信条等同，当它无需意义的中介而在自己的字面上成为“真正的语言”，这个文本就具备了无条件的可译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是因为语言的多样性而需要翻译。

——瓦尔特·本雅明《译作者的任务》

为了提供高质量的机翻文本作为开源翻译的基底，本项目参考了拉黑字幕组译作中的用语习惯，制作出上千行的自定义词汇表以确保专业术语的翻译准确性，而非[沉浸式翻译](#)那种无脑机翻。在对比过谷歌翻译、DeepL和各种语言模型之后，最终选择用DeepL初翻+Qwen2.5修复润色+Python排版+人工校对的方式生成了可读性较高的翻译结果。

“只要眼睛多，bug容易捉。”

——埃里克·雷蒙《大教堂与集市》

在未来，绝大多数商业公司/出版社所采用的“大教堂”模式将被开源世界采用的“集市”模式所取代。这个变革不应局限于软件行业，也应燎原于文化领域。让书友们像程序员给软件源代码排错那样，来校对自由开源的电子书吧！

0x30 相关资源

- 本书相关
 - 中文资源
 - [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
 - [上帝与国家-巴枯宁](#)
 - [无政府主义精选文库](#)
 - [【人物访谈】美国安那其——大卫·格雷伯](#)
[伯](#) [《熟肉 | 去广告 | 附书单资源》](#)
 - 英文资源
 - [Anark](#)
 - [Zoe Baker](#)
 - [Andrewism](#)
 - [Srsly Wrong](#)
 - [The Skeptical Leftist](#)
 - [Post-Anarchism and Psychoanalysis with Duane Rousselle](#)
 - [Radical Reviewer](#)
 - [The Anarchist Library](#)
- 翻译相关

- Re0: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WEB 版)
- 电子书翻译器 (ETCP)
- 翻译的现代性: 译者任务、机械复制时代与文本星丛 S2EP24 - 例外状态 State of Exception
- Vol 27 “翻译”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 - 歧义 Disagreement
- 李新雨 | 翻译之为精神分析家的任务
- 《译作者的任务》瓦尔特·本雅明
- 《汉化电子书经验谈》安娜提戈涅

0x40 许可证和版权

代码基于GNU通用许可协议第三版发布：[GPLv3](#)

这是自由软件：你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新发布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提供任何保证**。

翻译内容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保持署名—非商用—相同方式共享）：[CC BY-NC-SA 4.0](#)

允许修改和无通知转载，请附上本仓库链接及本声明，**禁止商用**。

0xF0 致开发者

此项目是利用 [Honkit](#) 搭建的，同时兼容在 [Github Pages](#) 和 本地（线下）运行。

关于 本地 环境的搭建可见 [honkit-docker-support](#) 的说明

本多佛版本于2002年首次出版，是对纽约先锋出版社1927年出版的原初作品《克鲁泡特金革命小册子》的未删节、略加修改的再版。多佛尔出版社于1970年首次出版了这部作品，书名与此相同。多佛版导言由罗杰·N·鲍德温（Roger N. Baldwin）为1970年版撰写。

小册子编辑说明

克鲁泡特金他在无政府主义教学领域的工作是通过廉价的小册子普及的，几乎所有欧洲语言的小册子都卖到了几十万册，还有中文和日文。他只写过几本这样的小册子。更多不同的小册子主要是文章和演讲的重印本，他根据无政府主义宣传的需要对这些文章和演讲进行了改编。

这些著作文风朴实，呼吁行动的声音响彻云霄，同时还以严密的推理和生动的插图吸引读者。它们满足了工人的需要，即对那些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使命、反对诉诸政治方法或工人阶级政党实行国家专政的人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处理。他们唤起了自由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在营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专制势力中发出了战斗的号角。

这些小册子最初用法文或英文出版，更多时候用法文，因为它们所摘录的文章或演讲大多用法文。少数小册子用俄文撰写。克鲁泡特金用这三种语言写作。他的大部分科学文章和大型著作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小册子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拉丁语和英语国家发行量最大。日文版的发行量也大得出奇。

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全世界的激进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涉及战前状况的小册子兴趣大减。这些小册子在各地的发行量都有所下降。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也因追随者之间的分歧、共产主义作为更强大的战斗力量的出现，以及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巩固和迫害下战斗力的普遍消沉而在数量和活力上有所下降。无政府主义的各类出版物也相应减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瑞典和德国出版了许多克鲁泡特金的著作，1926年出版了一份涵盖五百多种语言的完整书目。

这些小册子所代表的远不止克鲁泡特金时代的革命斗争阶段。在向社会主义经济长期过渡的混乱冲突中，这些小册子为思想作出了持久的贡献。为了呈现这些思想的精髓，我们将这些小册子编辑成书，只删去不再相关的参考文献和插图，以及当前不感兴趣的有争议的材料。除了这些删节、对措辞和标点符号的改进以及更好的翻译之外，这些小册子都是原汁原味的。

这里重印了所有用英文出版过的小册子，只有四本除外，它们是：《巴黎公社》，其中涉及的一个事件，克鲁泡特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到过；《战争》，这是一篇现在已经过时的小论文；《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进化中的地位》，其中重复了这里印刷的其他材料；以及《国家及其历史作用》，这本书已经出版（见第302页）。作

为《面包与自由》各章重印本的小册子也被省略，这些小册子现在已有书本形式。除了收录以前用英文出版的所有这些小册子外，还增加了两本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反抗精神》和《监狱及其对囚犯的道德影响》。其他语言的小册子中没有任何材料能为介绍克鲁泡特金的革命思想增色。

这些小册子的编排清晰而全面地展示了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教义。他的著作涵盖了经济、政治、法律、国家、犯罪处理、革命和科学等如此广泛和多样的领域。作为附录，还收录了《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大部分文章，作者是克鲁泡特金。它的客观论述对那些希望随时参考整个运动的历史和各个方面的最佳简述的人很有意义。

在此，我要感谢阿诺德·罗勒（Arnold Roller）的帮助和建议，他翻译了本卷中出现的《起义精神》部分，并一直耐心地提供建议和编辑意见。

ROGER N. BALDWIN 1927

引言

多佛版我编纂这些小册子已经有四十年了，其中大部分小册子首次面世也有四十年了。然而，对于权威与自由之间的持久冲突、人权以及平等和公正社会的古老理想而言，它们的哲学思想仍然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克鲁泡特金对人类实现这样一个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似乎有些天真。但是，即使在这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代，也不乏支持这种信念的证据。个人自由、自愿结社和民主控制权力仍然是政治思想和实际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多年前，我对这些原则的信念吸引了克鲁泡特金的写作，并促使我将这些零散的小册子编辑成书。当时我正在从事社会和政治改革，寻找权力、胁迫、贫困和不平等的公正问题的答案。我曾探究过马克思的救世福音，并将其视为僵化和异化的教条而加以摒弃。然而，克鲁泡特金提供的不是教条或革命蓝图，而是工作原则，其本身就像金科玉律或耶稣伦理一样具有革命性。像托尔斯泰一样，他把这些原则称为无政府主义——具有非基督教的认可。

我从未接受整个学说，也没有给自己的信仰贴标签，我只是从哲学中汲取了与社会正义目标的实际方向相关的东西。

我发现这些原则适用于克鲁泡特金时代以来的许多世界历史。革命结束了欧洲对臣民的殖民统治，给他们带来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尊严，这无疑与自由的发展是一致的，尽管自由是以强制政治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随着革命的到来，种族平等得到承认，白人优越感下降，从而为建立各民族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克鲁泡特金的原则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殖民地人民的臣服问题，但却与态度和权力的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性变化相吻合。同样，妇女解放——与的思想不谋而合，今天呈现出全世界合法参政的景象——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只是程度较轻而已。

尽管它是目前最不可能遵守或执行人权的政府的产物，但它规定了“每个人”反对滥用权力的权利。它提出了权力与自由的老难题，但至少世界上有了第一部关于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法典。

无论人们如何猜测克鲁泡特金对其时代以来的事件的影响，他在世界各地的精英圈子里仍然拥有相当多的读者。与这些小册子不同，他的大部头作品被广泛翻译和发行（互助论、面包与自由、《伟大的法国大革命》等）。

与他的主要对手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不同的是，他没有有组织的追随者，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仍然是一些革命运动的标志，尤其是在西班牙和那些自称为工团主义者的工人阶级圈子里。无政府主义，只要它曾有过任何有组织的表达，就几乎消失了。

1967年访问苏联时，我对克鲁泡特金所获得的承认感到震惊，而这是由一个独裁政权代表了克鲁泡特金所憎恶的一切的政府所给予的承认。这可以解释为俄罗斯人对一位伟大的反沙皇革命家、世界著名科学家、社会批判和理想主义作家的敬意。必须指出的是，克鲁泡特金把他的思想体系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他与马克思一样，都认为要废除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列宁说：‘当国家存在的时候，我们就谈不上自由。当我们能够谈论自由时，就没有国家了’。”

但不仅如此，正如我在《克鲁泡特金的生平事迹》一书中所述，他还得到了列宁的个人崇拜，以至于列宁专程到他的乡间别墅拜访他。列宁钦佩谁，共产党人就不能拒绝谁。因此，我在莫斯科发现，除了共产党领导人之外，他的地位高于所有俄罗斯人，有一个地铁站以他的名字命名——显然是最高的荣誉，还有一条大道、一条街道和一个村庄。他的出生地是一座坐落在小公园里的漂亮房子，上面挂着一块铜牌。

但它的另一个特点是，我相信它的用途会让克鲁泡特金感到高兴。它由美国大使馆租用，经过全面翻修后成为一所英语儿童学校，在我1967年访问时刚刚开学。我自己也很高兴。四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我曾作为克鲁泡特金夫人（他的遗孀）的客人在这所房子里住过几个月；那是在他去世后不久，他葬礼上褪色的花圈仍作为纪念品保存在房子里。

后来，我给孩子们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讲述了我在那所房子里了解到的克鲁泡特金的童年生活，以及他是如何在12岁时就放弃了王子头衔，以便更贴近平民百姓的。我告诉他们，在俄国和长期流亡海外期间，他始终为每个人争取更大的自由而奋斗的，又是如何在革命结束后回家赴死的，又是在一个严冬的日子里，从他们读书的那所房子里开始举行盛大的葬礼，把他送回他最后的家的。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这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人身上所体现的自由精神，他的铜像是他们学校的标志——也许就像一些读过这些小册子的人一样。

罗杰·N·鲍德温

纽约1970年1月

克鲁泡特金：生平和学说的意义

反对俄国沙皇的革命运动在长达百年的斗争中唤起了城市青年的理想主义。数以千计的职业阶层青年男女冒着职位、职业机会和家庭关系的危险，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革命和教育宣传，后来又参与了反对政府的秘密阴谋。其中有数百人被绞死或流放。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迫害下，他们的宣传活动持续了数年之久。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沙皇，工人和农民夺取了政权和财产。

克鲁泡特金，他就是在这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为废除农奴制和建立立宪政府而激烈呐喊的年代。他出生于莫斯科旧贵族家庭，曾在皇帝的宫廷中接受侍从训练，20岁时成为一名军官。人们发现他在圣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而他的一生大概都献给了科学地理学，这引起了轰动。他被捕入狱，未经审判。他一下子成为革命事业中最受憎恨和最受爱戴的代表之一。他是极少数投身革命的贵族之一，他的家族关系和宫廷训练使他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圣彼得堡的堡垒监狱中被监禁一年后，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戏剧性地越狱，之后在英国找到了避难所。四

十二年来，他几乎过着流亡生活，主要在英国从事科学研究和无政府主义宣传。1917年克伦斯基革命后，他以七十五岁的高龄返回俄国。

但他对建立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革命并不热衷，尤其是在一个政党独裁统治之后。然而，他却以深邃的目光看待革命。他认为革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就像台风一样”，他等待着革命耗尽它的力量，通过农民协会和工人协会的自由合作开始真正的重建。

四年后，他在离莫斯科几英里远的乡间小别墅里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继续撰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他的家人和朋友拒绝了政府提供的国葬，因为这有悖于他的原则。苏维埃政府把他出生的老贵族区的房子交给了他的朋友们，作为他的书籍、论文和遗物的博物馆，并为他重新命名了莫斯科的一条主要街道，以纪念他为俄国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

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克鲁泡特金最重要的既不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也不是作为一名俄国革命家。而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把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无政府主义中。事实上，他是地理学和革命社会伦理学这两个完全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因为他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应用伦理学。他是当时大地测量数学和西伯利亚地理学的权威之一。他是第一个为无政府主义原则奠定科学基础的

人，这一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主张在独立社团自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社会重组。他为社会科学带来了丰富的自然科学训练。与大多数科学家不同，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观察和结论，因此他的著作几乎以所有语言的通俗读物和小册子形式出版。这些著作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还因为他热衷于对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认为群众一旦了解自己的力量和使命，就会团结起来摧毁国家、垄断和私有财产。

互助、同情、团结、通过自由合作实现个人自由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些都是克鲁泡特金教义的积极思想根源。废除国家、一切形式的权威、垄断和阶级统治是其消极的形式。与之相伴的是一种信念——所有流派的许多革命家都有这种信念——即一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一场由工人和农民普遍夺取财产的革命，这场革命将结束剥削和阶级统治，迎来自由合作和个人自由。

他赞同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在很大程度上赞同他们的观念，即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形式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制度，包括法律、政府、宗教和婚姻。但他不同意社会主义者将政治手段作为实现权力的手段，也不同意他们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他将无政府共产主义描述为“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

自由原则，他跳出了经济和政治斗争，进入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婚姻、教育、犯罪处理、法律的功能、道德的基础。

克鲁泡特金早年与俄国农民的接触为他的社会观增添了色彩。当他想到群众时，他不自觉地把农民想象成受地主和沙皇压迫的人，当革命动乱一旦给他们带来自由时，他们完全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他对工人阶级的看法也受到他有限的接触的影响。他与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并不密切。他与瑞士的汝拉联合会、伦敦的俄国犹太工人以及巴黎的无政府主义工人的关系都不太密切。他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强烈敌意使他与德国工人运动隔绝开来。他对领导的实际问题和工人的行动心理知之甚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把工人的能力理想化了。

克鲁泡特金与许多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同，特别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他并不谴责暴力行为，尤其是暗杀暴君，而是认为这些行为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是有益的。他认为内战在阶级冲突中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希望内战仅限于“最少的受害者和最少的相互伤害”。即使是国际战争，他也认为有时是先进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重大冲突。这种态度解释了他为何能在世界大战中支持盟国的事业，因为他担心德国军国主义的胜

利会对革命力量的进步造成致命打击，而他认为盟国的革命力量要先进得多。他对法国的深情和对俄国的眷恋可能也影响了他的这种态度。

关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无政府主义，他写道：“我同情托尔斯泰的大部分作品，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我绝对不同意，比如他的禁欲主义和他的不抵抗学说。在我看来，他还毫无理性和判断力地将自己束缚在《新约全书》的字里行间。”他还蔑视托尔斯泰的观点，认为可以说服有产阶级放弃他们的特权，而无需进行激烈的斗争。

克鲁泡特金反对被称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说他不是从哲学而是从人民那里学到了无政府主义。和许多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反对这样的暗示，即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哲学，而不是行动纲领，不是植根于群众斗争的运动。“哲学”听起来太冷漠、太体面、太平和了。它带有书本和研究的味道。

对于米哈伊尔·巴枯宁创立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流派以外的无政府主义概念，他是不屑一顾的。无政府主义流派只有一个共同点，即废除作为强制机构的国家，而所有教派都强调自己的不同点。他认为美国本杰明·塔克学派和德国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学派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是无可救药的保守主义，只致力于赢得个人自由而不对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他在谈

到经常被视为无政府主义主导原则的个人主义时说：“狭隘的个人主义无法激励任何人。它没有任何伟大或扣人心弦之处。只有在最高的共同社会努力中，个性才能得到最高的发展”。他称尼采的个人主义是“虚假的”，并指出这种个人主义“只有在压迫大众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且事实上会摧毁“压迫者本人以及被压迫大众”的个性。他认为易卜生是唯一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概念的作家，但“没有成功地表达出来，让人清楚地理解”。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皮埃尔·蒲鲁东是“互助主义学派”的启蒙者，他主张通过重组银行和货币来实现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但他认为皮埃尔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克鲁泡特金除了坚持不懈地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也就是与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代表的专制社会主义不断交战之外，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分歧公开化。除了在原则上反对马克思之外，他还对马克思——他从未见过马克思——怀有强烈的个人反感，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对待巴枯宁的态度。据一般报道，马克思曾帮助散布巴枯宁受雇于俄国特务机关的谣言。然而，当他们两人有一次在乔治·桑的家中见面时，马克思热情地向巴枯宁打招呼。克鲁泡特金不能容忍他认为是不可饶恕的虚伪。发现《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摘自康斯泰伦特的作品

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克鲁泡特金几乎像孩子一样喜欢在马克思身上打分，此外他还蔑视马克思是一位政治家。

但是，除了个人感情无疑是他敌视专制社会主义的结果之外，他与马克思在其他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也很大。虽然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社会主义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但他并不认为经济力量是阶级斗争中如此压倒性的因素。他的著作始终强调思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但次要的因素，它起源于阶级斗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阶级斗争本身对革命进程的影响似乎不如唤起“人民”的革命思想和情感。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是基于他早年在俄国的看法，在俄国，广大农民站在少数统治阶级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概念更鲜明、更清晰地描绘了西方工业国家的阶级界限和利益。然而，在他的《伟大的法国革命》中，体现了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派的共同解释。事实上，苏联政府向他提供了巨额回报，以换取在俄罗斯学校使用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权利——克鲁泡特金典型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它来自一个政府。

在他的社会思想中，克鲁泡特金倾向于从他的理论中发展出他的事实。他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归纳-演绎法”。在他的地理科学研究工作中，他首先获得事实，然

后发展他的理论。他在这两个领域的方法之所以不同，无疑是由于他对所有社会问题的强烈感受。在这些问题上，他本质上是一个宣传家，倾向于忽略或撇开与他的解释相矛盾的事实。他坚持认为，他随时准备根据事实改变自己的理论，但像所有深信不疑的人一样，他对自己的理论过于深信不疑，除了为了摧毁这些理论之外，他看不到与之相反的事实。虽然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著作，特别是《田野、工厂和车间》，是真正的科学著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带有先入为主的色彩。

在个人生活中，他同样顽强地坚持自己制定的标准。他严格拒绝为他所做的工作收取一分钱报酬。即使生活窘迫，他也拒绝贷款或馈赠。即使在这种时候，他也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分给所有向他求助的人。他的生活习惯的特点是，除了工作，他对其他一切都很节制，在工作中他不知疲倦。他坚决反对他认为不符合无政府共产主义广泛原则的策略，即使目的看起来是好的。他谴责在政治案件中弃保潜逃的同志，因为这既违背了对担保人的信任，也会对其他案件的保释造成实际影响。日俄战争期间，他拒绝接受日本政府对俄国革命党人的援助，这既是由于日本政府打击士气的影响，也是由于他对政府的敌意。

克鲁泡特金各行各业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最高贵的人”。奥斯卡·王尔德称他是他见过的两个真正快乐的人之一。罗曼·罗兰说，克鲁泡特金实践了托尔斯泰止步于倡导的生活。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他受到成千上万人的爱戴——法国工人称他为“notre Pierre”。他从未担任过领导职务，但却以其人格的道德力量和广博的智慧领导着运动。他以非凡的方式将高尚的人格品质、敏锐的头脑和热情的社会情感结合在一起。他的一生给众多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整个科学界、俄国革命运动、各派激进运动，以及对科学或革命不屑一顾的文艺界。

他的革命学说与当今世界的实际关系的意义仍有待研究。

在克鲁泡特金完成他最重要的著作之后的几年里，发生了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等重大事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随之加剧，革命运动也在俄国经验的基础上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认为迫在眉睫的大革命仅在俄国就爆发了，工人和农民彻底没收了所有制阶级，随后建立了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专政。这场革命是对无政府主义原则在行动中的意义的最好检验。克鲁泡特金的态度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让我们首先说明俄国的情况。

苏维埃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国内反对派和农民的冷漠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和其他次要因素阻碍了苏维埃俄国向共产主义不断迈进，甚至导致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倒退。经济秩序是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以有限租让的形式存在相当多的私人资本主义，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基本上不关心“进步”。政治秩序是共产党独裁统治，共产党是唯一合法的政党，它利用国家权力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并尽可能确保其纲领的顺利实施。它在事实上和精神上实现了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极力反对的思想。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后从旧社会主义政党中发展起来的，它正在进行一场激进的斗争，以引导劳工和激进力量走向其他地方的类似革命。共产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同样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议会思想和策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非政治和反国家策略，他们认为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人都是无能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阵营中的长期死对头——现在对苏维埃政府强行镇压他们在俄国的活动、监禁和流放他们在俄国的同志有着共同的敌意。社会主义者希望专制制度能解体为民主的议会制度；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专制制度能让位于作为经济制度的去中心化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自由联盟。但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敌意，社会

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总体上都不愿落入苏维埃俄国的资本主义敌人之手。他们都捍卫苏维埃俄国免受资本主义的攻击（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同时严厉谴责苏维埃俄国强行镇压反对派。站在他们一边的共产党人在镇压苏俄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因革命或工人阶级活动而受到攻击时，却帮助维护这些活动。

共产主义在俄国内外的态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革命策略的实际需要和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政府的责任。苏维埃政府将与资本主义做出必要的妥协，以确保货品生产和贸易的增长，同时拒绝容忍对这些妥协的激进反对。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内，反对声音也会被压制。但在俄国境外，他们必须鼓励一切力量，促进工人阶级力量的增长。

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俄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些人与苏维埃政府在经济工作中合作，接受专政的必要性，同时坚持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指出即使列宁也相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最终有效性，但现在却嘲笑和反对它，认为它缺乏实现自己目标的策略。还有一些人接受了在俄国保持沉默的必要性，他们宁愿选择这种独裁统治，也不愿生活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独裁统治之下。还有一些人继续表达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批评苏维埃政策，其中一些人被关进监狱或流

放。还有一些人离开了俄国，实际流亡或自我流亡，在其他地方安静地生活着。少数人在国外继续积极开展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活动。在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外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中，对苏维埃政府和共产主义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的活动也大相径庭，尽管他们几乎都反对强行镇压俄国的革命反对派。

克鲁泡特金如果他年轻一点，甚至活得更长一点，他自己会怎么做，可以从他在第256—259页的评论中看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职能只是参与农民和工人的志愿组织。他对俄国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是，在建设新经济的过程中开展建设性的工作，并通过工团主义者工会来表达这一建设性的目的。

无政府主义的反对与合作对俄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还很难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很弱，远远弱于社会主义运动，但它的政策对布尔什维克面临的核心经济问题有直接影响。主要的政策——工会、合作社和农民协会的自由——在政府官僚机构严格的中央集权控制失败的情况下，作为一项实际可行的措施而获得了成功。

在俄国之外，在工人阶级斗争的世界中，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所代表的运动传播广泛，但规模相对较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真正组织起来，而且始终缺乏实用技术。它的兴盛主要依靠毫不妥协的抗议，以及对

通过废除国家来实现革命目标的憧憬。它简单而大胆。从1870年到1900年，它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但现在它的人数和影响力都在减少。如今，它主要体现在拉丁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工会运动中，特别是在西班牙、葡萄牙、墨西哥和南美，但在德国、法国和瑞典也有较小规模的运动。零星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作为小团体的喉舌出现在世界各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一份无政府主义日报。

1922年，以克鲁泡特金所属的旧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工团主义者国际，代表工团主义者工会，总部设在柏林。

但是，在任何有组织的运动之外，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都持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表现出来，改变和引导着其他运动。有人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只是说，我们都渴望尽可能大的个人自由和尽可能小的外部约束。这种本能的态度解释了不同群体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应，尤其是当他们没有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时，他们担心的是暴力和流行讽刺画的旧联想。正如克鲁泡特金经常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只是人类普遍而古老的愿望的表述。在此基础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作家和宗教领袖的观点可能会被

贴上无政府主义的标签。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耶稣、老子、易卜生、尼采和阿纳托尔·法兰西等不同人物都是无政府主义作家。

无政府主义，人们常说，在遥远的未来，当我们都变得足够文明，可以在没有政府和警察的情况下相处时，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当阶级斗争结束的时候。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在所有社会活动中，自由的增长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工作原则。如果说手段创造目的，那么，如果不不断养成更自由的关系、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所有社会群体更大独立性的习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社会。重要的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独裁统治下，这一在政治生活中备受蔑视和嘲弄的原则，正是在建立教育、合作社、工会以及庞大经济和社会组织网络方面最有效的原则。同样重要的是，在全世界，任何领域的社会进步都是在加强个人责任、自愿结社和自由联合的坚实基础上取得的。进步的道路只能通过增加团体和个人的自由来实现，无论是在教育领域，还是在成人权威最小化的新型学校；无论是在处理犯罪问题方面，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或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工会及合作组织中，都是如此。

克鲁泡特金的教诲体现了这些原则，将长期激励人们对自由的信仰，并澄清如何实现自由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权威与自由的力量之间的斗争仍将持续多年，它将有助于制定政策和开展运动。

ROGER N. BALDWIN1927

克鲁泡特金的一生

人们对克鲁泡特金的印象主要是他晚年的样子，他是一位和蔼可亲、满面春风的哲学家、科学家，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宁静而深邃。他秃顶，前额宽阔，留着浓密的白胡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智力超群，但却没有丝毫自我意识或优越感。虽然他在任何关系中都表现出亲切和礼貌的举止，但这并不是贵族的恩赐，而是一个真正热爱同胞的人，他对同胞不加区分。无论是对科学协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团体发表演讲，无论是与贵族还是劳动人民共进晚餐，他都朴实、热情、认真，对他心中的事业充满感情，但对自己却毫不关心，没有领导意识或地位感。

虽然他是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的沙皇鲁里克家族的直系后裔，但他从不称自己为王子，也不喜欢头衔。他在《回忆录》中说，12岁时，“受共和派教义的影响”，他放弃了自己的头衔，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过。他甚至斥责过这样称呼他的朋友。

这位具有俄国革命记忆的青年克鲁泡特金已经表现出了后来使他脱颖而出的所有特征。从十几岁起，他的兴趣就具有同样的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冷静和科学的知识追求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对被压迫者的热情关注。他很早就接触到科学和哲学，这主要得益于他哥哥对他的影响，他

对哥哥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父亲农奴的境况和周围的骚动激起了他与生俱来的热情，他的革命信念就是这种热情的体现。

他早年在莫斯科的一个大机构中生活，那里分为主人和农奴，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出生于1842年，当时农奴争取自由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在贵族区的家中长大，父亲是个富有的地主，家里有50个仆人为八到十二口人干活。他看到农奴——他的看护、他的朋友——受到惩罚，有时还遭到残酷的殴打。他的父亲像管理工厂一样管理着这个机构，因为所有的货物都是在家里或在乡下的庄园里制造的，一家人夏天去那里避暑，而农民们则从那里运来漫长冬天所需的所有物资。这位父亲是个小独裁者，他是所有农民和农奴（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人）的生活、爱情和福利的绝对主人。他继承了他们的三处大庄园和莫斯科的房子，这个小家庭靠他们的劳动过着奢侈的生活。

父亲没有职业。当首都迁往圣彼得堡时，莫斯科的旧贵族们失去了在宫廷的工作，只能担任一些荣誉辅助性的职位。但他却以军人的作风忙碌着——因为他曾在军队中接受过军官训练——打理他的庄园事务，并为所有寻求他

帮助的人提供帮助。他喜欢扮演有影响力的人，在陌生人的琐碎事务中投入无尽的精力，只为获得被人仰视的满足感。他总是敞开大门，大肆招待客人。

五名厨师负责准备食物，十几名男仆负责伺候餐桌，还有十几名男仆负责照看十几匹马。仆人们组成的私人管弦乐队在用餐时以及在欢乐的纸牌派对和舞会上演奏，这些活动常常让房子营业到深夜。

克鲁泡特金的母亲是一位美丽的女性，是西伯利亚总督的女儿，在他三四岁时死于肺结核。他和两个哥哥由法国家庭教师和德国护士抚养长大。长子彼得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弟弟亚历山大相差好几岁。两个小男孩一起长大。他们很少见到父亲。甚至对他们来说，父亲也是一个独裁者，一个遥远而可怕的人物。母亲去世两年后，父亲又结婚了，这桩婚姻完全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安排的。新母亲断绝了与孩子们娘家的一切联系，自己却对他们不闻不问。两个孩子由仆人和一位法国家庭教师抚养。

十岁那年，克鲁泡特金在莫斯科的一次贵族子弟参加的化装舞会上受到了皇帝的青睐，从而意外地决定了他未来的训练。由于他的魅力和长相被选中，小彼得被邀请成为皇帝的侍从，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男孩在圣彼得堡的一所特殊学校接受培训。但他三年后才进入侍从队。年仅12岁时，他仍在莫斯科的家中学习，并开始写小说，阅读法

国和俄国的政治书籍。就在那时，他在提到自己时放弃了王子的头衔，这是在阅读自由主义小册子后做出的决定。但他似乎对自己的决定保持沉默。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对自由主义思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更为明显。两个孩子经常一起讨论当今的重大问题。13岁时，彼得去了圣彼得堡的侍从学校，兄弟俩就分开了。

在那里，他就读于军校，所有的学生都进入军校学习，并服役于法院。他醉心于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历史。他甚至开始编写一本物理教科书。在实践方面，他转向了测量。奇怪的是，在这所学校里，他对革命运动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一运动一下子吸引了他。十七八岁时，他读到了自己的第一篇革命论文，即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北极星》，这篇论文在伦敦出版，并在俄国秘密流传。该报主张为俄罗斯制定一部宪法，但沙皇认为这一主张是革命性的。

1861年，就在彼得完成学业的时候，皇帝发布了公告，这让他欣喜若狂。他现在是一名军官，可以选择服役。他选择前往西伯利亚担任总督的助手，总部设在赤塔。在那里，他努力改造囚犯和流亡者的生活条件，改善当地城镇政府的状况。地理研究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克鲁泡特金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这些研究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在那里工作两年后，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加入

了他的行列，这让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是一名军官。三年后——1867年，彼得二十五岁时——他们俩一起辞职了，原因是他们对波兰流亡者遭受的残酷待遇深恶痛绝。

彼得上了圣彼得堡大学，他的弟弟上了法律系。在五年的时间里，他学习了数学和西伯利亚地理。他关于西伯利亚的报告发表了。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令他欣喜若狂的发现——西伯利亚山脉的形成方向与以往所有地理学家的假设正好相反，这一发现影响深远。他担任了俄罗斯地理学会自然地理学分会的秘书，但他拒绝了整个学会的秘书职务，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农民的事业深深吸引了。

此时，30岁的他前往西欧考察工人运动。他去了苏黎世，在那里加入了当地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但当他看到工人的利益被牺牲在一个友好律师的政治财富上时，他厌恶地退出了。但在主要由钟表匠组成的汝拉联合会，他发现自己本能地被吸引住了，这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没有领导者和普通工人之分的协会。这个联合会深受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影响。这是克鲁泡特金与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汝拉联邦，特别是在巴枯宁那里，我听到了对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的批判——对经济专制主义的恐惧远比单纯的政治专制主义危险得多；我还听到了

鼓动的革命性质，这些都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思想。但是，我在汝拉山脉发现的平等主义关系，我看到工人们发展起来的思想和表达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对事业的无限忠诚，更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感情。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他从未见过几年后去世的巴枯宁，但他深受巴枯宁人格的影响。他对巴枯宁的印象很深，巴枯宁不是知识权威，而是“道德人格”——这也可以说是克鲁泡特金他自己。他被革命思想的阶级意义所征服，而不是将其视为政治改革。他这样说道：

“我开始明白，革命——即加速快速进化和急剧变化的时期——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就像现在人类文明种族之间不断进行的缓慢进化一样。而每当这种大规模的加速进化和重建时期开始时，都有可能爆发或大或小的内战。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避免革命，而在于如何以最有限的内战、最少的受害者和最小的相互伤害取得最大的成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打算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并让他们充满实现目标所必需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一定会把特权阶级中最优秀、最新鲜的知识力量吸引到自己的事业中来。”

在瑞士呆了几个月后回到俄国，他立即加入了“恰伊科夫斯基圈子”，这是一个由学生（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秘密教育组织，是被视为革命运动的“为了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克鲁泡特金仍在为革命理想寻找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去父亲去世时刚刚继承的庄园开展农民土地运动还是在朝臣中鼓动立宪之间犹豫不决。就在他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他继续他的地理工作，去芬兰完成了一项研究。在圣彼得堡的两年里，他白天从事地理工作，晚上则在他的革命圈子里活动，他装扮成农民，用假名参加会议。

他最终决定前往自己的庄园开始土地联盟，但为了向地理学会提交一份论文，他在圣彼得堡等待的时间比原计划的要长。在会议上，有人提议让他担任主席，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因此拒绝考虑。他的许多朋友已经入狱。第二天，当他离开住处时，他被追捕，被他自己圈子里的一个工人认出是间谍，并被送进了监狱。他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他的被捕引起了轰动，因为他与革命事业的联系证据确凿。当时他32岁（1874年3月）。

随后，他在狱中度过了近两年的候审期。他被允许阅读和写作，并继续他的科学工作。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在一次探望他后被捕，原因仅仅是给伦敦的一位流亡者写了一封信。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十二年后

自杀身亡。克鲁泡特金他在要塞里病倒了，被转移到监狱医院。在医院疗养期间，他的朋友们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越狱阴谋。看似不可思议的是，他竟能从每天锻炼身体的内院跑出，穿过为放行几辆马车而打开的门，在惊呆了的看守们来不及开枪之前跑到街上。一到街上，他就跳上一辆等候的出租车，在车流中迷失了方向。乔装打扮后，他离开俄国来到瑞典，在那里坐船前往英国。他打算只在那里短暂停留，然后返回俄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他说，这个决定使他实际上流亡了42年：

"我很快就被当时在西欧兴起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浪潮所吸引；我觉得我在俄国以外更能帮助这场运动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在我的祖国，我的名声太大了，无法进行公开宣传，尤其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后来，当俄国的运动变成了反对专制制度的阴谋和武装斗争时，所有关于人民运动的想法都必然被放弃了；而我自己的倾向却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我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给他们带来这样的观念，以帮助他们指导自己的努力，为所有工人谋取最大利益；深化和拓宽作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基础的理想和原则；在工人面前发展这些理想和原则，不是作为来自他们的领袖的命令，而是作为他们自己理性的结果；在我看

来，这对人类发展的必要性不亚于我当时在俄国所能完成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加入了西欧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少数人的行列，为那些因多年艰苦奋斗而崩溃的人解脱。”

他在英国与科学杂志建立了联系，并向它们投稿和发表评论，从而赚取了微薄的生活费。他离开俄国时一无所有，财产当然也被没收。在他的余生中，他一直仅靠科学著作谋生，拒绝为他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劳动收取任何报酬，尽管他经常穷困潦倒。

但英格兰让他感到沮丧。他说：“没有色彩的生活，没有空气的氛围，没有太阳的天空，对我的影响就像监狱一样。我为空气而痛苦，我无法工作。”因此，一年后他搬到了瑞士，在那里加入了汝拉联合会，并在工人中间安顿下来。巴枯宁刚刚去世（1876年），但他的思想与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关于这场斗争，克鲁泡特金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不是个人问题。这是联邦制原则与中央集权原则、自由公社原则与国家家长式统治原则、人民群众的自由行动原则与通过立法改善现有资本主义条件原则之间的必然冲突，是拉丁精神与德国地缘精神之间的冲突。”德国地缘精神在法国战

场上战败后，在科学、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领域都宣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说成是“科学的”，而把所有其他的解释都说成是“乌托邦的”。

他在知识分子詹姆斯·纪尧姆（James Guillaume）、法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埃利塞·雷克罗斯（Elisée Réclus，当时正流亡在外）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追随者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那里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发现瑞士的大多数俄国人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的朋友都是拉丁人。此时，他遇到了同样流亡在瑞士的年轻俄国学生索菲·阿纳尼耶夫（Sophie Ananieff）。不久，他们在瑞士结婚。

当克鲁泡特金研究他周围的力量时，他逐渐发现无政府主义需要比它对政治和经济的意义更深刻的解释。他的哲学观和科学观促使他探寻一种综合，一种将其确立为生活原则的统一性。这种观念几乎影响了他的所有思想和社会伦理方面的所有工作，使他直到去世前还在不停地从事研究和解释工作。即使是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互助论——对“适者生存”学派的经典回答——也是受这种愿望的推动，即在科学基础上证明自愿合作和自由的合理性。关于这一时期的发展，他说：

"我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行动方式，也不仅仅是对自由社会的一种构想；它是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部分，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处理人类问题的科学所采用的形而上学或辩证法的方式加以发展。我认为，必须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来处理它，但不是像赫伯特·斯宾塞所接受的那样，仅仅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将归纳法应用于人类制度的坚实基础上。在这方面，我竭尽所能。"

除了回英国和巴黎的一次旅行外，克鲁泡特金在瑞士生活了五年，直到三十九岁，在妻子和埃利塞·雷克罗斯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认为最出色的工作。他主要以文章和社论的形式为一份双周刊《Le Révolté》撰稿，这份报纸于1879年在日内瓦创刊，尽管遭到迫害和压制，但他仍以后来的《La Révolte》和《Les Temps Nouveaux》的名称继续出版多年。本卷重印的小册子中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在他的报纸上首次发表的。这些小册子以十几种语言出版了大量版本。Elisée Réclus将他早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精选成《Paroles d'un Revolté》一书，由Marpon Flammarion于1885年出版了法文版，当时克鲁泡特金正在克萊沃监狱服刑。

这个小团体在瑞士并不容易找到避难所。汝拉联合会是一个坦率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欧洲发生无政府主义暗杀事件后，瑞士当局解散了该组织，当然，它与这些暗杀事件毫无关系。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杀后，克鲁泡特金被驱逐出瑞士，这无疑是俄国政府的授意，俄国政府一直通过秘密特工对他进行密切监视。为维护沙皇政权而组织的俄罗斯神圣同盟经常以死亡威胁他。

克鲁泡特金在英国再次找到避难所后，他继续写作和演讲了一年，但听众寥寥无几。当时，人们对激进思想的兴趣正处于低潮。后来，由于克鲁泡特金夫人在那种气候下身体不好，他们去了托农，她的弟弟在那里病得很重。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一边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科学文章，一边继续为无政府主义宣传造势。他作为地理学家的杰出成就也得到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认可，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敌视与“皇家”组织的任何联系。

稍后，里昂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有人在游行中投掷了炸弹，克鲁泡特金与法国约六十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被捕，尽管他当时在托农，与此事毫无关系。所有人都被指控为“国际劳动人民协会成员”，尽管只有克鲁泡特金是成员。他们于1883年在里昂一起受审，在媒体歇斯底里的渲染下，所有人都被判有罪。克鲁泡特金是被判五年徒刑的四人之一，他被送往克莱沃监狱。他在那里呆了三年，

而全法的朋友和同情者都在为大赦整个组织而努力，最终成功地在议院获得了赦免票。在众多为他争取自由的法国杰出人士中，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是一位激进分子，他在议院中不遗余力地为他争取自由。

在克莱沃，政治犯的条件相当不错——没有强制劳动，有机会学习和写作，可以自己购买食物和酒，还可以在户外花园劳动——这是克莱蒙梭为政治犯争取到的特权。他们在囚犯中组织了学习班。欧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将他的克鲁泡特金部分图书馆寄来供大家使用。一年后，索菲克鲁泡特金来到克莱沃，并被允许每天与丈夫见面。然而，克鲁泡特金却对整个制度嗤之以鼻。他的《监狱及其对囚犯的道德影响》（第219-235页）主要是他在克莱沃的观察和经历的结果。他还将《在俄罗斯和法国监狱中》一书中他早期和后期的监狱经历写成了书。整本书立即被俄国特务机构买走并销毁，克鲁泡特金他自己也无法再获得一本。

获释后，他去了巴黎，但又被驱逐，第三次来到英国避难，并在伦敦郊外的一座小屋里定居下来。此时，他唯一的孩子亚历山德拉出生了，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尽管他心爱的弟弟亚历山大在西伯利亚流亡期间自杀的消

息让他的生活倍感悲伤。这是他在俄罗斯最后的亲情。长兄从青年时代起就走上了其他道路，克鲁泡特金与他再无联系。

他发现英国工人的新精神远比五年前更有活力。他受到鼓励，在伦敦创办了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Freedom），这份月刊仍然由他组建的小组出版。他继续出版他的法文报纸，即现在的《起义报》（La Revolte），因为《起义报》因反军国主义宣传而遭到起诉。他在《自由》上发表的一系列早期文章后来经过修订，以《面包与自由》一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现存最全面、最有效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学著作。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受到启发，写出了《互助论》，这是他所有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他说，他从俄国地质学家凯斯勒那里得到了主要观点的陈述，即合作是动物和人类社会生存的一个因素，但灵感来自赫胥黎的《为生存而斗争》（1888年），这本书唤起了他无政府主义的战斗灵魂。《互助论》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十九世纪》（伦敦）上，克鲁泡特金为其撰写了大量文章。为撰写这部著作，他对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和“自由公社”进行了研究，并一再将其作为非政治性经济组织自由合作的范例。他将这些研究写成了《国家：它的历史作用》一书，几年后又出版了《现代国家》一书。

从法国回来后的三十年里，克鲁泡特金一直住在英国伦敦或伦敦附近，直到1917年返回俄国。在这些年里，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和学习，同时从事书籍装帧和木工手工艺，并对音乐倾注了毕生的热情。晚年，当当局忘记了对他的禁令时，他偶尔会去法国和瑞士旅行，1897年和1901年，他曾两次到美国巡回演讲。在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中，他写了四本书，分别是《田野》、《工厂》、《车间》、《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他在研究和阐释方面的最高成就《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最初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大西洋月刊》（波士顿）上）以及《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道德》（重印于本卷中）和许多文章，其中许多文章后来作为小册子出版。当然，他还继续从事科学地理研究和写作，并以此为生。

剑桥大学向他提供了地理学教席，但同时也非常明确地暗示，剑桥大学希望他在任职期间停止无政府主义活动。克鲁泡特金当然拒绝了这一邀请。

1897年，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Ontonagon召开会议，克鲁泡特金正是作为该会议的演讲者第一次前往美国。在互助论会议之后，他在美国感兴趣的朋友为他争取到了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就互助论进行三次演讲的机会。他还在纽

约进行了演讲。在这第一次美国之行中，克鲁泡特金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罗伯特·厄斯金·伊利（Robert Erskine Ely）和其他美国朋友向他强调了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并征得时任《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编辑沃尔特·海因斯·佩吉（Walter Hines Page）的同意，将其作为系列文章发表，尽管《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委员会表示反对。伊莱先生撰写了序言，将克鲁泡特金的意义展现在几乎不熟悉无政府主义哲学或革命斗争的广大读者面前。1899年，当这本书以书籍的形式由Houghton Mifflin公司出版时，它还附有乔治·布兰德斯（George Brandes）的序言。在生动而谦虚地讲述的人生故事中，该书名列前茅。他所描绘的反沙皇斗争的亲密画面是独一无二的。该书主要讲述了他的早年经历，直到1889年他47岁时才结束。

在这次旅行中，克鲁泡特金特意前往匹兹堡，会见了他的无政府主义同道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伯克曼当时因企图谋杀卡内基钢铁公司的H. C. 弗里克（H. C. Frick）而正在服长期徒刑。由于伯克曼当时被单独监禁，克鲁泡特金被拒绝会见他。据说，几年后，安德鲁·卡内基邀请克鲁泡特金和其他一些名人到

他在苏格兰的城堡参加聚会。克鲁泡特金写了一封庄重的婉言谢绝信，说他不能接受一个对把伯克曼关在监狱里负有任何责任的人的款待。

但更令人难忘的是他在1901年对美国的访问，最远到过芝加哥西部，在著名大学讲学，并再次在波士顿洛厄尔学院讲授俄罗斯文学系列课程，后来以《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书的形式出版。在纽约，他在政治教育联盟（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发表了演讲；在库珀联盟（Cooper Union）的无政府主义听众面前发表了演讲，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担任演讲主席；他还两次在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的一个大厅发表演讲，向时髦的听众讲述无政府主义以及俄罗斯文学。在波士顿，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牧师（Rev. Edward Everett Hale）邀请他到自己的教堂演讲，但克鲁泡特金拒绝了，因为他对教堂这个机构怀有敌意，尽管他最终被说服，在教堂的演讲厅演讲时，他的顾虑得到了调和。

他在哈佛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发表演讲，受到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教授等人的热情接待。他没有忽视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在他们安排的许多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即使在这次巡演中，俄罗斯秘密警察也一直在跟踪他。新闻

界对他很公平，甚至很友好，他的听众很多，也很警觉，每次演讲结束后都会向他提问。他根据笔记，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以教授的口吻但非常认真地发表演讲。

罗伯特·厄斯金·伊利（Robert Erskine Ely）曾协助安排过他的一些演讲，讲述了自己在新约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在这件事中，克鲁泡特金无意中促成了两个人的会面，而这两个人在这个国家是最不可能见面的。伊莱应南方联盟总统遗孀杰斐逊·戴维斯夫人的请求，带着克鲁泡特金去拜访她。在会见过程中，正在寻找伊利先生的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来到了酒店大堂，并被告知戴维斯夫人也想见一见这位黑人教育家。于是，这三个非同寻常的人坐在一起，彬彬有礼地交谈着，就像在一个最普通的场合一样。

在英国学习和写作的岁月里，这些美国之行是唯一真正的休息时间。克鲁泡特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在晚年无法承担公开演讲的压力。但他的健康状况并没有严重影响他的学习和写作，也没有影响他作为宣传者和同志顾问的活动，这些同志都把他当作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思想指导力量。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克鲁泡特金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报纸，并开展了流亡者可以开展的活动。后来，他用英语写了一本小册子《俄国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

in Russia）。他的家是俄国革命难民（无论是否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

他预见到了世界大战，早在战争爆发前就敦促他的法国同志不要反对延长兵役期，因为他害怕德国军国主义。他与许多无政府主义朋友决裂，因为他支持盟军的事业，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战争。他在战争期间的态度使无政府主义阵营比激进运动的传统宗派主义更加分裂。

1917年3月，俄国革命爆发，沙皇被推翻，克鲁泡特金立即准备回国，他欣喜若狂，因为他活着看到了这场伟大斗争的成功，他早年曾为这场斗争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在流亡期间一直尽其所能地为这场斗争做出贡献。他于6月回国，先在彼得格勒定居，后来又到了莫斯科。

尽管他已七十五岁高龄，但他对革命工作，特别是战争的进行，都抱有直接积极的兴趣。克伦斯基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派“民主大会”，并在会上敦促重新发动军事进攻。在革命方面，他接受了一个知识分子委员会的成员资格，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推动进一步的革命变革，但该委员会从未真正开展工作。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结束了这些活动，克鲁泡特金很快搬离莫斯科，来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德米特罗夫。在那里，他和妻女有一栋四五个房间的木屋、一个花园和一头奶牛。尽管他身体欠佳，家人也抱怨他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无法工作，但他自己却毫无怨言。除了向朋友抱怨外，他也拒绝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但他的朋友们还是向政府提出了要求——但没有成功，直到他们最终找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崇拜者列宁，列宁立即命令当地苏维埃让克鲁泡特金保留他的牛，并给他额外的食物补贴。他的女儿把列宁的命令亲手写在一张印刷品的背面。

克鲁泡特金拒绝与当地苏维埃发生任何关系。然而，1920年，当英国工运代表团的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Margaret Bondfield）访问他时，他陪同她参加了当地苏维埃在学校校舍举行的一次会议，她应邀在会上发言。据当时在党内的亨利·阿尔斯伯格（Henry Alsberg）说，当他进来时，所有党员都站起来为他欢呼。他显得非常不安。邦德菲尔德小姐说完后，主席转向克鲁泡特金，邀请他发言，并说所有俄国人都为他这位伟人感到骄傲。他站起来，半喜半怒，脸色涨得通红，一言不发地坐下了。

虽然克鲁泡特金不能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的发展，但他从革命本身和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恐怖主义深感忧虑。列宁的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消息，说列宁急切地想见克鲁泡特金，并愿意到德米特罗夫来商谈此事。会谈立即得到了安排。虽然列宁对他的观点表示亲切和赞赏，但这次会面没有任何结果。

虽然他与布尔什维克势不两立，克鲁泡特金但更坚决反对外国对俄国的干涉或反革命运动。当他的朋友对政府进行激烈抨击时，他甚至会阻止他们。他给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是，通过工会和政府以外的协会帮助“重建”。他建议国外的年轻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工团主义者运动，这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目标的最佳途径。

关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革命，他曾于1919年为英国工运代表团写过一篇文章，后经多方劝说，又于1920年11月在去世前写了一篇文章。这些论述揭示了他的远大理想，以其宽容的理解力彰显了他的睿智，因此我们以《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府》为题，在本文集中重印了这些论述。

但克鲁泡特金没有参加任何运动。他年老体弱，醉心于研究，主要是撰写《伦理学》一书，该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后来竟得了肺炎。1921年2月8日，他在德米特罗夫的小房子里去世，享年78岁。

苏联政府为他的家人举行了国葬，但他们当然拒绝了。相反，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将葬礼安排在工会之家。

两万人在严寒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扫墓游行，乐器都冻住了。人们高举黑色横幅，要求“从监狱中释放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和同志”。在墓前，埃玛·戈尔德曼、代表、被释放的囚犯、托尔斯泰主义者、科学和劳工组织、学生、社会革命党人和共产党人发表了讲话。

政府把德米特罗夫的小房子送给了他的遗孀，供她个人使用。克鲁泡特金他在莫斯科的出生地——位于老贵族区的大木屋，有六根巨大的方柱——由政府移交给他的妻子和朋友，用作他的书籍、论文、信件和遗物的博物馆，现在由世界各地的老朋友和崇拜者捐资维护。

ROGER N. BALDWIN1927

《反抗精神》的摘要

这篇关于革命时期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的简短而生动的论述，与1880年作为一篇文章首次发表在日内瓦的《反叛报》（Le Révolté）上时一样新鲜，后来稍作修改，以法文小册子的形式印刷。特别提到法国大革命的部分已被省略。

克鲁泡特金指出了一个新阶级崛起掌权的作用，它将口头宣传转化为实际行动，推翻那些看似强大、实则腐朽的统治机构。在这本完整的小册子中，他引用了法国大革命作为典型的过程，并指出了崛起阶级获得权力的宣传手段。但他认为，工人的革命不仅仅是政府的更迭，不仅仅是新阶级行使旧权力，而是建立在社会化财产基础上的全新合作制度。

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些时期，革命是势在必行的，是不可避免的。新思想到处萌芽，力图走向光明，在生活中得到应用；新思想遭到那些以维护旧秩序利益为己任的人们的惰性反对；新思想在偏见和传统的窒息气氛中窒息而死。关于国家构成、社会平衡法则、公民的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公认观念，再也无法抵御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每天都在不失时机地破坏它们——无论是在客厅还是歌舞厅，无论是在哲学家的著作中还是日常交谈中。政治、经

济和社会制度正在崩溃；社会结构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正在阻碍甚至阻止在其被破坏的墙壁内繁殖和在其周围孕育的种子的的发展。

对新生活的需求变得显而易见。既定的道德准则，即支配着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准则，似乎已不再足够。以前看似公正的东西，现在却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发指的不公正。昨天的道德今天被认为是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新思想与旧传统之间的冲突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可能的环境中，甚至在家庭的怀抱中爆发出来。儿子与父亲抗争，他认为父亲一辈子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是令人厌恶的；女儿反抗母亲根据长期经验传授给她的原则。民众的良知每天都在唤醒，反对在特权阶层和有产者中间滋生的丑闻，反对以强者法律的名义或为了维护这些特权而犯下的罪行。那些渴望正义胜利的人，那些希望将新思想付诸实践的人，很快就不得不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他们的慷慨、人道主义和再生思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意识到，必须刮起一场革命旋风，扫除这一切腐朽，用它的气息唤醒沉睡的心灵，给人类带来奉献、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没有这种精神，社会就会因堕落和卑鄙而沉沦，最终彻底解体。

在疯狂攫取财富的时期，在疯狂投机的时期，在危机四伏的时期，在大工业突然衰落、其他生产部门昙花一现的时期，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又迅速耗尽的时期，显而易见，控制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体制远没有给社会带来它们本应保证的繁荣；它们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混乱；不是繁荣，而是贫穷和不安全；不是利益的协调，而是战争；是剥削者与工人、剥削者与工人之间的长期战争。人们看到，人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同时又细分为成千上万个小组，彼此展开无情的战争。社会厌倦了这些战争，厌倦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急于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大声疾呼要彻底改造财产所有权制度、生产制度、交换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关系。

负责维护现有秩序的政府机器继续运转，但每转动一下变质的齿轮，它就会滑动和停止。它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它的缺陷所引起的不满也在不断增加。每天都有新的要求出现。“改革这个”、“改革那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改革者说：”战争、财政、税收、法院、警察，一切都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组和建立。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推倒重来，根本不可能改造任

何东西，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所有东西都必须立即进行改造；而当社会被分为两个公开敌对的阵营时，又如何进行改造呢？满足不满者只会制造新的不满者。

由于无法进行改革，因为这意味着要为革命铺平道路，同时又无力坦率地进行反动，执政机构只能采取半途而废的措施，这些措施无法让任何人满意，只会引起新的不满。在这样的过渡时期，那些负责掌舵国家航船的庸才们只想着一件事：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充实自己。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他们逃避，他们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他们很快就成功地切断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绳索；他们把政府淹没在因自己的无能而引起的嘲笑之中。

这种时期需要革命。革命成为社会的必然；形势本身就是革命。

当我们在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研究大规模革命动荡的起源和发展时，我们通常会在《革命的原因》这一标题下发现一幅扣人心弦的图画，描绘了事件发生前夕的局势。人民的苦难、普遍的不安全感、政府令人烦恼的措施、暴露社会巨大恶习的可憎丑闻、挣扎着浮出水面又被前政权支持者的无能所击退的新思想——无一遗漏。审视这幅图景，我们不难相信，革命确实不可避免，除了叛乱这条路，别无他法。

以历史学家描绘的1789年之前的情况为例。你几乎可以听到农民抱怨盐税、什一税和封建税款，并在心中发誓对封建男爵、僧侣、垄断者和法警恨之入骨。你几乎可以看到市民哀叹自己失去了市政自由，并对国王大加挞伐。人民斥责王后；他们对大臣们的行动报告感到愤怒，他们不断地呐喊：税收令人难以忍受，收入过高；庄稼欠收，冬天寒冷；粮食太贵，垄断者太把握；乡村律师吞食农民的庄稼，乡村治安官试图扮演小国王的角色；甚至连邮政服务都组织得很糟糕，雇员太懒。总之，一切都不顺利，人人都在抱怨。他们到处呐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会有个糟糕的结局”。

但是，在这种和平的争论与暴动或反抗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深渊——对大多数人类来说，这个深渊就在理智与行动、思想与意志——行动的冲动之间。这个深渊是如何弥合的？这些人昨天还在抽着烟斗低声抱怨自己的命运，下一秒就谦恭地向他们刚刚辱骂过的当地卫兵和宪兵敬礼，几天后，这些人怎么就能拿起镰刀和铁矛，攻打昨天还威风凛凛的领主的城堡呢？这些人的妻子理直气壮地称他们为懦夫，是什么奇迹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变成了英雄，在枪林弹雨中前行，征服了自己的权利？他们的言语常常像空洞的钟声一样湮没在空气中，是如何变成行动的？

答案很简单。

行动，少数群体不断更新的持续行动，带来了这种转变。勇气、奉献和牺牲精神与懦弱、屈服和恐慌一样具有传染性。

这种行动会采取什么形式呢？所有的形式——事实上，最多样的形式，由环境、气质和可支配的手段决定。有时是悲剧性的，有时是幽默的，但总是大胆的；有时是集体的，有时纯粹是个人的，这种行动政策将不会忽视手头的任何手段，不会忽视公共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以便保持精神活力，宣传和表达不满，激发对剥削者的仇恨，嘲笑政府并揭露其弱点，最重要的是，始终通过实际的榜样来唤醒勇气和激发反抗精神。

当一个国家出现革命形势时，群众的反抗精神必须被充分唤醒，从而在街头暴力示威或叛乱和起义中表现出来。在此之前，少数群体只有通过行动才能成功地唤醒独立意识和大胆精神，没有这些，革命就不会有结果。

有勇气的人，他们不满足于言辞，而是不断寻找将言辞转化为行动的方法；正直的人，他们的行为与理念合二为一；对他们来说，监狱、流放和死亡都比违背原则的生活更可取；无畏的灵魂，他们知道要想成功，就必须敢于

尝试；这些都是孤独的哨兵，在群众被充分唤醒，公开举起起义的旗帜，手持武器向征服自己的权利进军之前，他们就已经投入战斗。

在不满情绪、议论纷纷、理论探讨中，个人或集体的反抗行为会出现，象征着占主导地位的愿望。开始时，群众可能无动于衷。群众有可能在钦佩采取主动行动的个人或团体的勇气的同时，起初会追随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他们会直接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精神错乱”，并说“那些疯子、那些狂热分子会危及一切”。

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他们算计得很好，他们的党派慢慢地开展工作，也许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后，就会成功征服整个世界，而现在，意想不到的事情闯了进来！当然，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他们——那些谨慎小心的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只要对历史稍有了解，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早在理论家们决定行动的时刻到来之前，革命的理论宣传必然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尽管如此，谨慎的理论家们还是对这些疯子感到愤怒，他们将他们逐出教会，对他们大加挞伐。但是，疯子们赢得了同情，广大人民群众暗中为他们的勇气喝彩，他们也找到了模仿者。当先驱者们去监狱和刑罚殖民地充实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会继续他们的工作；非法抗议、造反和复仇的行为就会成倍增加。

从这一点出发，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那些一开始连问都不问“疯子”想要什么的人，现在不得不思考他们，讨论他们的想法，站在支持或反对的一边。通过迫使人们普遍关注的行动，新思想渗入人们的头脑并赢得皈依。几天之内，一个这样的行动可能比成千上万份小册子的宣传效果还要好。

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反抗精神：它滋生了胆识。在警察、地方法官、宪兵和士兵的支持下，旧秩序似乎是不可动摇的，就像巴士底狱这座古老的堡垒，在手无寸铁的人们眼中，它也是坚不可摧的，他们聚集在高高的城墙下，城墙上装备着荷枪实弹的大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既定秩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一次勇敢的行动在短短几天内就打乱了整个政府机构，让这个庞然大物颤抖不已；另一次起义则让整个省份陷入骚乱，迄今为止一直威风凛凛的军队在少数手持棍棒和石块的农民面前节节败退。人们发现，这个怪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他们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只需几个有力的努力，就足以将其击倒。他们心中萌生了希望，让我们记住，如果说恼怒常常驱使人们造反，那么，革命总是由希望——胜利的希望——促成的。

政府进行反抗，野蛮镇压。但是，尽管以前的迫害扼杀了被压迫者的活力，但现在，在激动时期，它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它激起了新的个人和集体反抗行动；它促使反抗者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这些行动迅速蔓延、普及和发展。革命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在此之前，这些力量对革命党是敌视或漠不关心的。这种普遍的瓦解渗透到了政府、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进行极限抵抗；另一些人则赞成让步；还有一些人甚至宣布自己准备暂时放弃特权，以安抚起义精神，希望日后能再次占据统治地位。政府和特权阶层的团结被打破了。

统治阶级也可能试图从野蛮的反动中找到安全感。但现在为时已晚；战斗只会变得更加惨烈、更加可怕，迫在眉睫的革命只会更加血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最小让步，由于来得太晚，由于是在斗争中夺取的，只会更加唤醒革命精神。以前对最小的让步都会感到满足的普通民众，现在看到敌人在动摇；他们预见到了胜利，他们感到自己的勇气在增长，以前被苦难压垮、只会暗自叹息的人们，现在抬起头来，自豪地迈向征服更美好的未来。

革命终于爆发了，由于之前的斗争十分惨烈，革命也变得更加可怕。

毫无疑问，革命的方向取决于各种导致大灾难的情况的总和。但是，可以根据不同进步政党在准备阶段所表现出的革命行动的活力，提前预测革命的方向。

一个政党可能更明确地发展了它所定义的理论 and 它希望实现的纲领；它可能通过演讲和印刷品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但是，它可能没有在公开场合、在大街上，通过体现其所代表的思想的行动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它对那些作为其主要敌人的人做得很少，或者什么也没做；它没有攻击它想要摧毁的制度；它的力量在于理论，而不是行动；它对唤醒反抗精神贡献甚微，或者忽视了将这种精神引向它特别希望在革命时期攻击的条件。因此，这个政党鲜为人知；它的愿望没有通过行动得到日常和持续的肯定，甚至连最偏远的小屋都能感受到行动的魅力；它们没有充分渗透到人民的意识中；它们没有与群众和街道相一致；它们从未在大众口号中得到简单的表达。

这种党派中最活跃的作家被他们的读者称为功勋卓著的思想家，但他们既没有行动者的声誉，也没有行动者的能力；在暴民涌上街头的那一天，他们更愿意听从那些理论思想不那么精确、抱负也不那么远大但更了解行动的人的建议。

在需要采取行动、冲锋在前以实现革命的那一天，谁的革命宣传最多，谁的精神和胆识最强，谁就会得到倾听。但是，在准备时期没有胆量以革命行动来肯定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推动力来激发人们和团体的忘我情怀，激发他们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不可抗拒的愿望（如果有这种愿望的话，在人民大众参加起义之前，它早就会以行动表现出来了），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旗帜深入人心，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愿望具体而全面的政党，即使是实现其纲领中最起码的一部分，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它将被行动党挤到一边。

我们从大革命之前的历史中可以学到这些东西。革命的资产阶级完全明白这一点——当他们试图摧毁君主制秩序时，他们没有忽视任何唤醒反抗精神的鼓动手段。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在讨论废除封建权利的问题时，本能地理解了这一点；当国际试图唤醒城市工人的反抗精神，并引导他们反对雇佣劳动者的天敌——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垄断者时，它也是按照同样的原则行事的。

《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基础和原则》的摘要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则摘要是为伦敦《十九世纪》杂志的保守派读者撰写的，1887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克鲁泡特金将其修订为小册子形式。这是他所有著作中对自由共产主义最简单、最清晰的论述。

第一部分阐述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追溯了支持自由而非国家控制形式的证据，并引用了进化论者对这种不受政府控制的终极自由概念的认同。他从生产组织入手，说明合作控制和平等分享财富将如何增加世界的货品财富，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少数特权阶层对财富的占有是一直阻碍合作生产的罪恶，必须予以废除，以保证进一步走向平等和自由。这一经济讨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运动的共同观点，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则没有任何独特的贡献。

在第二部分中，克鲁泡特金从其他革命流派所不认同的观点出发，列举了自由共产主义的证据。他回答了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中包括一些耳熟能详的实际问题，如“你将如何对待那些不遵守约定的人？”“不强迫就不工作的人怎么办？”以及“你必须有一个政府来保护

社会不受罪犯的侵害”等耳熟能详的实际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对非政府活动的实际说明，世界上的主要工作都是通过这些活动完成的。

对于那些希望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际应用无政府主义原则的人来说，这里的证据以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呈现。

然而，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改变了对产品分配的看法。见本小册子末尾的注释。

I

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制度——无政府主义有双重起源。它是十九世纪，特别是其第二阶段经济和政治领域两大思想运动的产物。与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土地、资本和机器的私有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它注定要消失；所有生产必需品必须而且将会成为社会的共同财产，并由财富的生产者共同管理。与最先进的政治激进主义一样，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组织的理想状态是：政府职能降到最低限度，个人恢复充分的主动性和行动自由，通过自由组合的团体和联盟来满足人类无限多样的需求。

关于社会主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得出了它的最终结论，即彻底否定工资制度和共产主义。至于政治组织，通过进一步发展激进主义纲领的上述部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将政府职能降为零，即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一个无政府的社会。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坚持认为，既然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理想如此，就不能把它寄托在未来世纪中，而只有那些符合上述双重理想，并构成对这一理想的接近的社会组织变革，才会有生存的机会，才会对大同世界有益。

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遵循的方法，则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主义者所遵循的方法。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并不诉诸形而上学的概念（如“自然权利”、“国家义务”等）来确立他所认为的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最佳条件。相反，他遵循的是现代进化哲学的路线。他研究的是现在和过去的人类社会；他既不赋予整个人类以优越的品质，也不赋予单独个人以他们所不具备的品质，只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的集合体，试图找出将个人需求与合作需求结合起来以造福人类的最佳方式。他研究社会，试图发现其过去和现在的趋势，以及日益增长的知识 and 经济需求，在他的理想中，只是指出了进化的方向。他区分了人类群体的真正需求和趋势，以及阻碍这些趋势得到满足的意外事件（知识匮乏、迁徙、战争、征服）。他总结说，在我们的历史中，有两种最突出的趋势（尽管往往是无意识的）：第一种趋势是将生产所有财富的劳动整合在一起，以便最终无法区分共同生产中应归属于个人的部分；第二种趋势是个人在实现对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有利的所有目标时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仅仅是对他所认为的下一阶段进化的总结。这不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科学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本世纪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观点在工人阶级中的迅速传播。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我们目睹了我们的生产能力空前地突然增长，导致财富的积累超出了最乐观的预期。但是，由于我们的工资制度，在科学工作者、管理者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财富的增长只导致了资本所有者手中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而工人的命运则是苦难增多，人人生活无保障。非熟练工人不断寻找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即使是收入最好的工匠和熟练工人，也长期面临着因某些不可避免的持续产业波动和资本恣意妄为而陷入与非熟练工人相同境况的威胁。

现代的百万富翁挥霍着人类的劳动成果，享受着华丽而虚荣的奢华，而穷人则沦落到悲惨而无保障的境地。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因此越来越大，以至于打破了社会的团结——社会生活的和谐——并危及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工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越来越意识到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组织能力，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耐心地忍受社会分成两个阶级。随着社会各阶层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随着知识在群众中传播，他们对平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对社会重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工人要求分享自己生产的财富，要求参与生产管

理，不仅要求获得一些额外的福利，还要求享有科学和艺术的全部权利。这些以前只有社会改革家才会提出的要求，现在开始由越来越多在工厂工作或耕种土地的人提出。它们如此符合我们的正义感，以至于它们在特权阶级中得到了越来越多少数人的支持。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十九世纪的思想；无论是强制还是伪改革，都无法阻止它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人们对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扩大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些让步并没有得到经济关系中相应变化的支持，因此被证明是痴心妄想。它们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状况。因此，社会主义的口号是：“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唯一可靠基础。”只要目前的工资制度及其恶果不改变，社会主义的口号就会继续鼓舞工人。社会主义将继续发展壮大，直至实现其纲领。

与经济领域的这一伟大思想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关于政治权利、政治组织和政府职能的类似运动。政府受到了与资本同样的批评。当大多数激进分子在普选权和共和体制中看到政治智慧的最后一句话时，少数人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政府和国家的职能及其与个人的关系受到了更尖锐、更深刻的批判。代议制政府在广泛的领域中进行了试验，其缺陷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缺陷显然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代议制本身所固有的。事实证明，议会及其

行政机构无法处理社会的所有事务，也无法调和一个国家中各个部分的不同且往往相反的利益。事实证明，选举无法找出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人，也无法以党派精神以外的方式管理他们不得不立法的事务。这些缺陷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代议制的原则本身受到了批评，其公正性也受到了怀疑。

同样，当社会主义者走上前台，要求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权力，委托它管理现在由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覆盖的巨大领域时，中央集权政府的危险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受托管理工业和贸易的政府会不会成为自由与和平的永久危险，甚至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本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巨大困难。尽管他们深信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个人自由的必要性。我们的社会改革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革，不惜将社会置于任何神权或独裁统治之下。因此，我们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看到，具有先进见解的人分为政治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前者不信任后者，因为他们认为后者会危及文明国家经过长期斗争才赢得的政治自由。即使是现在，当全欧的社会主义者都已成为政党并信奉民主信仰时，大多数公正

的人仍然有理由担心，如果人民国家或“人民国家”的政府被委托管理包括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那么它对自由的危害将不亚于任何形式的专制。

然而，最近的演变已经为展示一种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铺平了道路，这种社会组织既能保证经济自由，又不会使个人沦为国家的奴隶。我们对政府的起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抛开了所有关于政府起源于神或“社会契约”的形而上学概念，政府在我们中间似乎是相对现代的起源，其权力的增长恰恰与社会分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历史进程成正比。代议制政府也被贬低了其真正的价值——它只是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提供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自由政治组织的理想。至于把国家视为进步的领导者的哲学体系，随着人们发现进步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最为有效，它也越来越受到动摇。因此，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显然不在于将权力和管理职能进一步集中在一个管理机构的手中，而在于权力下放，包括领土和职能的下放——在行动范围和职能性质方面对公共职能进行细分；在于将现在被视为政府职能的所有职能交由自由组成的团体主动行使。

这股思潮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生活中。巴黎公社的兴起和随后的卡塔赫纳公社——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似乎被忽略了——揭开了历史新的一

页。如果我们不仅分析这场运动本身，而且分析它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以及公社革命期间所表现出的倾向，我们就会认识到，这场运动表明，在未来，社会发展较为先进的人类聚居区将试图开始独立的生活；它们将努力以身作则，改变一个国家较为落后的地区，而不是通过法律和武力强加自己的观点，或者屈从于多数人的统治，因为多数人的统治始终是一种平庸的统治。同时，公社内部代议制政府的失败也证明，自治和自我管理必须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领土意义上的自治和自我管理。要使自治和自我管理有效，还必须将其融入自由社区的各种生活职能中。仅仅在领土范围内限制政府的行动范围是行不通的——代表制政府在城市和在国家中都有缺陷。因此，生活为无政府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也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提供了新的动力。

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上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种趋势的正义性，并从它们身上看到了平等需求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平等需求正是历史上所有斗争的本质所在。因此，与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改革者说：“只要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只要劳动者在经济上仍然是雇主的奴隶，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平等意义上的实质性改革，也不可能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我们也要对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者说：“如果不同时对

政治组织进行深刻的修改，就无法改变现有的财产条件。你们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放弃议会统治。生活中每一个新的经济阶段都对应着一个新的政治阶段。绝对君主制与农奴制相对应。代议制政府与资本统治相对应。然而，两者都是阶级统治。但是，在一个资本家和劳动者区别已经消失的社会里，不需要这样的政府；它将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麻烦。自由的工人需要一个自由的组织，而这个组织除了自由协议和自由合作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基础，否则个人的自主性就会被国家无孔不入的干预所牺牲。”无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无政府制度。

因此，无政府主义体系意味着人类从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综合本世纪两大强大思潮的代表。

在得出这些结论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证明与进化哲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通过揭示组织的可塑性，进化哲学显示了有机体对其生活条件的令人钦佩的适应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使集体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性和集体各组成部分对自由合作的需要的适应性更加完善的能力的发展。它使我们熟悉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整个有机自然世界中，共同生活的能力随着有机体整合成复合集体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完整而成正比地增长；因此，它加强了社会道德家已经表达的关于人性完美性的观点。它向我们表明，

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最适者”将被证明是那些把知识和生产财富所必需的知识结合起来的人，而不是那些因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曾经是一时最强大而现在最富有的人。

通过说明“生存斗争”不能仅仅从个人之间为生存手段而斗争的狭义上理解，而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即物种的所有个体都要适应物种生存的最佳条件，以及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生活和幸福的最大可能总和，它使我们能够从人类的社会需求和习惯中推导出道德科学的规律。它向我们展示了实在法在道德进化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以及利他主义情感的自然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它强化了社会改革者的观点，即有必要改变生活条件以改善人类，而不是在生活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试图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善人性。最后，通过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它得出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研究历史和当前趋势得出的结论，即进一步的进步是财富和综合劳动的社会化与个人尽可能充分的自由相结合。

在漫长的岁月中，允许人们增加生产甚至继续生产的一切东西都被少数人占有了。土地的价值恰恰来自于它是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但它却属于少数人，他们可以阻止社会耕种它。煤矿代表着几代人的劳动，其价值也来自于制造商和铁路的需求，来自于所进行的巨大贸易和人口密度，但煤矿又属于少数人；如果他们选择将其资本用

于其他用途，他们甚至有权停止开采煤矿。蕾丝花边织机目前的完美状态代表了兰开夏织工三代人的心血，它也属于少数人；如果发明第一台蕾丝花边织机的织工的孙子们要求他们有权让其中一台机器运转起来，他们会被告知：

“把手拿开！这台机器不属于你们！”如果不是因为现在人口稠密，工业、贸易和交通发达，铁路多半会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铁；而这些铁路又属于少数人，属于少数股东，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这条铁路在哪里，而这条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年收入比中世纪的国王还要多。如果那些在挖掘隧道时死去的成千上万人的后代聚集在一起——一群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人——去向股东讨要面包或工作，他们会遭到刺刀和子弹的袭击。

谁敢说这样的组织是正义的？但是，不公正的东西不可能造福人类，而事实也并非如此。由于这种畸形的组织，一个工人的儿子，当他能够工作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一亩地可以耕种，没有一台机器可以开动，除非他同意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的父亲和祖父尽其所能开垦田地或建造工厂——没有人能做得比这更多——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比野蛮人还要穷困潦倒。如果他从事农业，他将被允许耕种一块土地，但条件是他必须把自己的部分产品交给地主。如果他从事工业，他将被允许工作，但条件是在他生产的30先令中，10先令或更多

将被机器所有者收入囊中。我们大声疾呼反对封建贵族，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在土地上定居，除非向庄园主交纳四分之一的庄稼；但我们继续像他们那样做——我们扩展了他们的制度。形式变了，但本质不变。工人被迫接受我们称之为“自由契约”的封建条件，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条件。一切都被别人占有了；他必须接受交易，否则就得挨饿。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生产走上了歧途。它不考虑社会的需要；它的唯一目的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因此，我们的工业不断波动，几乎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危机，使几十万人失业，他们陷入彻底的苦难，他们的孩子在贫民窟长大，随时可能成为监狱和劳改所的囚犯。工人们无法用他们的工资购买他们生产的财富，工业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中间寻找市场。它必须在东方，在非洲，在任何地方找到市场；它必须通过贸易，在埃及、印度、刚果增加农奴的数量。但在任何地方，它都会发现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这些国家正在迅速进入同样的工业化轨道。为了争夺世界市场的霸主地位，必须进行战争，持续不断的战争——争夺东方的战争，争夺海洋的战争，争夺对外国商品征收重税的权利的战争。欧洲的炮

声不绝于耳；整整几代人不时遭到屠杀；我们把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军备——穷人们知道这是多么困难才筹集到的收入。

最后，财富分配不公对我们的道德产生了最令人遗憾的影响。我们的道德原则是：“但是，如果让一个孩子遵循这一原则，脱下自己的外套送给瑟瑟发抖的穷人，他的母亲就会告诉他，他绝不能理解直接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果他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他就会赤着脚，而不会减轻周围的苦难！道德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行动上。我们的传教士说：“谁工作，谁祈祷。”每个人都努力让别人为他工作。他们说，“永远不要撒谎！”而政治就是一个弥天大谎。我们让自己和孩子们习惯于生活在这种双面道德之下，这就是虚伪，并通过诡辩来调和我们的双面性。虚伪和诡辩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但是，社会不可能生活在这样的道德之下。它不可能长久：它必须，也一定会被改变。

因此，这个问题不再仅仅是面包问题。它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整个领域。我们的结论是：“生产资料 and 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手段是由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 and 满足社会所有需求的手段是由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创造的，因此必须由所有人支配。私人占有生产必需品既不公平，也无益处。必须将所有人置于财富的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同等地位。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摆脱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压迫所造成的恶劣条件。这将是朝着平等和自由的方向取得更大进步的唯一保障，而平等和自由一直是人类的真正目标，尽管这个目标并不为人所知。”

II

上文关于综合努力是我们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个人努力获得适当报酬的唯一公平方案。曾几何时，一个从事农业并辅以少量家务劳动的家庭可以把自己种的玉米和织的普通毛布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别人的劳动成果。即使在那个时候，这种观点也不完全正确：森林的开垦和道路的修建都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家庭也需要不断地申请公共帮助，在许多乡村社区，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但现在，在每个分支都对其他分支提供支持的相互交织的工业状态下，这种个人主义的观点已不复存在。如果说我国的钢铁贸易和棉纺织业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发展水平，那么它们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发展水平，是由于成千上万个其他大大小小的行业也在同时发展；是由于铁路系统的扩展；是由于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和广大工人的知识增加；是由于生产者中慢慢形成了一定的组织训练；最重要的是，由于千里之外的工程，世界贸易本身也发展起来了。在开凿苏伊士运河时死于霍乱的意大利人，或在圣哥达隧道中死于“隧道病”的意大利人，他们对国家富强的贡献，不亚于在曼彻斯特为机器服务而过早衰老的英国姑娘；这个姑娘对国家富强的

贡献，不亚于对我们的机器进行了省力改进的工程师。我们怎能妄自估算他们每个人在我们周围积累的财富中所占的确切份额呢？

我们可以钦佩一位钢铁大王的创造才能或组织能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他的所有天才和精力都用来与蒙古牧羊人或西伯利亚农民打交道，而不是与英国工人、英国工程师和值得信赖的经理打交道，那么他的所有天才和精力在这里所实现的价值连十分之一都达不到。一位英国百万富翁成功地推动了本国工业的一个分支，有一天有人问他，在他看来，他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总是为企业的某一分支寻找合适的人选，并让他完全独立，当然，我自己则进行全面监督。”下一个问题是：“你从来没有找不到这样的人吗？”“从来没有。”“但在你引进的新部门中，你需要一些新发明。”“毫无疑问，我们花了数千美元购买专利。”在我看来，这一小段对话概括了那些工业企业的现实情况，那些鼓吹“对个人努力给予适当报酬”的人引用了这些情况，他们将数百万美元赠与繁荣工业的管理者。它表明了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是“个人的”。撇开有时允许一个人充分展示、有时又阻止他充分展示其能力的千百种条件不谈，我们可以问一问，如果同样的雇主找不到值得

信赖的经理和熟练的工人，如果数以百计的发明创造没有受到这个国家如此众多居民的机械思维的刺激，同样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带来同样的结果。

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像集体主义者那样认为，与每个人生产财富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报酬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甚至可能是一个接近理想的社会。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这个问题必须单独进行研究——我们必须说，在我们看来，集体主义的理想在一个把生产必需品视为共同财产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社会将不得不完全放弃工资制度。集体主义学派淡化的个人主义似乎不可能与共同拥有土地和机器所隐含的部分共产主义共存，除非由一个比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政府都要强大得多的政府强制推行。目前的工资制度是从少数人占有生产必需品中发展起来的；它是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试图向工人支付其产品的全部价值，用工时支票代替货币，它也不可能长盛不衰。共同占有生产必需品意味着共同享受共同生产的成果；我们认为，只有放弃一切工资制度，只有当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为共同的福利作出贡献，并应尽其所能从社会的共同储备中享受其需要时，才会出现公平的社会组织。

此外，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且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趋势正是走向无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尽管个人主义的发展看似矛盾。在个人主义的发展中（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个人从不断增长的资本和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的努力。但是，在这种增长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整个历史上，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财富的生产者还在进行着潜在的斗争，以保持旧时的部分共产主义，并在有利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式重新引入共产主义原则。十世纪、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公社一旦能够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就会广泛推广共同劳动、共同贸易和部分共同消费。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但是，农村公社为保持其古老的特征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东欧、瑞士，甚至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成功地保持了这些特征；同时，基于同样原则的新组织也在可能的地方不断发展壮大。

尽管本世纪的商人生产给公众的思想带来了利己主义的倾向，但共产主义的倾向仍在不断地重新表现出来，并试图进入公共生活。便士桥在公共桥面前消失了，收费公路在免费公路面前消失了。同样的精神充斥着成千上万的其他机构：博物馆、免费图书馆和免费公立学校；公园和游乐场；铺设路面和照明的街道，免费供每个人使用；向

私人住宅供水，而且越来越倾向于不考虑个人使用的确切数量；电车和铁路已经开始采用季票或统一税，当它们不再是私有财产时，肯定会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它的方向是将个人的需求置于对他已经或可能为社会提供的服务的评价之上；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它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为任何个人提供的服务就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的服务。大英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并不询问读者以前为社会做过什么，他只是向读者提供所需的书籍；一个科学协会只需支付统一费用，就可以让每个会员自由支配它的花园和博物馆。救生船的船员不会询问遇险船只上的人是否有权冒着生命危险获救；囚犯援助协会也不会询问获释囚犯的价值。这里的人需要服务；他们是同胞，不需要更多的权利。

倘若这座今天如此自负的城市遭遇公共灾难——比如像1871年的巴黎一样被围困，并在围困期间遭遇食物匮乏——这座城市会一致宣布，首先要满足的是儿童和老人的需求，无论他们为社会做出了或曾经做出过什么贡献。它还会照顾城市的积极保卫者，无论他们每个人表现出的英勇程度如何。但是，我想，既然这种趋势已经存在，没有人会否认，只要人类从艰苦的生存斗争中解脱出来，同样的趋势就会愈演愈烈。如果我们的生产能力能够充分地用于不断增加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如果改变目前的财产条

件，使现在不是财富生产者的人都成为生产者；如果体力劳动重新在社会中占据荣誉一席之地，那么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趋势就会直接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更考虑到私有财产如何变为共同财产这一问题的实际方面，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一旦目前的财产制度发生变化，社会的下一步将是共产主义意义上的。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专制学派的共产主义：它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自由的共产主义。它是综合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两大目标——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我已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无政府。我们很清楚，“无政府状态”一词在当前的措辞中也被用作混乱的同义词。但是，“无政府状态”作为一个引申义，至少意味着两个假设（supposition）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哪里没有政府，哪里就会出现混乱；此外，它还意味着由于有强大的政府和强大的警察，秩序总是有益的。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都存在着大量的秩序——我们应该说是和谐，令人高兴的是，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并不干预。至于秩序的有益影响，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的那种秩序肯定比不上加里波第挑起的一些混乱；而这个国家的新教徒可能会说，路德制造的混乱无论如何比不上教皇统治下的秩序。虽然大家都

认为和谐总是可取的，但对于秩序，对于我们现代社会中所谓的“秩序”，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因此，我们完全不反对使用“无政府状态”一词来否定人们通常所说的秩序。

我们以无政府状态作为我们的口号，意在表达人类社会的一种明显趋势。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人类的一小部分打破统治者的权力，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正是经济和思想最进步的时代。无论是自由城市的发展，其无与伦比的纪念碑——工人自由协会的工作——仍然证明了思想的复兴和公民的福祉；还是孕育宗教改革的伟大运动——当个人恢复其部分自由时，这些时代见证了最伟大的进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文明国家当前的发展，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不断发展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地限制政府的行动范围，以便把越来越多的自由留给个人的主动性。在尝试过各种政府，并努力解决“既能迫使个人服从，又能使自己摆脱服从集体”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之后，人类现在正试图摆脱任何政府的束缚，通过追求共同目标的个人之间的自由理解来满足其对组织的需求。

地方自治，即使是最小的领土单位或团体，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自由协议正在成为法律的替代品。自由合作取代了政府监护。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那些被视为政府职能的活动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争议；社会越是不受管理，

就越能发展得更好。我们越是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政府在满足人们对其期望方面的不足，就越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通过不断限制政府的职能，正朝着将其最终减至零的方向迈进。我们已经预见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个人的自由将不受任何法律和束缚的限制，除了他自己的社会习惯和每个人都感受到的在邻里之间寻求合作、支持和同情的必要性之外，别无其他。

当然，“无政府伦理”至少会像“无资本经济学”一样遭到反对。我们的思想已经被政府天意功能的偏见所熏陶，以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必须以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都在培养一种信念，即政府的必要性及其有益影响。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哲学体系被详细阐述；历史从这一观点出发被书写；法律理论也出于同样的目的被传播和传授。所有的政治都基于同样的原则，每个政治家都对他希望支持的人说：“把政府的权力交给我；我将会，我能够让你们摆脱目前生活的困境。”我们的所有教育都渗透着同样的教义。我们可以翻开任何一本社会学、历史学、法学或伦理学的书籍：随处可见的是，政府、政府的组织、政府的行为在其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我们渐渐习惯于认为，国家和政治人物就是一切；大政治家背后什么都没有。新闻界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教导。整整一个专栏都是关于议会辩论和政治人物

动向的最细微记录。在阅读这些专栏时，我们常常会忘记，除了那些重要性已经膨胀到足以掩盖人类的少数人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事实上是人类——在成长和死亡，在幸福或悲伤中生活，在劳动和消费，在思考和创造。

然而，如果我们从印刷品回到现实生活中，并对社会的现状进行广泛的审视，我们就会发现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数百万人的生老病死都与政府无关。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在没有政府丝毫干预的情况下完成；签订协议的人丝毫没有破坏协议的意图。不，那些不受政府保护的协议（交换协议或卡债协议）也许比任何其他协议都更好地得到了遵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守诺言的简单习惯和不失去信任的愿望就足以强制人们遵守协议。当然，如果有必要，政府也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不用说那些甚至无法提交法院审理的无数案件，每一个对贸易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证实这样的论断：如果在遵守协议方面没有如此强烈的荣誉感觉，贸易本身就会变得完全不可能。即使是那些用贴有标签的各种令人憎恶的药品毒害顾客的商人和制造商，他们也丝毫不感到悔恨，甚至他们也遵守他们的商业协议。但是，如果在目

前的条件下，当致富成为主要动机时，商业诚信这种相对道德还存在的话，那么，一旦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不再是我们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样的情感就会很快进一步发展。

本世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也表明了同样的无政府趋势。这就是私人倡议所覆盖的领域不断扩大，以及最近仅仅由于自由协议而产生的大型组织的发展。欧洲的铁路网——一个由众多分数独立协会组成的联合体——以及由众多独立建造并联合在一起的铁路线直接运送旅客和商品，甚至连欧洲铁路中央委员会都没有成立，就是仅仅通过协议就能实现的最显著的例子。如果五十年前有人预言，由这么多独立公司建造的铁路最终会像今天这样构成一个完美的网络，那么他肯定会被当成傻瓜。有人会说，这么多公司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没有一个得到欧洲国家国际公约支持并被赋予政府权力的国际铁路委员会，它们是不会达成一致的。但是，尽管如此，协议还是达成了。荷兰的船主和船东协会现在正将其组织扩展到德国的河流，甚至波罗的海的航运贸易。数不胜数的联合制造商协会和法国的辛迪加就是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如果说这些组织中许多是剥削组织，那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如果追求自己的利己主义利益（往往是非常狭隘的利益）的人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受到更好启发的人，被迫与其他团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必然会更容易、更好地达成一致。

但也不乏追求更崇高的自由组织。救生艇协会无疑是本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自成立之初，救生船协会就拯救了不少于三万二千人的生命。它唤起了人类最崇高的本能；它的活动完全依赖于对共同事业的奉献，而它的内部组织则完全基于地方委员会的独立性。医院协会和数以百计的类似组织也可以在这个标题下提及，它们的活动规模很大，覆盖的领域也很广。然而，当我们对政府及其行为为了如指掌时，我们对自由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又了解多少呢？为了记录政府的行为，我们已经写了几千卷书；法律带来的最微不足道的改善也被记录了下来；它的好影响被夸大了，它的坏影响却被悄无声息地忽略了。但是，哪有一本书记录了灵感迸发的人们通过自由合作所取得的成就呢？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社团成立，以满足文明人无限多样的需求。我们有各种研究学会——其中一些涵盖了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另一些则局限于一个小的特殊分支；有体操学会，有速记学会，有研究独立作家的学会，有游戏和各种体育学会，有促进维持生命的科学的学会，也有支持毁灭生命的艺术的学会；有哲学学会，也有工业学会，有艺术学会，也有反艺术学会；有认真工作的学会，也有纯粹消遣的学会——总之，没有哪一个方向的学会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供人们施

展才能的。每天都有新的社团成立，而每年都有旧的社团聚合成更大的单位，跨越国界结成联盟，在某些共同的工作中进行合作。

这些无以计数的自由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它们不断蚕食以前属于国家或市政府的领域。莱芒湖畔一个瑞士村庄的住户现在至少属于十几个不同的社团，这些社团为他提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市政府职能的服务。瑞士许多地方的道路和喷泉、富饶的葡萄园、整齐的森林和草地都是这些联合会的功劳。除了这些在有限范围内代替国家的小团体外，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其他团体在更大范围内做着同样的事情吗？

红十字会无疑是最近出现的最杰出的社团之一。在战场上屠杀士兵，这仍然是国家的职责；但正是这些国家认识到它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伤员：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私人倡议。二十五年前，一个可怜的“乌托邦主义者”竟敢说，伤员的护理工作可以交给私人团体去做，这将会遭到怎样的嘲笑啊！“没有人会去危险的地方！医院都会聚集在不需要它们的地方！国家竞争会导致可怜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死去，等等”——人们会发出这样的惊呼。1871年的战争表明，那些从不相信人类智慧、献身精神和理智的预言家是多么有远见。

我们认为，这些事实——数量如此之多，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刚刚提到的这些有机体是如此自然地成长起来，它们是如此迅速地扩展和如此容易地聚集在一起，成为文明人需求倍增的不可避免的产物，它们如此有效地取代了国家的干预，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日益增长的因素。现代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就是自由人的自由组合，从而取代政府履行以前赋予它的所有职能，而这些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履行得非常糟糕的。

至于议会统治和代议制政府，它们正在迅速走向衰败。少数哲学家已经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但他们只是怯懦地总结了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选出几个人，委托他们就所有可能的问题制定法律，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些问题却一无所知，这简直是愚蠢之极。人们逐渐认识到，多数决制与其他任何一种决策方式一样都是有缺陷的；人类正在寻找和发现解决悬而未决问题的新渠道。邮政联盟并没有选出一个国际邮政议会来为所有加入联盟的邮政组织制定法律。欧洲铁路也没有选出一个国际铁路议会来管理列车运行和国际运输收入的分配。欧洲的气象学会和地质学会也没有选出气象议会或地质议会来规划极地站，或确定地质构造的统一划分

和地质图的统一颜色。他们是通过协议的方式开展工作的。为了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召开了代表大会；但是，在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时，他们并没有对代表们说：“你们想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吧，我们会服从的”。他们先提出问题，自己先讨论，然后派代表去了解大会要讨论的特殊问题，他们派去的是代表，而不是统治者。他们的代表从大会回来时，口袋里没有法律，却带着协议提案。这就是现在（也是非常古老的）处理公共利益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代议制政府制定法律的方式。

代议制政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给了法庭统治致命的一击；它通过辩论唤起了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兴趣。但是，如果在代议制政府中看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生活的每一个经济阶段都意味着其自身的政治阶段；要触动当前经济生活的基础——私有财产——而不相应地改变政治组织的基础是不可能的。生活已经表明了变革的方向。不是增加国家的权力，而是在现在被认为是国家属性的所有部门中实行自由组织和自由联合。

对上述观点的反对意见不难理解。当然会有人说：“但是，对那些不遵守约定的人该怎么办呢？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怎么办？对那些宁愿违反社会成文法或无政府主

义者假设其不成文习俗的人怎么办？无政府主义也许对更高尚的人类有好处，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好处。”

首先，协议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协议，它是在自由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在对协议各方同等开放的不同途径之间的自由选择。还有一种是强制协议，由一方强加于另一方，后者纯粹出于无奈而接受；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协议，这只是对无奈的屈从。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被称为协议的大部分都属于后一类。当一个工人向雇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完全知道他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会被雇主不公正地拿走；当他出卖劳动力时，他甚至没有丝毫被雇用的保证，甚至没有连续六个月的保证，把这称之为自由合同是一种可悲的嘲弄。现代经济学家可以称其为自由，但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却从未犯过这种错误。只要有四分之三的人被迫签订这种协议，当然就需要武力，既要强制执行所谓的协议，又要维持这种状态。为了防止劳动者占有他们认为被少数人不公正地占有的东西，就必须使用武力——大量的武力；为了不断地把新的“未开化国家”置于同样的条件下，就必须使用武力。

但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使用武力来强制执行自由达成的协议。我们从未听说过对一个属于救生艇船员的人施加惩罚，而他在某一时刻却宁愿放弃这个团体。如果他犯有严重过失，他的同志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拒绝与他

有任何进一步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因词典撰稿人延误工作而对其处以罚款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宪兵驱赶加里波第的志愿军上战场的事情。自由协议无需强制执行。

至于经常重复的反对意见，即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没有人会去劳动，在美国解放奴隶和俄国解放农奴之前，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我们已经有机会认识到它的合理价值。因此，我们不会试图说服那些只能通过既成事实才能说服的人。至于那些讲道理的人，他们应该知道，如果说人类在其最低阶段的某些部分确实是这样，或者说，如果说某些小群体或单独的个体在与不利条件的斗争中因不成功而陷入纯粹的绝望是这样，那么，文明国家的大多数却不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工作是一种习惯，而无所事事则是一种人为的增长。当然，如果做一个体力劳动者意味着被迫终生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生产某样东西的某个部分——比如说，一个针头；如果做一个体力劳动者意味着领取的工资只能使一个家庭在严格限制其所有需求的条件下生活；如果做一个体力劳动者意味着总是面临着明天就会被解雇的威胁——我们知道工业危机是多么频繁，以及它们意味着怎样的苦难；当它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是死在救济院，就是过早地死在贫民疗养院时；当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意味着，在那些靠这些“手”的工作为生的人眼中，穿戴成终生都是低人

一等的印记时；当它总是意味着放弃科学和艺术赋予人类的所有那些更高的享受时——哦，那么难怪每个人——包括体力劳动者——都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升到别人为他工作的地位。

过劳是人类的天性，而不是工作。过度劳累是为了给少数人提供奢侈品，而不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工作是生理需要，是消耗身体能量的需要，是健康和生命本身的需要。如果说现在很多有用的工作都做得很勉强，那只是因为它们意味着过度劳累，或者它们组织得不恰当。但是，我们知道，老富兰克林就知道，如果我们都从事生产性工作，如果我们不像现在这样浪费我们的生产能力，那么每天从事四小时有用的工作，就足以让每个人拥有一栋中等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宅。

至于那个重复了五十年的幼稚问题“坦率地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科学家中间没有一个人从事过这样的工作，哪怕他一生中只有一天。如果说还有一些工作本身确实令人不快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从来就不屑于考虑如何使它不那么令人不快。他们一直都知道，有很多挨饿的人愿意为了每天几美分而去做工。”

至于第三个主要的反对意见，即认为政府有必要惩罚那些违反社会法律的人，要谈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无法附带提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越多，就越能得出这样的

结论：社会本身要对其内部发生的反社会行为负责，而任何惩罚、监狱和刽子手都无法减少这种行为的数量；只有重组社会本身。

在每年提交到我们法庭的所有行为中，有四分之三直接或间接地源于当前社会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混乱状态，而不是源于人性的变态。至于因个人的反社会倾向而产生的相对较少的反社会行为，我们并不能通过监狱，甚至也不能通过刽子手来减少它们的数量。通过监狱，我们只会让他们更加猖獗，变本加厉。通过我们的侦探、我们的“血的代价”、我们的处决和我们的监狱，我们在社会上散布了如此可怕的最卑劣的激情和习惯，以至于那些充分认识到这些机构的影响的人，会被社会在维护道德的借口下所做的事情所吓倒。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补救办法，而补救办法早已指明。

当然，现在当一个母亲为她的孩子寻找食物和住所时，她必须经过那些摆满了最精致美味佳肴的商店；当华丽而无礼的奢华与最可恶的苦难并存时；当富人的狗和马得到的照顾远远胜过那些母亲在矿坑或工厂赚取可怜工资的数百万儿童时；当一位女士每件“朴素”的晚礼服都代表着八个月或一年的辛勤劳动；当“上层阶级”公开宣称以别人的钱致富，而诚实和不诚实的赚钱手段之间没有明

显的界限，那么武力就是维持这种状态的唯一手段。于是，一支由警察、法官和刽子手组成的军队就成了必要的机构。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我们也有能力提供这种教育；如果每个家庭都能生活在体面的家庭中——而且在我们目前的高生产率下，他们也能生活在体面的家庭中；如果每个男孩和女孩在接受科学教育的同时都能学会一门手艺，而不成为财富的手工生产者则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象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更加密切，并不断接触那些现在属于少数人的公共事务；如果由于接触更加密切，我们对邻居的困难和痛苦的关心程度与我们以前对自己亲属的困难和痛苦的关心程度一样强烈，那么我们就应该求助于警察和法官，求助于监狱和处决。反社会行为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受到惩罚。出现的少数争执将很容易由仲裁人解决；执行他们的裁决所需的武力不会比现在执行中国宗族家法的裁决所需的武力多。

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一个不承认法律并宣称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中，道德会变成什么样子？公共道德独立于法律和宗教，并且先于法律和宗教。迄今为止，道德教义一直与宗教教义联系在一起。但是，宗教教义以前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近来已逐渐消失，而

道德从宗教中获得的认可也不再具有以前的力量。在我们的城市里，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古老的信仰。难道这就是我们把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并把它当作原始宇宙论一样冷嘲热讽的理由吗？

显然不是。如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某些道德原则，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于欺骗自己的同胞；如果我们永远无法依赖彼此的承诺和言语；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同胞当作敌人，对他们采取一切战争手段都是正当的，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宗教信仰已经衰落，但道德的原则仍然没有动摇。我们甚至看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试图提高当前的道德标准。事实上，道德原则与宗教信仰无关：它们先于宗教信仰。原始的楚克奇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只有迷信和对大自然敌对势力的恐惧；然而，我们却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希伯来人传授的同样的道德原则。不，他们的某些习俗意味着部落道德标准比我们文明社会中的道德标准要高得多。

事实上，每一种新的宗教都是从唯一真正的道德宝库中汲取其道德原则的——一旦人们联合起来共同生活在部落、城市或国家中，他们的道德习惯就会随之滋长。任何动物社会都不可能不滋生某些相互支持、甚至为共同福祉而自我牺牲的道德习惯。这些习惯是物种在生命斗争中获

得福祉的必要条件——在保护物种的斗争中，个体间的合作比个体间为生存手段而进行的肉体斗争重要得多。有机世界中的“适者”是那些习惯于社会生活的人；而社会生活必然意味着道德习惯。就人类而言，在其漫长的生存过程中，已经在其内部形成了社会习惯和道德习惯的核心，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这种核心就不会消失。因此，尽管目前的经济关系对我们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但我们的道德习惯核心依然存在。法律和宗教只是制定了这些习惯，并努力通过它们的认可来实施这些习惯。

无论道德理论的种类有多少，都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宗教道德、功利主义道德和社会生活需要所产生的道德习惯理论。每一种宗教道德都通过使其规定源于启示来使其神圣化，并试图通过许诺今生或来世的奖赏或惩罚来使其教义深入人心。功利主义道德保留了奖赏的观念，但它从人本身找到了奖赏。它请人们分析自己的快乐，对快乐进行分类，并优先选择那些最强烈、最持久的快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一体系被大多数人认为过于矫揉造作。最后，第三种道德体系——无论其种类如何——认为道德行为——那些最能使人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仅仅是个人享受其同胞的欢乐、

在其同胞受苦时受苦的必要条件；是一种习惯和第二天性，在社会生活中慢慢形成和完善。这就是人类的道德；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的道德。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每一条原则都会伤害许多偏见，但每一条原则都是对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趋势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它们中的每一条都蕴含着丰富的后果，意味着对许多现有观点的彻底修正。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对遥远未来的洞察。现在，无论个人的行动范围如何，他都可以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或相反的路线行事。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一切，都将朝着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前进。而所有与此相反的行动，都是在试图迫使人类走向它不愿去的地方。

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补充说明

克鲁泡特金早先关于革命夺取财产后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法的著作，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货品资源，可以各取所需，尽其所能地工作。在经历了俄国革命之后，他得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识到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障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困，并在1919年出版的一个《反抗者的话》俄文版的后记中表达了他改变了的观点。他组织生产的方法沿袭了他以前的教导，但他在俄国革命后对这一方法的阐述增加了其趣味性。(R.N.B.)

《一个叛逆者的话》后记摘录

社会革命重建生活的问题只是笼统地提出……。遗憾的是，有必要指出，社会主义者和广大劳动者对在不久的将来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了希望，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革命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我们的普热

（Pouget）同志在《我们如何进行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在工会的领导下，法国如何能够完成社会革命；这些工会和代表大会如何能够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并在新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而丝毫不停止生产。很显然，只有工人通过自己的组织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虽然我在某些细节上与普热的观点不同，但我还是向所有理解人类必须进行的社会重建的必然性的人推荐这本书。

我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学习时，一直试图了解工人的真实生活，并始终关注以下问题：社会革命将采取何种形式，才能在没有太大冲击的情况下从私人生产过渡到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组织的生产和交换体系？

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生产和交换是一项如此复杂的事业，以至于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者的计划（这些计划必然导致党的领导）一旦应用于生活，就会被证明是绝对无效的。如果工人自己不通过他们的工会在每个产业部门组织生产，那么任何政府

都无法组织生产；因为在所有生产中，每天都会出现成千上万的困难，这些困难是任何政府都无法解决或预见的。当然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只有成千上万研究问题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才能合作发展新的社会制度，为成千上万的地方需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我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文明国家目前的经济生活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资格指导生产；另一类人由于能力有限，只能为雇主劳动。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在宣扬这一理论。英国的雇佣阶级就是这样富裕起来的。其他国家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以牺牲落后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富裕起来的。但是，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我们会得出另一个结论：到目前为止，再也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富裕起来了。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愿意继续处于提供原材料的地位。所有国家都渴望发展制造业，而且都在逐步这样做……发展各国人民福利的道路只在于工农业的结合，而不是将各国人民划分为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这种细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休止的战争，为工业占领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因此，社会革命无论在哪里爆发，都必须把增加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在解放的最初几个月里，消费必然会增加，而生产则会减少。此外，任何实现社会革命的国家都会被不友好的或实际上是敌人的邻国包围……总之，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消费的增加，因为全欧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痛苦之中，缺少衣服和其他货品。对产品的需求会增加，而生产却会减少，最后饥荒就会来临。避免饥荒的办法只有一个：我们应该明白，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一旦开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在于工人和农民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组织起来，以迅速提高产量。但是，只有当国民经济的全部责任——今天掌握在众多部长和委员会的手中——以简单的形式呈现在每个村庄和城市、每个工厂和商店的面前，成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当他们明白他们必须自己来指导国民经济的时候，他们才会相信这种必要性。

《无政府主义道德》的摘要

这篇关于我们所说的“道德”的起源和功能的研究报告是在一个有趣的情况下为出版小册子而写的。一位在英国经营商店的无政府主义者发现，他在运动中的同志们认为，不付钱就拿走他的货品是完全正确的。在他们看来，“各取所需”似乎是让那些最有能力的人买单的理由。克鲁泡特金于是不仅谴责了这种学说，而且动情地为同志们写了这篇布道。

其道德概念基于《互助论》中提出的思想，后来在《伦理学》中得到了发展。在这里，这些思想被具体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对与错”。作品以细腻的情感和尖锐的锋芒直指当前道德的弊端。

克鲁泡特金认为所有所谓的道德观念都来源于原始迷信。指导我们社会行为的真正道德意识是本能的，它基于群体生活中固有的同情和团结。互助是成功的社会生活的条件。因此，道德的基础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你也要怎样对别人”这一古老的金科玉律，这也是店主的无政府主义顾客的道德观。

克鲁泡特金说，征服者、剥削者和祭司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培养的围绕法律、宗教和权威的迷信歪曲了这种天然的道德感。因此，道德成了统治阶级保护其特权的工具。

他捍卫为人类利益而杀人的道德，如暗杀暴君，但从不会为自己杀人。与惩罚相比，他认为爱与恨是控制不法行为的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他坚决反对“账本道德”——只为得到好处而做正确的事——而主张“在你周围播种生命”的满足和快乐，为你的同胞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这并不是要本着慈善的精神为他们做好事，而是要与他们融为一体，平等分享。

I

人类思想史就像钟摆的摆动，需要数百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沉睡之后，思想迎来了觉醒的时刻。然后，思想摆脱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统治者、律师、教士——精心为她套上的枷锁。

她打破了枷锁。她对自己所学到的一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揭露了自己所处的宗教、政治、法律和社会偏见的空洞。她在新的道路上开始研究，用新的发现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创造了新的科学。

但是，思想的宿敌——政府、立法者和牧师——很快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分散的力量聚集在一起，重塑他们的信仰和法典，使之适应新的需要。然后，他们利用自己如此有效地培养起来的女性和性格的奴性，利用社会一时的混乱，利用一些人的懒惰、另一些人的贪婪和许多人最美好的希望，首先通过教育攫取童年，轻轻地爬回他们的工作岗位。

孩子的精神是脆弱的。用恐惧来胁迫他们是如此容易。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让孩子胆怯，然后跟他谈论地狱的折磨；在他面前描绘死刑犯的痛苦和无情的上帝的报复。下一分钟，他们又会喋喋不休地谈论革命的恐怖，并利用革命者的一些过激行为让孩子成为“秩序之友”。牧

师让孩子习惯于法律的观念，以便更好地服从他所谓的“神圣的法律”，而律师则大谈神圣的法律，以便更好地服从民法。

通过这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顺从习惯，下一代的思想保留了这种既奴性又权威的宗教色彩；因为权威和奴性永远是并行不悖的。

在这些无聊的插曲中，道德问题很少被讨论。宗教习俗和司法虚伪取而代之。人们不会批评，只会被习惯或冷漠所牵引。他们不会站出来支持或反对既定的道德。他们尽力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符合自己的职业。

人身上所有美好、伟大、慷慨或独立的东西，都会渐渐长出青苔，像一把废弃的刀一样生锈。谎言变成了美德，陈词滥调变成了责任。发财致富、抓住机会、用尽智慧、热情和精力，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成了安逸阶层以及以资产阶级形象为理想的穷人的口头禅。于是，统治者和法官、神职人员以及或多或少的安逸阶层的堕落变得如此令人反感，以至于钟摆开始向另一边摆动。

渐渐地，青年解放了自己。他们抛弃偏见，开始批判。思想开始觉醒，起初只是少数人的觉醒，但不知不觉中，觉醒的人越来越多。冲动一起，革命随之而来。

每一次，道德问题都会再次出现。“从宗教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大脑问道：‘我为什么要遵循这种虚伪道德的原则？为什么任何道德都是强制性的？’”

于是，人们在没有向自己解释的情况下，就试图解释他们处处遇到的道德情感。只要他们认为这是人性的特权，只要他们不从动物、机器和岩石的角度去理解它，他们就永远无法解释它。然而，他们却在当今的科学中寻找答案。

而且，如果我们大胆地说，传统道德的基础，或者说充斥其间的虚伪越被削弱，社会的道德水平就越高。正是在这种时候，人们批判和否定道德的时候，道德情感才会取得最大的进步。正是在这种时候，道德情感才得以成长、提升和完善。

多年前，俄罗斯的年轻人就曾为这个问题而热血沸腾。一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跑来对他的朋友说：“我要不道德！”就这样，他把那些让他无法安宁的想法付诸了行动。“我会不道德，为什么我不能？因为这是《圣经》的意愿吗？但《圣经》不过是巴比伦和希伯来传统的集合，是像荷马史诗那样，或者像现在的巴斯克诗歌和蒙古传说那样，被收集和拼凑起来的传统。难道我还要回到东方半文明民族的思想状态吗？

"难道我必须因为康德告诉我一个绝对命令、一个从我自身深处向我发出并要求我遵守道德的神秘命令而遵守道德吗？但是，为什么这个‘绝对命令’对我的行为比其他命令（有时可能命令我喝醉）具有更大的权威呢？一个词，只不过是一个词，就像“天意”或“命运”这些词一样，是为了掩盖我们的无知而发明的。"

“或者，我的道德是为了满足边沁的要求，他想让我相信，如果我为了救一个掉进河里的路人而淹死，我会比眼睁睁看着他淹死更快乐？”

"或许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因为我母亲教给我道德？难道因为我们的母亲，我们善良无知的母亲，教给我们这样一派胡言，我就应该去教堂跪下，荣耀女王，在我认识的法官面前鞠躬道歉吗？"

"我有偏见——和其他人一样。我要努力摆脱偏见！即使不道德是令人厌恶的，我也要强迫自己不道德，就像我小时候强迫自己放弃对黑暗、教堂墓地、鬼魂和死人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我从小被灌输的恐惧。"

"扣动被宗教滥用的武器是不道德的；我愿意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以一个被冠以道德之名的词的名义强加给我们的虚伪！"

当俄国青年打破旧世界的偏见，打出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哲学的旗帜时，他们就是这样推理的：不向任何权威屈膝，无论它多么受人尊敬；不接受任何原则，只要它不是由理性确立的。

还需要补充的是，虚无主义青年把他们父辈的教诲扔进废纸篓，焚烧了所有的道德体系之后，在他们中间形成了道德习俗的核心，比他们父辈在《福音》《良知》《绝对命令》或功利主义者《公认优势》的控制下实行的任何东西都要高明得多。但是，在回答“我为什么要讲道德”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这个问题提得好不好；让我们先分析一下人类行动的动机。

II

当我们的祖先希望解释是什么导致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事时，他们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天主教的图像来表达这种解释：一个人走在路上，左肩扛着一个魔鬼，右肩扛着一个天使，却丝毫没有察觉。魔鬼促使他作恶，天使则试图阻止他。如果天使得到了最好的结果，而这个人仍然善良，另外三个天使就会抓住他，把他带到天堂。通过这种方式，一切都得到了奇妙的解释。

深谙此道的俄罗斯老护士会告诉你，在哄孩子睡觉时，千万不要不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脖子下方应该留出一个温暖的地方，让守护天使可以依偎在那里。否则，即使在睡梦中，魔鬼也会让孩子担心。

这些毫无艺术性的概念正在消逝。但是，虽然古老的词语消失了，本质的思想却没有改变。

养尊处优的人们不再相信魔鬼，但由于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们的护士更理性，所以他们只是用哲学的名义把魔鬼和天使伪装成迂腐的文字。他们现在不说“魔鬼”，而是说“肉体”或“激情”。天使被“良知”或“灵魂”取代，被“神圣造物主思想的反映”或“伟大建筑师”取代，正如自由共济会所说的那样。但人的行为仍被表述为

两种敌对元素斗争的结果。一个人总是被认为是具有德行的，只是这两种元素中的一种——灵魂或良知——战胜了另一种——肉体或激情。

我们不难理解，当英国哲学家以及后来的百科全书派开始反驳这些原始思想，宣称魔鬼和天使与人类的行为无关，而人类的一切行为，无论好坏、有益还是有害，都源于一个单一的动机：享乐的欲望时，我们的曾祖父会感到多么惊讶。

整个宗教团体，尤其是法利赛人的众多教派，都高呼“不道德”。他们侮辱思想家，将他们逐出教会。本世纪晚期，当本瑟姆（Bentham）、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特尔尼舍夫斯基（Tchernischevsky）等人再次提出同样的观点，当这些思想家开始肯定并证明利己主义或享乐欲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真正动机时，诽谤加倍了。这些书被封杀，作者被当作傻瓜。

然而，还有什么比他们的断言更真实呢？

这是一个从孩子手中夺走最后一口面包的人。每个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可怕的利己主义者，他只受自私的支配。

但现在有另外一个人，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他把最后一点面包分给饥饿的人，脱下外衣给赤身裸体的人穿。道德家们坚持他们的宗教术语，急忙说这个人邻居的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地步，他服从的是与利己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激情。然而，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无论这两种行为对人类的结果有多大的差异，其动机仍然是相同的。那就是追求快乐。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送给别人，他觉得这样做没有乐趣，他就不会这样做。如果他觉得从一个孩子那里拿走面包是一种乐趣，他也会这么做，但这对他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他觉得给予是快乐的，所以他给予。如果不是不便在新的意义上使用具有公认含义的词语而造成混淆，那么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人都是在利己主义的冲动下行事的。实际上，有些人这样说，是为了突出思想，准确地表述观点，使其具有强烈的想象力，同时也是为了打破认为这两种行为具有两种不同动机的神话。它们的动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

以最恶劣的恶棍为例：梯也尔屠杀了三万五千名巴黎人，刺客屠戮了整个家庭，以便沉湎于放荡之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荣耀或金钱的欲望在他们心中暂时压倒了其他一切欲望。即使是怜悯和同情，也会被这另一种欲望、另一种渴求暂时熄灭。他们的行为几乎是自动的，

以满足他们天性中的渴望。或者，撇开更强烈的激情不谈，就拿欺骗朋友的小人物来说吧，他每一步都是为了从别人那里骗取一罐啤酒的价钱，或者纯粹是出于爱吹牛，或者出于狡猾。就拿欺骗工人为妻子或情妇购买珠宝的雇主来说吧。随便找个小无赖，他也只是顺从一种冲动。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是为了逃避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事情。

我们几乎羞于将这样的卑鄙小人与为解放被压迫者而牺牲自己的全部生命、像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一样走上断头台的人相提并论。对人类来说，这两种生活的结果是如此巨大的不同；我们感到自己被一种生活所吸引，被另一种生活所排斥。

然而，如果你与这样一位殉道者交谈，与这位即将被绞死的妇女交谈，即使就在她临近绞刑架的时候，她也会告诉你，她不会用自己的生命或死亡去换取那些靠偷工钱过活的小无赖的生命。在她的生活中，在与滔天强权的斗争中，她找到了最高的乐趣。斗争之外的一切，资产阶级的一切小欢乐和小烦恼，在她看来都是那么可鄙、那么令人厌倦、那么可怜！“你不是在生活，你是在沉溺”，她回答道，“我已经生活过了”。

当然，我们说的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一系列无意识的、几乎是机械的行为，这些行为占据了我们的生活的一大部份。在有意识的行为中，人总是在寻找能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

一个人酩酊大醉，每天都把自己贬低到野蛮人的地步，因为他要从酒中寻求自己的神经系统所无法获得的神经兴奋。另一个人不会喝醉；他不喝酒，即使他认为喝酒很爽，因为他想保持思想的清新和能力的充沛，以便他能够品尝其他的乐趣，而他更喜欢喝酒。但是，如果他不像一个好生活的评判者那样，在瞥了一眼精心准备的晚餐菜单后，拒绝一道他非常喜欢的菜，而去吃他更喜欢的另一道菜，那他又如何行事呢？

当一个女人舍弃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把它分给第一个来的人时，当她脱下自己的破衣烂衫，盖在另一个寒冷的女人身上，而她自己却在船甲板上瑟瑟发抖时，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看到一个饥饿的男人或一个因寒冷而挨饿的女人，会比自己发抖或感到饥饿更痛苦。她逃避了一种痛苦，而这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它的强烈程度。

盖尤（Guyau）所引用的那个澳大利亚人，当他想到自己还没有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而虚脱时；当他变得消瘦、苍白，意识到自己的懦弱，直到完成复仇行动后才重新振

作起来时，他就会做出这个动作，有时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动作，让自己从一种占有他的感觉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而这种平静是最高级的快乐。

当一群猴子看到自己的一个成员被猎人射中而倒下，不顾枪口的威胁，围攻猎人的帐篷并抢走尸体时；当这群猴子中的长老直接冲进去，先是威胁猎人，然后恳求他，最后通过哀鸣诱使猎人放弃尸体，这群呻吟着的猴子把尸体抬进森林时，这些猴子的同情心比任何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都要强烈。它们的这种情感超越了其他一切情感。当它们不确定是否能恢复同伴的生命时，生命本身对它们就失去了吸引力。这种感情变得如此压抑，以至于这些可怜的野兽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它。

当成千上万的蚂蚁冲进人类这头恶兽点燃的熊熊燃烧的蚁丘火焰中，为了拯救它们的幼虫而成百上千地死去时，它们又一次顺从了拯救后代的渴望。它们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养大的幼虫带离火场，其细心程度超过了许多妇女对自己孩子的爱护。

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这是有机世界的一般行为准则（有人会说是法则）。

如果没有这种对合意的追求，生命本身就不可能存在。生物会解体，生命也会停止。

因此，无论一个人的行动和行为方式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服从于他天性中的渴求。最令人厌恶的行为、无动于衷的行为或最吸引人的行为一样，都是由行为者的需求所决定的。任凭他如何行动，个人之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从中找到了快乐，或避免了痛苦，或认为自己避免了痛苦。

这里有一个公认的实事。这就是所谓自私主义理论的精髓所在。

很好，得出这个一般性结论后，我们的处境是否会好一些呢？

是的，我们当然是。我们征服了一个真理，摧毁了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正是一切偏见的根源。所有与人相关的唯物主义哲学都隐含在这一结论中。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漠不关心的，就像有些人急于得出的结论那样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

III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的行为（他们有意识的行为，因为我们随后会谈到无意识的习惯）都有相同的起源。那些被称为美德的行为和那些被称为恶行的行为，伟大的虔诚和琐碎的技巧，吸引人的行为和排斥人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所有行为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本性的某种需要。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快乐，避免痛苦。

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这只是对大量事实的一个非常简洁的总结，而这些事实都可以用来支持这一观点。

不难理解，这种解释会让那些仍然受宗教原则熏陶的人大喊大叫。它没有给超自然留下任何空间。它抛弃了灵魂不朽的观念。如果人只是顺从其本性的需要而行动，如果他只是一个“有意识的自动机”，那么不朽的灵魂又会怎样呢？不朽又是什么呢？不朽是那些享乐太少、受苦太多、梦想在另一个世界找到补偿的人最后的避难所吗？

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在偏见中长大的人，那些对经常欺骗他们的科学缺乏信心的人，那些被感觉而不是思想所引导的人，是如何拒绝一种夺走他们最后希望的解释的。

IV

摩西、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家都曾借助神的启示来区分善恶。他们看到，人，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无知者还是博学者，倒行逆施者还是善良正直者，总是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尤其是总是知道自己行为的恶。由于他们找不到对这一普遍事实的解释，就把它归结为神的启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则告诉我们良知，告诉我们神秘的“命令”，而归根结底，他们只是改变了措辞而已。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如何估计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惊人的事实：生活在社会中的动物也能像人类一样区分善恶。而且，它们的善恶观念与人类的性质相同。在鱼类、昆虫、鸟类、哺乳动物等每一类动物中发展最好的代表，它们的善恶观念甚至是完全相同的。

蚂蚁观察家福尔（Forel）通过大量的观察和事实证明，当一只嗉囊里装满蜂蜜的蚂蚁遇到其他肚子空空的蚂蚁时，后者直接就会向它索要食物。在这些小昆虫中，满足的蚂蚁有责任吐出蜂蜜，让饥饿的朋友们也能得到满足。问问蚂蚁们，如果自己吃饱了，却不给同一蚁丘的其他蚂蚁食物，这样做对不对？它们会用不可能出错的行动回答说，这样做是极其错误的。如此自私的蚂蚁会比其他

物种的敌人受到更严厉的对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战斗中，蚂蚁就会停止战斗，扑向它们自私的同伴。这一事实已被实验所证明，排除了一切疑问。

或者，再问问住在你花园里的麻雀，当有人扔出一些面包屑时，不通知所有的小社会，让大家都来分享美食，这样做对不对？问它们，那只篱笆麻雀从邻居的窝里偷了他捡来的稻草，而小偷却懒得自己去捡，这样做对不对？麻雀们会回答说错得离谱，它们会飞向小偷并啄他。

或者问问旱獭们，如果一只旱獭拒绝同群的其他旱獭触及进入它的地下仓库，这样做对不对？它们会用各种方式与守财奴争吵，并回答说这是大错特错的。

最后，问问原始人，在部落成员不在的时候，在他的帐篷里拿食物是否正确。他会回答说，如果这个人可以自己获得食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好留下自己的帽子或刀子，甚至是一根打结的绳子，这样，不在的猎人回来时就会知道是朋友来过，而不是强盗。这样的预防措施可以让猎人不必要因为帐篷附近可能有劫掠者而焦虑不安。

我们可以引用成千上万的类似事实，写成整整一本书，来说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善恶观念是多么一致。

蚂蚁、小鸟、旱獭、野人既没有读过康德教父的书，甚至也没有读过摩西的书。但他们都有同样的善恶观念。如果你稍稍反思一下这种观念的根源，你就会直接发现，在蚂蚁、旱獭、基督教或无神论道德家那里被视为善的东西，是对种族的保存有益的东西；而被视为恶的东西，是对种族的保存有害的东西。不是像边沁（Bentham）和密尔（Mill）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种族的公平和美好。

因此，善恶观念与宗教或神秘的良知无关。它是动物种族的自然需要。当宗教创始人、哲学家和道德家告诉我们神性或形而上学的实体时，他们只是在重述每只蚂蚁、每只麻雀在其小社会中的做法。

这对社会有用吗？那就是好的。有害吗？那就是坏事。

这种观念在低等动物中可能会受到极大限制，在高等动物中可能会扩大，但其本质始终不变。

在蚂蚁中，它不会超越蚁丘。所有的社交习俗、所有的良好行为准则都只适用于这一个蚁丘中的个体，而不适用于任何其他蚁丘。一个蚁丘不会把另一个蚁丘视为同属一个家族，除非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双方都遇到了共同的困难。同样，巴黎卢森堡公园里的麻雀，虽然它们会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互相帮助，但它们会与来自蒙日广场的

另一只麻雀拼死搏斗，因为后者胆敢闯入卢森堡公园。野蛮人会把另一个部落的野蛮人看成是自己部落的习俗不适用的人。甚至可以卖给他，而卖总是或多或少地抢了买主的钱；买主或卖主，一个或另一个总是“被卖”。一个 Tchoutche 人会认为卖给自己部落的成员是一种犯罪：他给他们的东西是不计成本的。而文明人，当他终于理解了自己与最简单的巴布亚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虽然乍看之下难以察觉，但他会把团结的原则扩展到整个人类，甚至动物。这种想法在不断扩大，但其基础却始终如一。

另一方面，善恶的概念会随着智力或知识水平的不同而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原始人可能认为，当年迈的父母成为社会的负担——主要是沉重的负担——时，吃掉他们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说，对种族是有益的。他可能还认为，杀死新生儿，每家只留两三个，这样母亲就可以哺育他们到三岁，并对他们施以更多的温柔，这对社会也是有益的。

在我们的时代，观念已经改变，但生存手段却不再是石器时代的模样。文明人并不像野蛮人家族那样，不得不在两害相权中做出选择：要么吃掉年迈的父母，要么所有人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很快就会发现无法同时养活

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我们必须把自己带入那个我们几乎无法在脑海中唤起的时代，然后才能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半野蛮人的推理可能足够正确。

思维方式可能会改变。对种族有益或有害的估计会改变，但基础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整个动物界的哲学，我们会发现，蚂蚁、鸟类、旱獭和人类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通过对整个动物王国的观察，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它还补充道：“请注意，这只是一条建议；但这条建议是动物在社会中长期经验的结晶。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量社会动物中，按照这一原则行事已成为一种习惯。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原则，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任何种族都不可能战胜它必须与之斗争的自然障碍。”

观察社会动物和人类社会得出的这个非常简单的原则真的如此吗？它是否适用？这个原则又是如何变成一种习惯并不断发展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了解的。

V

善恶观念存在于人类本身。无论人的智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无论他的观念如何被偏见和个人利益所掩盖，他都会把对他所生活的社会有益的东西视为善，把对社会有害的东西视为恶。

然而，这种概念往往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几乎无法将其与感觉区分开来。这种概念从何而来？有千千万万的人从未思考过人类。他们大多只知道氏族或家庭，很少知道国家，更少知道人类。尽管他们有着狭隘、自私的利益，但他们怎么会认为对人类有益的东西是好的，甚至会对自己的宗族产生一种团结的感觉呢？

这一事实一直困扰着思想家们，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将依次阐述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我们要顺便指出的是，尽管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但事实本身仍然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我们的解释不是真实的，或者不完整，那么事实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仍然存在。我们也许无法完全解释行星绕太阳公转的起源，但行星还是在公转，其中一颗行星带着我们在太空中公转。

我们已经谈到了宗教方面的解释。神学家说，如果人能够区分善恶，那么是上帝给了他这种启示。是有益还是有害，他无权过问；他必须服从造物主的命令。我们不会

停留在这种解释上，因为这是野蛮人无知和恐惧的结果。我们继续。

还有人试图用法律来解释这一事实。一定是法律让人类产生了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的意识。我们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种解释。他们知道，法律只是利用了人的社会情感，在人所接受的道德戒律中加入了各种对剥削少数人有用的规定，而人的本性却拒绝服从这些规定。法律扭曲了正义感，而不是发展正义感。让我们再次继续。

我们也不要停下来听功利主义者的解释。他们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却忘记了人与整个种族休戚与共的情感。功利主义者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并不是真理的全部。因此，让我们更进一步。

我们之所以能够猜测到道德情感的起源，部分原因还是要归功于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这部因宗教偏见而沉睡不醒、甚至在反宗教思想家中也鲜为人知的优秀著作中，指出了道德情操的真正起源。他没有在神秘的宗教情感中寻找道德情感，而是在同情的情感中找到了道德情感。

你看到了一个男人殴打着一个孩子。你知道被打的孩子很痛苦。你的想象力会让你自己去承受孩子所遭受的痛苦；或许是孩子的眼泪、孩子痛苦的小脸告诉你。如果

你不是懦夫，你就会冲向打孩子的野蛮人，把孩子从他手中救出来。

这个例子本身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的道德情感。你的想象力越丰富，你就越能想象出任何生命在遭受痛苦时的感受，你的道德感也就越强烈和细腻。你越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越能感受到他人所遭受的痛苦、侮辱和不公正，就越能促使你采取行动，阻止痛苦、侮辱或不公正的发生。环境、周围的人或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越强烈，你就越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的要求去做，道德情感就越会在你心中滋长，并成为习惯。

这就是亚当·斯密用大量实例阐述的内容。亚当·斯密年轻时就写下了这本远胜于他晚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摆脱了宗教偏见，从人性的物理事实中寻求道德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官方和非官方的神学偏见将这本论文列入黑名单。

亚当·斯密唯一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这种处于习惯阶段的同情心在动物和人之间同样存在。

团结互助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动物的主要特征。鹰吞食麻雀，狼吞食旱獭。但是，鹰和狼在捕食时分别互相帮助，麻雀和旱獭则互相团结，共同对付猛兽和猛禽，以至于只有非常笨拙的麻雀和旱獭才会被抓住。在所有动物

社会中，团结都是一种自然法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生存斗争，统治阶级用一切可能最有利于使我们窒息的方式来歌颂生存斗争的美德。

当我们研究动物世界，并试图为自己解释每个生物为生存而与不利环境和敌人进行的斗争时，我们会意识到，团结和平等的原则在动物社会中发展得越好，并成为动物社会的习惯，动物社会就越有可能在与困难和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取得胜利。每个社会成员对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团结互助的感受越强烈，他们身上的两种品质就会发展得越彻底，而这两种品质正是一切进步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勇气，另一方面是自由的个人主动性。相反，任何动物社会或小动物群体越是失去这种团结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是由于特别稀缺或特别丰富的结果——进步的另外两个要素，即勇气和个人的主动性，就越是减少。最后，这两个要素消失了，社会也就衰败了，在敌人面前沉沦了。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斗争；没有勇气，没有主动性，没有团结，也就没有胜利！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例子来证明，在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互助法则是如何成为进步的法则，互助以及由此产生的勇气和个人主动性又是如何确保最有能力实行互助的物种取得胜利。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地球上出现最初的动物生命以来，这种团结互助的情感经历了千百万个时代。让我们想象一下，这种情感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变成一种习惯，并通过遗传从最简单的微观生物传给它的后代——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人类——我们就会理解道德情感的起源，它对动物来说就像食物或消化食物的器官一样，是一种必需品。

如果不往前追溯，不说复杂的动物是从极其简单的小生命群中产生的，这里就是道德情感的起源。为了把这个大问题压缩在几页纸的篇幅内，我们不得不说得非常简短，但已经说得足够多了，足以说明这并不神秘，也不感伤。如果没有个体与物种之间的这种团结，动物王国就永远不会发展，也不会达到今天的完美境界。地球上最先进的生物仍将是那些在水中游动、在显微镜下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斑点之一。这也会存在吗？因为最早的细胞聚集本身不就是在斗争中联合的一个例子吗？

VI

因此，通过对动物王国不带偏见的观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有社会存在的地方，就可能存在这一原则：在类似的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

当我们仔细研究动物世界的进化过程时，我们会发现，上述原则在动物界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个体之间为获取个人利益而进行的斗争所产生的所有适应性。

在人类社会中，团结的程度显然更高。即使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猴子社会，也是实际团结的杰出典范。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大自然设置的重重障碍中保全自己弱小的种族，并发展自己的智慧。

只要仔细观察一下那些仍停留在石器时代水平的原始社会，就会发现同一社区的成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团结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即使是最糟糕的历史时期，实际团结也从未停止过。即使在统治、奴役和剥削的暂时环境下，这一原则也不会被抛弃，但它仍然深深地存在于许多人的思想中，随时准备对邪恶的制度发起强烈的反击，即一场革命。否则，社会就会灭亡。

对于绝大多数动物和人来说，这种感觉仍然是，而且必须是一种后天养成的习惯。即使在行动中不断被忽视，这种原则也始终存在于头脑中。

我们身上体现的是动物界整个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它以亿年计。

即使我们想摆脱它，也摆脱不了。对于一个人来说，让自己习惯四肢着地走路比摆脱道德情感要容易得多。在动物进化的过程中，道德感比人类的直立姿势更早出现。

道德感就像嗅觉或触觉一样，是我们的一种自然能力。

至于同样宣扬这一原则的法律和宗教，它们不过是剽窃了这一原则，为自己的商品披上了外衣，为征服者、剥削者和牧师的利益发出了禁令。如果没有这个正义性得到普遍认可的团结原则，他们又怎么能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呢？

他们每个人都用它来遮盖自己，就像用衣服来遮盖自己一样；就像权威一样，通过冒充弱者的保护者来抵御强者，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通过抛弃法律、宗教和权威，人类可以重新获得被夺走的道德原则。重获道德原则后，他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批判，并将其从牧师、法官和统治者已经毒化并仍在毒化的掺杂物中剔除。

除了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之外，还有什么比平等原则、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呢？如果一个人不践行这一原则，他怎么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

我们不希望被统治。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岂不是宣布，我们自己不希望统治任何人？我们不希望被欺骗，我们希望永远只被告知真相。我们不希望说假话，只说真话！难道我们不正是以此声明，我们自己不希望欺骗任何人，我们保证永远只说真话吗？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劳动成果被窃取。通过这一事实，难道我们没有宣布我们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吗？

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以一种方式对待我们，而自己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别人？我们的平等意识会对这种想法产生反感。

相互关系中的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团结，是动物世界为生存而战的最有力武器。平等就是公平。

我们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就等于事先宣布：我们不接受任何我们不愿意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我们将不再容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能够以一种让我们感到恼火的方式使用他们的力量、狡猾或能力来对付我们。万物平等，这是公平的同义词，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不仅要向法律、宗教和权威这抽象

的三位一体宣战。通过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向所有的欺骗、狡诈、剥削、堕落、邪恶——一句话，不平等——的浪潮宣战。我们向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宣战。被统治者、被欺骗者、被剥削者、妓女，首先伤害的是我们的平等意识。正是以平等的名义，我们决心不再有被卖淫、被剥削、被欺骗和被统治的男人和女人。

也许有人会说——有时也有人这么说——“但是，如果你认为你必须总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你有什么权利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你们有什么权利向你们国家的野蛮或文明入侵者放炮？你们有什么权利剥夺剥削者的财产？你们有什么权利杀死暴君和毒蛇？”

什么权利？你从法律中借来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想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觉得自己做得好？那些我尊敬的人会认为我做得好吗？这就是你所问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答案很简单。

是的，当然！因为我们如果去侵略对我们没有任何伤害的缅甸人或祖鲁人，我们自己就会像毒兽一样被杀死。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儿子或朋友说：“如果我参与入侵，就杀了我！”

是的，当然！如果我们违背自己的原则，攫取从天而降的遗产，并将其用于剥削他人，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被剥夺财产。

是的，当然！因为任何一个有心人都会事先请求，如果他变得毒辣，就把他杀死；如果他取代了被废黜的暴君的位置，就把匕首插入他的心脏。

一百个有妻子和孩子的男人中，有九十九个会试图自杀，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伤害他们所爱的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快要疯了的话。每当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感到自己对所爱的人变得危险时，他就会希望在自己变得危险之前死去。

佩罗夫斯卡娅和她的同志们杀死了俄国沙皇。尽管全人类都厌恶流血，尽管全人类都同情一个允许农奴获得解放的人，但全人类都承认他们有权这样做。为什么？不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行为是有益的；三分之二的人仍然怀疑这种行为是否有益。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即使有再多的黄金，佩罗夫斯卡娅和她的同志们也不会同意自己成为暴君。即使是那些对这出戏剧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肯定，这不是年轻人的逞能，不是宫廷阴谋，也不是攫取权力的企图。这是对暴政的憎恨，甚至是对自我的蔑视，甚至是对死亡的憎恨。

有人说，“这些男男女女”征服了杀人的权利；有人说路易丝·米歇尔，“她有抢劫的权利”。还有人说，“他们有权偷窃”，说的是那些靠干面包为生的恐怖分子，他们偷走了基希讷乌的一两百万财宝。

人类从来没有拒绝过对那些征服了这一权利的人使用武力的权利，无论是在街垒上还是在十字路口的阴影下。但是，如果这种行为要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就必须征服这种权利。否则，这种行为无论是否有用，都将仅仅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思想进步中毫无重要性可言。人们在其中看到的只是武力的转移，只是一个剥削者对另一个剥削者的替代。

VII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人类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即那些有意为之的行为。但是，在有意识的生活的同时，我们还有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它的范围要广得多。然而，我们只要注意一下自己早上穿衣服的样子，试着系一下昨晚弄丢的纽扣，或者伸手去拿一件被自己挪开的东西，就会对这种无意识的生活有所了解，并意识到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它占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四分之三。我们说话的方式、微笑的方式、皱眉的方式、在讨论中发火或保持冷静的方式，都是无意的，是习惯的结果，是从我们人类或人类之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只要注意一下愤怒的人和愤怒的野兽在表情上的相似之处就知道了），或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习得的。

因此，我们对他人的行为方式往往会成为一种习惯。人和所有善于交际的动物都会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作一种习惯。以至于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甚至不会问自己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或者在强烈的激情冲动下，他才会犹豫不决，他大脑的各个部分之间才会发生斗争——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它的各个部分在一定程

度上是独立行动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就会在想象中把自己代入与他对立的人；他会问自己是否愿意受到这样的对待，他越是把自己与他的尊严或利益即将受到伤害的人相提并论，他的决定就越有道德感。或者，他的朋友也会对他说：“设身处地想一想，你是否也会像他对待你一样对待他？”这就足够了。

因此，我们只有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才会诉诸平等原则，在一百种情况中有九十九种都是出于习惯而采取道德行为。

显而易见，在我们迄今为止所说的一切中，我们并没有试图规定任何事情。我们只是阐述了动物世界和人类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方式。

以前，教会用地狱来威胁人们，以道德化他们，结果反而使他们士气低落。法官则以他从社会中攫取的那些社会原则的名义，用监禁、鞭刑、绞刑架来威胁人们；他使人们丧失了道德。然而，法官可能与牧师同时从地球上消失，这一想法本身就会让各种专制主义者大呼社会危险。

但我们并不害怕放弃法官及其判决。我们放弃各种制裁，甚至道德义务。我们不怕说“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行动将始终朝着有益于社会的方向发展，这

与他们的开明程度和摆脱现有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就像我们事先相信，一个孩子总有一天会用两只脚走路，而不是四肢着地，这仅仅是因为他的父母是人类。”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出建议。在给出建议的同时，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你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不能让你认识到这些建议值得遵循，那么这些建议就毫无价值。”

当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弯腰驼背，导致胸腔和肺部收缩时，我们会建议他挺直身体，抬头挺胸。我们建议他让肺部充血，做长长的呼吸，因为这是他防止肺病的最好办法。但同时我们也教他生理学，让他了解肺的功能，自己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姿势。

在道德问题上，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我们只有提供建议的权利，但我们还要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是好的，就照着去做。”

但是，在赋予每个人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的权利的同时，在完全否认社会有权以任何方式惩罚任何人可能犯下的任何反社会行为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爱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去恨我们认为是坏的东西。又爱又恨；因为只有懂得恨的人才懂得爱。我们保持着这种能力；既然仅凭这一点就能维持和发展每个动物社会的道德情感，那么对于人类来说，这就更足够了。

我们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消除当前社会中一切阻碍这两种情感自由发展的要素——一切扭曲我们判断力的因素：国家、教会、剥削；法官、牧师、政府、剥削者。

今天，当我们看到开膛手杰克接二连三地杀害一些最贫穷、最悲惨的妇女时，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仇恨。

如果我们在他杀害那个要求他支付贫民窟住宿费的女人的那天遇到他，我们就会一枪打爆他的头，而不会想到，这颗子弹打在这个破巢穴主人的脑袋上可能会更好。

但是，当我们回想起使他落得如此下场的种种恶行时；当我们想到他在黑暗中徘徊，被不雅书本中的形象或愚蠢书本中的思想所困扰时，我们的感情就会分裂。如果有一天，我们听说杰克落到了某个法官手里，他冷血地杀害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所有杰克的总和；如果我们看到他落到了那些蓄意谋杀的疯子手里，那么我们对开膛手杰克的仇恨就会烟消云散。我们对开膛手杰克的仇恨将化为对懦弱虚伪的社会及其公认的代表们的仇恨。开膛手的所有恶行都会在一系列以法律名义犯下的恶行之前消失。我们憎恨的正是这些。

如今，我们的感情一直处于这种分裂状态。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教唆者。我们不敢恨。我们甚至不敢去爱吗？在一个以剥削和奴役为基础的社会里，人性是堕落的。

但随着奴役的消失，我们将重新获得我们的权利。我们将感受到自己有力量去恨，也有力量去爱，即使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复杂的情况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在自由发挥我们的同情或反感；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我们都热爱道德的力量，我们都鄙视道德的软弱和懦弱。每时每刻，我们的言语、神情、微笑都在表达着我们的喜悦之情，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些对人类有益的行动，那些我们认为美好的行动。每时每刻，我们的表情和语言都在表达我们对懦弱、欺骗、阴谋、缺乏道德勇气的厌恶。即使在世俗教育的影响下，我们试图把我们的蔑视隐藏在那些虚伪的外表下，但随着我们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这些外表也会消失。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将善恶观念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并相互传达。当社会中不再有法官或牧师，当道德原则失去了其强制性，而仅仅被视为平等者之间的关系时，它将更加有效。

此外，随着这些关系的建立，社会中也会产生更高尚的道德观念。我们要分析的正是这种观念。

VIII

迄今为止，我们的分析只阐述了简单的平等原则。我们反对那些认为自己有权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人，反对那些自己不希望被欺骗、剥削、嫖娼或虐待，但却对他人如此的人，并请其他人也这样做。我们说过，谎言和残暴是令人厌恶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为道德准则所不容，而是因为这种行为会触动每个人的平等意识，而平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句空话。最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会让那些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是真正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感到反感。

如果生活中普遍应用这一简单、自然、显而易见的原则，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一种包含道德家所教导的一切的道德。

平等原则概括了道德家的教诲。但它还包含更多的东西。这种更多的东西就是对个人的尊重。通过宣扬我们的平等道德，或者说无政府主义，我们拒绝承担道德家们一向自以为是的权利，即以某种理想的名义残害个人的权利。我们根本不承认这种权利，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

我们承认个人享有充分和完全的自由；我们希望他有充实的生活，希望他的所有能力都能得到自由发展。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东西强加给他；因此，我们又回到了傅立叶所说的与宗教道德相对立的原则：“让人绝对自由。不要残害他们，宗教已经做得足够多了。甚至不要害怕他们的激情。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些并不危险。”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由；只要你自己不允许他人奴役你；只要你反对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暴力和反社会的激情，反对你同样强烈的社会激情，那么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们摒弃以任何理想的名义残害个人的想法。我们为自己保留的，只是坦率地表达对我们看来是好是坏的事物的同情和反感。一个人会欺骗他的朋友。这是他的倾向，是他的性格。很好，鄙视骗子是我们的性格，是我们的倾向。既然这是我们的性格，那就让我们坦诚相待吧。我们不要像今天有时所做的那样，急于把他揽入怀中，或亲切地与他握手。让我们强烈地反对我们对他的积极热情。

这就是我们的权利，这就是我们为维护社会平等原则而必须履行的责任。这就是实践中的平等原则。

但杀人犯、放荡儿童的人呢？纯粹因嗜血而杀人的凶手极为罕见。他是一个需要治愈或避免的疯子。至于放荡不羁的人，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社会不要扭曲我们孩子

的感情，这样我们就不用害怕强奸犯了。

我们必须明白，在道德沦丧的主要根源——资本主义、宗教、正义、政府——不复存在之前，所有这些都不能完全适用。但其中大部分内容从今天起就可以付诸实践。它已经在实践中了。

然而，如果社会只知道这种平等原则；如果每个人都只奉行商人的公平原则，整天小心翼翼地给予别人的东西不超过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那么社会就会因此而灭亡。平等原则本身也会从我们的关系中消失。因为，如果要维持平等，就必须在生活中永远找到比单纯的公平更伟大、更可爱、更有活力的东西。

而这种大于正义的力量就在这里。

迄今为止，人类从未缺少过洋溢着温柔、智慧和善意的大自然，它们用自己的情感、智慧和积极的力量为人类服务，却不求任何回报。

这种心灵、情感或善意的滋生有各种可能的形式。它体现在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者身上，他放弃了其他一切享乐，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周围无知者的断言相反的、他认为真实和正确的东西的探索中。在发明家身上，他日复一日地生活，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食物，几乎不碰面包，也许是某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女人像喂孩子一样喂他吃面包，而他却在追寻他认为注定要改变世界面貌的目标。对于热心的

革命者来说，艺术、科学，甚至家庭生活的乐趣，只要不能让所有人分享，就会显得苦涩，而他却不顾苦难和迫害，为世界的复兴而努力。正是在这样的青年身上，他们听闻侵略的暴行，从字面上理解英雄般的爱国主义的传说，加入志愿军，在风雪和饥饿中勇敢前行，直到倒在枪林弹雨之下。正是在巴黎街头的阿拉伯人，以其敏捷的智慧和对于厌恶与同情的敏锐选择，带着弟弟跑向城墙，在弹雨中稳稳地站着，临死前喃喃自语：“公社万岁！”“公社万岁！”一个人一看到错误就会感到愤怒，而不问错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当所有的人都屈服于他时，他站出来揭露不义，给剥削者、工厂的小暴君或帝国的大暴君烙上罪恶的印记。最后，如果我们不厌其烦地睁大眼睛，注意到人类生活的基础是什么，它使人类生活能够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保持自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无数的奉献行为中，特别是在妇女中间，不断地观察到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因而不为人知的、几乎总是被误解的奉献行为。

这些人，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在更大的舞台上创造着人类的进步。人类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人类以崇敬之情、神话之名来赞美这些生命。人类装饰她们，让她们成为故事、歌曲和浪漫的主题。人类崇尚他们身上的勇气、善良、爱和奉献精神，而这些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缺

乏的。它将这些记忆传递给年轻人。即使是那些只在家庭和朋友的狭小圈子里活动过的人，也会被唤起，并在家族传统中对他们肃然起敬。

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所有其他的道德都只是关系中的平等。没有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人类将继续沉迷于斤斤计较的泥潭之中。正是这样的男男女女为未来的道德做了准备，当我们的孩子不再斤斤计较，长大成人后，他们就会明白，所有的能量、勇气和爱的最佳用途就是把它用在最需要这种力量的地方。

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奉献精神在每个时代都存在。在善于交际的动物中也有。即使在最堕落的时代，人类也有这种勇气。

宗教总是试图将其占为己有，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如果说宗教仍有生命力，那是因为——除了无知——它们一直诉诸于这种虔诚和勇气。革命者也正是以此为诉求。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感受到的道德责任感，人们试图用各种神秘主义来解释它。无政府主义者居约无意识地说道：“它只不过是一种生命的丰沛，它要求被行使，要求奉献自己；同时，它也是一种力量的意识。”

所有累积的力量都会对其面前的障碍产生压力。行动的力量就是行动的责任。所有这些道德上的“义务”，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归结为一个概念：维持生命的条件就是扩大生命。

“植物无法阻止自己开花。有时开花意味着死亡。没关系，汁液还是会流出来。”这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总结道。

人在充满力量和能量时也是如此。力量在他体内积聚。他扩大了自己的生命。他毫无计算地付出，否则他就无法生存。如果他必须像花朵绽放时那样死去，那也没关系。如果有汁液，汁液也会上升。

要坚强。洋溢着情感和智慧的能量，你就会把你的智慧、你的爱、你的行动能量传播给他人！这就是所有道德教育的目的。

IX

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让人类钦佩的是他的活力，是生命的旺盛促使他付出智慧、情感和行动，不求任何回报。

思维活跃的人，充满智慧的人，自然会寻求传播自己的思想。除非思想能够传播给他人，否则就不会有思考的乐趣。只有精神贫乏的人才会在苦苦追寻某种思想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藏起来，以便日后给它贴上自己的名字。智力超群的人满脑子都是想法，他把想法一把一把地撒出去。如果他不能与他人分享这些想法，不能将它们散布到四面八方，那么他就是可悲的，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

感情也是如此。盖尤（Guyau）说：“我们自己是不够的：我们的眼泪比我们自己的苦难所要求的还要多，我们的欢乐能力比我们自己的存在所能证明的还要多。”他用几句从自然中撷取的令人钦佩的诗句概括了整个道德问题。孤独的人是可悲的，是不安的，因为他无法与他人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当我们感到某种巨大的快乐时，我们希望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奋斗，我们的战斗。

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有必要锻炼我们的意志和积极的能量。行动、工作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以至于当荒唐的条件使男人或女人无法从事有用的工作时，他们就会

发明一些事情来做，一些徒劳无益和毫无意义的义务，从而为他们的积极能量开辟出一片天地。他们发明一种理论、一种宗教、一种“社会责任”——来说服自己，他们在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她们跳舞，是为了慈善事业。当她们用昂贵的服饰毁掉自己时，是为了保持贵族的地位。当她们什么也不做时，那是出于原则。

盖尤（Guyau）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同伴，为人类辛苦拖行的马车伸出援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围着它转。”古尤说，“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同伴，让人类的马车能够顺利前行。每天花在政治方面的大量无用功，无非是表达了对人类马车伸出援手的需要，或者至少是围着它转的需要。”

当然，这种“丰富的意志”，这种对行动的渴求，如果伴随着贫乏的感情和不能创造的智力，就只能产生拿破仑一世或俾斯麦，这些试图迫使世界倒退的智者。另一方面，缺乏感性发展的精神生育力也会结出文学和科学迂腐者的累累硕果，他们只会阻碍知识的进步。最后，没有大智慧指导的感性会产生这样的人，比如女人愿意为某个野蛮的男人牺牲一切，对他倾注全部的爱。

如果生命要真正硕果累累，就必须在智慧、情感和意志上同时如此。这种各方面的丰硕成果就是生命，是唯一名副其实的东西。为了这生命的一瞬间，那些瞥见它的人

付出了多年的植物人生活。没有这种充沛的生命，人就会未老先衰，成为无能的人，成为一株未曾开花就已枯萎的植物。

“让我们把这种没有生命的生活留给后世的堕落吧，”青年喊道，真正的青年充满了渴望生活和撒播生命的汁液。每当一个社会陷入衰败，这样的青年就会冲破古老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形式，为新生命的萌发腾出空间。即使一个或另一个在斗争中倒下，又有什么关系呢？树液仍会升腾。无论结果如何，青春的生命都将绽放！它不会后悔。

但是，不谈人类的英雄般的时代，就拿每天的生存来说，与自己理想不一致的生活是生活吗？

现在人们常说男人对理想嗤之以鼻。这很容易理解。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欺骗那些心地单纯的人，因此人们的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我们也希望用一个更符合新思想的新词来取代“理想”这个经常被玷污的词。

但无论用什么词，事实依然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俾斯麦有他的理想——无论多么奇怪；一个铁与血的政府。即使是每一个市井小民也有他的理想，无论多么卑微。

但除了这些，人类还有更崇高的理想。野兽般的生活无法满足他。奴性、谎言、不诚实、阴谋诡计、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让他深恶痛绝。他怎么能反过来变得奴颜婢膝，成为骗子和阴谋家，凌驾于他人之上？他瞥见如果人与人之间存在更好的关系，生活会多么美好；他感到自己有能力成功地与途中可能遇到的人建立这种更好的关系。他产生了所谓的理想。

这种理想从何而来？它是如何被遗传和生活印象所塑造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最多只能在自己的传记中或多或少真实地讲述它的故事。但它是一个真实的事实——多变的、渐进的、受外界影响的，但始终是活生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受，即什么能带来最大的活力，什么能带来生命的快乐。

只有顺应这种理想的感觉，生命才会充满活力、富饶和丰富的感觉。如果违背这种感觉，你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它不再合一，失去活力。如果你经常不忠于你的理想，你的意志、主动力就会瘫痪，你很快就会失去以前的活力和自发性。你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

只要你把人看成是由独立活动的神经中枢和大脑中枢组成的复合体，这一切就没有什么神秘的。如果你在内心挣扎的各种感觉之间摇摆不定，那么你很快就会打破机体

的和谐；你将成为一个没有意志的病人。你的生命强度将会降低，你将徒劳地寻求妥协。当你的行为符合大脑的理想构想时，你再也不会是那个完整、强壮、充满活力的人了。

在有些时代，道德观念会完全改变。人们会发现自己认为道德的东西其实是最不道德的。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习俗、一种受人尊敬的传统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一个道德体系是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我们将其抛弃，大声疾呼“打倒道德！”“不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责任。

让我们欢迎这样的时代，因为它们是批判的时代。它们是思想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可靠标志。一种更高的道德已经开始形成。

我们试图以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为基础，来阐述这种道德是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道德，这种道德现在正在大众和思想家的观念中形成。这种道德不会发出任何命令。它将一劳永逸地拒绝按照抽象概念来塑造个人，正如它将拒绝用宗教、法律或政府来残害个人一样。它将留给个人充分而完美的自由。它只是对事实的简单记录，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将对人类说：“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力量，如果你的精力仅仅足以维持无色单调的生活，没有强

烈的印象，没有深刻的欢乐，但也没有深刻的悲伤，那么，请遵守公正平等的简单原则。在平等的关系中，你会发现你微弱的精力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

“但是，如果你能感受到青春的力量，如果你想活下去，如果你想享受完美、充实的生活，也就是说，想知道一个生命所能渴望的最高乐趣，那么，你就应该坚强、伟大，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充满活力。”

"在你周围播种生命。注意，如果你欺骗、撒谎、阴谋诡计、弄虚作假，你就会因此贬低自己，看轻自己，事先承认自己的弱点，扮演后宫奴隶的角色，觉得自己不如主人。如果你高兴，就这样做吧，但你要知道，人类会认为你卑微、可鄙、软弱，并会这样对待你。由于无法证明你的力量，人类会把你当作值得怜悯的人，而且只是怜悯。如果你因此瘫痪了自己的精力，不要责怪人类。另一方面，要坚强起来，一旦你看到了不义，并认识到它就是不义——生活中的不公、科学中的谎言或他人施加的痛苦——就要奋起反抗不公、谎言或不义。"

"奋斗！斗争就是生活，斗争越激烈，生活就越充实。这样，你才算活过了；而几小时的这样的生活，抵得上几年的碌碌无为。"

“努力奋斗，让所有人都能过上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斗争中，你会发现在其中的快乐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大。”

这就是道德科学所能告诉你的全部。选择权在你手中。

《无政府主义：其哲学和理想》的摘要

无政府主义回答了是否有哲学以及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克鲁泡特金回答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只是破坏性的批评，他通过与自然科学的类比，说明进步是通过在任何时期建立的平衡发生剧烈变化，然后是新的适应，以及反应部分产生新的和谐而实现的。他认为自然的和谐是不断变化的平衡，而不是由法律固定的形式。在他看来，社会的这种自然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少数派的阻挠，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社会束缚起来。

他把唤醒的工人的力量与他们对立起来，这些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劳动和自由被侵占，但由于被转用于战争和社会运动的政策，他们无法通过革命夺取土地和财富。

他认为，要使工人的革命运动达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邦概念，并唤起人民夺取财产的积极性，就必须恢复自然的发展进程。“多样化是生命，千篇一律是死亡”，这一原则适用于革命运动，也适用于所有生命。完全的个人自由当然是目标。帮助发展这些自然趋势是无政府主义的

实际任务。这些并不是遥远未来的梦想，也不是在经历了其他阶段之后才能达到的阶段，而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生活过程，我们可以推进，也可以阻挡。

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与未来有关的幻象的集合，是一种无意识的毁灭一切现有文明的努力的人仍然非常多。为了消除坚持这种观点的基础偏见，我们必须了解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是很难简短地涵盖的。

无政府主义者最近被谈论得太多了，部分公众终于开始阅读和讨论我们的学说。有时，人们甚至不厌其烦地进行反思，目前我们至少已经承认，无政府主义者是有理想的。他们的理想甚至被认为过于美好、过于崇高，不适合一个不是由高级生命组成的社会。

但是，在我们的批评者看来，我们的思想不过是对遥远未来的朦胧想象，而我却在谈论哲学，这难道不是自命不凡吗？无政府主义在否认社会主义拥有哲学的时候，还能假装拥有哲学吗？

这就是我要回答的问题，而且要尽可能准确、清晰。首先，我要借用自然科学的一些基本例子。这并不是为了从这些例子中推导出我们的社会观念——远非如此；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某些关系，在经过精密科学验证的现象中比在仅从人类社会的复杂事实中提取的例子中更容易把握和说明。

目前，精密科学尤其令我们震惊的是，它们对宇宙事实的整个概念和解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曾几何时，人类想象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似乎围绕着我们的地球滚动；人类居住的地球对他来说就是造物的中心。他自己——地球上的高级生物——是造物主的选民。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是为他而造的，上帝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帝的关注，上帝为他阻挡太阳的运行，向田野和城市发射雨露或雷电，以补偿人类的美德或惩罚人类的罪行。几千年来，人类就是这样构想宇宙的。

十六世纪，人类文明的所有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人们发现，地球远非宇宙的中心，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粒沙，甚至比其他行星还要小得多。与这无边无际的浩瀚相比，人类显得多么渺小，他的自命不凡是多么可笑！那个时代的所有哲学、社会和宗教观念都感受到了这种宇宙观转变的影响。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但是，目前整个科学界正在发生一场更为深刻、影响更为广泛的变革，而无政府主义不过是这场变革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

请看上个世纪的任何一本天文学著作。你不会再发现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被置于宇宙的中心。但是，你会在每一步都看到一个中心发光体的概念——太阳——它以其强大的吸引力管理着我们的行星世界。从这个中心体放射出一股力量，引导着行星的运行，维持着整个系统的和谐。可以说，行星就是从这个中心集合体中诞生的。它们的诞生要归功于这个聚合体；它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代表它的那颗光芒四射的恒星：它们运动的节奏，它们的轨道设定在明智调节的距离上，生命赋予它们活力，并装饰着它们的表面。当任何干扰扰乱了它们的运动轨迹，使它们偏离轨道时，中心星体就会重建系统的秩序，确保并延续系统的存在。

然而，这种观念也像另一种观念一样正在消失。天文学家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太阳和大行星上之后，现在开始研究宇宙中无限小的行星。他们发现，在行星际和星际空间中，在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向上，都布满了小的物质群，它们看不见，单独看是无限小的，但它们的数量却是无所不包的。

正是这些无限小的天体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在太空中向各个方向飞奔，它们相互碰撞、聚集、分解，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今天的天文学家正是从它们身上寻找太阳系的起源、太阳系各部分的运动以及太阳系整体和谐的解释。

再往前走一步，很快万有引力本身就会成为这些无限小的天体所有无序和不连贯运动的结果——这些运动是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表现出来的原子振荡。因此，以前从地球转移到太阳的力的中心和起源，现在变成了分散和传播。它无处不在，又无所不在。与天文学家一样，我们认识到太阳系是由无限小的天体组成的；被认为支配太阳系的力量本身不过是这些无限小的物质团之间碰撞的结果；恒星系的和谐之所以是和谐，只是因为它是一种适应，是所有这些无数运动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平衡的结果。

宇宙的整体面貌随着这一新概念的出现而改变。力量支配世界的观念、预先设定的法则、先入为主的和谐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傅立叶瞥见的和谐：这是由无数物质的无序和不连贯运动所产生的和谐，它们各行其是，但又保持着各自的平衡。

如果只有天文学发生了这种变化！不，所有科学的哲学都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研究自然的科学和研究人类关系的科学无一例外。

在物理科学中，热、磁和电的实体消失了。今天，当物理学家谈到一个发热或通电的物体时，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无生命的质点，在这个质点上还应加上一个未知的力。他努力在这个身体和周围的空间中，认识到无限小的

原子的振动过程，这些原子向各个方向冲去，振动、运动、生存，并通过它们的振动、冲击和生命，产生热、光、磁或电现象。

在研究有机生命的科学中，物种及其变异的概念正在被个体变异的概念所取代。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研究的是个体——他的生命，他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干旱或潮湿、炎热或寒冷、营养丰富或贫乏、对外界环境的敏感性高或低，这些作用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变化，将产生物种；而物种的变异现在对生物学家来说只是结果——在每个个体身上分别产生的变异的特定总和。物种是由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受到周围环境的无数影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周围环境相适应。

现在，当生理学家谈到植物或动物的生命时，他看到的是由数百万个独立个体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独立而无形的个体。他说的是一个由消化器官、感官器官、神经器官组成的联合体，所有这些器官都彼此紧密相连，每个器官都感受到每个器官的健康或不健康所带来的后果，但每个器官都过着自己的生活。每个器官、器官的每个部分又都由独立的细胞组成，它们相互联系，与不利于它们生存的条件作斗争。个人是一个联合的世界，他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

在这个生物聚集的世界里，生理学家看到了自主的血液细胞、组织细胞和神经中枢细胞；他还看到了数以百万计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奔向被微生物感染的身体部位，与入侵者作战。不仅如此：今天，他在每个微小的细胞中都发现了一个由自主生物组成的世界，每个生物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为自己谋求幸福，并通过与其他生物的组合和联系来获得幸福。简而言之，每个人都是一个由器官组成的宇宙，每个器官都是一个由细胞组成的宇宙，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由无限小的细胞组成的宇宙。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整体的福祉完全取决于有组织物质中每一个最小的微观粒子所享有的福祉的总和。生命哲学由此产生了一场革命。

但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这场革命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后果。

最近，心理学家将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忠实于宗教传统，习惯于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聪明人和愚蠢的人、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即使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那里，灵魂、不可分割的实体的观念仍然得到坚持。

但是，如果今天的心理学家还这样说，我们会怎么想呢？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身上有许多独立的能力、自主的倾向，它们之间是平等的，独立地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不断地相互平衡、相互对立。从整体上看，人只不过是他的所有不同能力、所有自主倾向、脑细胞和神经中枢的结果，并且总是不断变化的。所有这些都彼此密切相关，以至于它们各自对所有其他器官都产生影响，但它们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不从属于一个中心器官——灵魂。

无需赘述，你就会发现，此时此刻，整个自然科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不是说这种分析扩展到了以前被忽视的细节。不！事实并不新鲜，但看待事实的方式却在演变。如果非要用几句话来描述这种趋势的话，我们可以说，如果说以前的科学努力研究的是结果和大和（数学家所说的积分），那么今天，它努力研究的是无限小的和——这些和所组成的个体，现在，它在承认这种亲密的集合的同时，也承认它们的独立性和个体性。

至于人类头脑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和谐——这种和谐总体上不过是对现象的某种稳定性的验证——现代科学工作者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可这种和谐。但是，他不再试图用按照智慧意志预先制定的某种计划而设想的规律的作用来解释这种和谐。

过去所谓的“自然法则”，不过是我们朦胧看到的现象之间的某种关系，而每一种“法则”都具有暂时的因果性，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这样的现象，

就会产生另一种现象。没有定律置于现象之外：每种现象都支配着其后的现象，而不是定律。

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和谐，并非先入为主。碰撞和相遇的机会足以建立起这种和谐。这种现象会持续几个世纪，因为所代表的适应和平衡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而如果这种形式的瞬间平衡是在一瞬间产生的，那么这种现象就会持续不过一瞬间。如果我们太阳系的行星不是每天都相互碰撞，不是每天都相互毁灭，如果它们持续了数百万年，那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是经过数百万个世纪的盲目力量才建立起来的。如果说大陆没有不断地被火山冲击摧毁，那是因为它们是经过几千几万个世纪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积累，才形成了现在的形状。但是，闪电只会持续一瞬间；因为它代表着平衡的瞬间打破，代表着力量的突然重新分配。

由此可见，和谐是作用于某一特定地点的所有力量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临时调整——一种证明性的适应。而这种调整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会持续下去：那就是不断被改变；每时每刻都代表着所有冲突行动的结果。只要其中一种力量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阻碍，和谐就会消失。如果其他力量阻碍了它的表现，它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是会通过破坏当前的调整、破坏和谐来结束，以便找到一种

新的平衡形式，并努力形成一种新的适应。火山爆发就是如此，其被禁锢的力量最终会打破阻碍它们喷出气体、熔岩和炽热灰烬的石化岩浆。人类的革命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在发生类似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在成为王国的历史之后，又趋向于成为国家的历史，进而成为对个人的研究。历史学家想知道这样一个国家的成员在当时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的生存手段是什么，他们眼中的社会理想是什么，他们拥有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一理想。通过所有这些以前被忽视的力量的作用，他解释了伟大的历史现象。

因此，研究法学的科学工作者不再满足于这样或那样的法典。在这项研究中，他对成文法的研究远远少于对地方习俗的研究，而是对“习惯法”的研究。一门全新的科学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有望颠覆我们在学校学到的既定概念，成功地以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式解释历史。

最后，政治经济学最初是研究国家财富的，如今却变成了研究个人财富的。它不太关心这样一个国家是否有大量的对外贸易；只想确保农民或工人的小屋里不缺面包。敲开所有的门——宫殿的门和茅屋的门，问富人也问穷人：你们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满足到什么程度了？

当它发现每个民族中有十分之九的人最迫切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它就会向自己提出一个生理学家在研究植物或动物时会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以最小的力量损失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一个社会怎样才能保证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保证所有人得到最大的满足？经济科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转变的；在长期以来只是为了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对现象进行简单的解释之后，它正趋向于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人类社会的生理学。

在新哲学——一种新的整体知识观——形成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现在流行的社会观念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念也在形成之中。在无政府主义这一名称下，出现了一种对社会过去和现在生活的新解释，同时对未来做出了预测。这两种解释的精神与上述自然科学解释的精神相同。因此，无政府主义作为新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与当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有如此多的接触。

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当人类的思想摆脱了由牧师、军事首领和法官等少数人灌输的思想（他们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统治），摆脱了由科学家们为使统治永久化而支付的报酬时，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概念，在这种社会概念中，不再有这些统治少数人的空间。这个社会拥有前几代人劳动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它的组织方式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而利用这些资本，它的形成不需要重组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它包含了无数不同的能力、性格和个人能量：它不排斥任何人。它甚至需要斗争和争论；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是自由争论的时期，而不把法定权力的重担压在天平的一边，那就是人类天才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实现最伟大目标的时期。在承认其成员对过去积累的财富享有平等权利的同时，它不再承认被剥削者和剥削者、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被支配者和支配者之间的分歧，它寻求在其内部建立某种和谐的兼容性——不是让其所有成员服从一个被虚构为代表社会的权威，不是试图建立统一性，而是敦促所有人发展自由的主动性、自由的行动、自由的联合。

它寻求个性的最全面发展与自愿结社的最高发展相结合，在所有方面、所有可能的程度上，为所有可以想象的目标而努力；不断变化、不断修改的结社本身带有其持久性的要素，并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以最好地满足“多”所有人的愿望。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法律所规定的既定形式是令人厌恶的；这个社会希望在各种力量和各种影响之间不断变化和逃逸的平衡中寻求和谐，而这些力量 and 影响都遵循着自己的轨迹，这些力量本身会促进有利于其进步的能量，使其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发展并相互抵消。

这种社会观念和理想当然不是新的。相反，当我们分析民间机构的历史——氏族、村社、行会，甚至中世纪城市公社的最初阶段——时，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民间趋势，即按照这一理念建立一个社会；然而，这种趋势总是受到专横的少数人的束缚。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印记，而在九世纪的再洗礼派及其先驱身上，我们已经发现当时使用的宗教语言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遗憾的是，直到上世纪末，这一理想始终受到神权精神的玷污。直到今天，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得出的社会概念才摆脱了它的襁褓。

只是到了今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这显然是每个人受到的社会影响的结果）来管理自己的社会这一理想才同时在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得到了肯定，而这一理想是在共产主义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们当前生产的显著社会特征强加给我们现代社会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清楚地知道，只要存在经济奴役，谈论自由就是徒劳的。

“不要谈论自由——贫穷就是奴役！”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已经深入到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思想中，渗透到当前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还影响到那些靠别人的贫穷为生的人，使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傲慢地主张自己的剥削权利。

两个半球的数百万社会主义者已经一致认为，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形式不可能再持续多久了。资本家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形式必须消失，不敢再像以前那样信誓旦旦地为其辩护。他们唯一的论据就是对我们说：“你们没有发明更好的东西！”但是，要否认目前财产形式的致命后果，要为他们的财产权辩护，他们做不到。只要行动自由还属于他们，他们就会实践这一权利，但不会试图把它建立在某种思想的基础上。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例如，以巴黎为例——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创造，是整个民族天才的产物，是二三十代人劳动的结晶。巴黎的居民每天都在努力美化它、净化它、滋养它，使它成为思想和艺术的中心，而我们都在创造这些价值，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价值将化为乌有，那么，我们怎么能对创造这些财富的人说，装饰巴黎街道的宫殿完全属于今天的合法所有人呢？

人民教育家的技巧可以让这种虚构持续一段时间。大批工人可能根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但从少数有思想的人鼓动并向所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刻起，结果就毋庸置疑了。大众舆论的回答是“他们是靠掠夺才拥有这些财富的！”

同样，当一个农民可以告诉我们方圆十里每一块土地的历史时，怎么能让农民相信资产阶级或庄园主的土地属于拥有合法权利的业主呢？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让让他相信，某某先生把一块土地作为他的公园是有益于国家的，而周围有那么多农民会非常乐意耕种这块土地呢？

最后，当工人甚至矿工开始清楚地看到丑闻、贿赂、国家掠夺和合法盗窃，而巨大的商业和工业财产正是从这些丑闻、贿赂、国家掠夺和合法盗窃中得来的时候，如何让工厂的工人或矿井的矿工相信工厂和矿井公平地属于他们现在的主人呢？

事实上，群众从来都不相信经济学家的歪理邪说，这些歪理邪说更多的是为了证实剥削者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改变被剥削者的想法；农民和工人被苦难压垮，在富裕阶级中找不到支持，除了不时通过起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外，他们都听之任之。如果工人们曾经认为有一天个人占有资本会使所有人受益，使资本变成所有人共享的财富，那么这种幻想就会像其他许多幻想一样破灭。工人意识到他已经失去了继承权，并且将继续被剥夺继承权，除非他诉诸罢工或起义，从他的主人那里榨取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起来的财富中的最小一部分——也就是说，为了得到这一小部分，他已经必须忍受饥饿的煎熬，面临监禁，如果不是暴露在帝国、皇家或共和国的炮火之下的话。

但是，现行制度的一个更大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在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制度中，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住房、食物和工具——一旦落入少数人之手，就会不断阻碍为所有人带来福祉的必需品的生产。工人隐约感到，我们目前的技术力量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富足，但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是如何以各种方式阻碍这种福祉的实现。

我们的生产远远超出了保证物质财富所需的水平，但我们的生产还远远不够。当农民觊觎法官和警察把守的工业园区和花园时，当他梦想用庄稼覆盖这些地方时，他知道，这些庄稼将为村庄带来丰收，而村庄里的居民却只能吃着用山丁子酒稀释的面包，他就明白了这一点。

矿工每周有三天被迫闲置，但他想到自己可能开采出数吨煤炭，而这些煤炭正是贫困家庭所急需的。

工人的工厂倒闭了，他走街串巷找工作，看到砌砖工人和他一样失业，而巴黎有五分之一的人住在不卫生的小屋里；他听到制鞋工人抱怨没有工作，而有那么多人需要鞋子，等等。

简而言之，如果某些经济学家乐于撰写关于生产过剩的论文，并以此来解释每一次工业危机，那么如果要他们说出法国生产的哪一种商品的数量超过了满足全体人民需求所必需的数量，他们就会感到非常茫然。当然不是玉

米：法国不得不进口玉米。也不是葡萄酒：农民只喝很少的葡萄酒，他们用苏子酒代替葡萄酒，城镇居民不得不满足于掺假的葡萄酒。这显然不是房子：数百万人仍然住在只有一两个窗户的最简陋的平房里。这甚至不是好书或坏书，因为它们在乡村仍然是奢侈品。只有一种东西的生产量超过了需求量，那就是消耗预算的人。但政治经济学家在讲课时并没有提到这种商品，尽管这些人拥有商品的所有属性，随时准备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过剩，不过是指生产超过了工人的购买力，工人被资本和国家拖入贫困的境地。现在，这种生产过剩仍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特征，因为工人无法用他们的工资购买他们生产的东西，同时又大量滋养靠他们的劳动为生的游手好闲者。

现行经济制度的本质是，工人永远无法享受到他所创造的福祉，而那些靠他的钱生活的人的数量会一直增加。一个国家的工业越发达，这个数字就越大。不可避免的是，工业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某一特定时刻为少数人带来最大的暂时利益。一些人的富裕必然建立在另一些人的贫困之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更多人的拮据状况，以便有一些人能够仅以他们能够生产的部分产品的价格出售自己；没有这种情况，私人资本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济制度的这些特点正是其本质所在。没有这些特点，它就无法存在；因为如果不是饥饿的威胁，谁会以低于其劳动能力所能带来的收入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呢？

而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对其最沉重的谴责。

只要英国和法国是技术发展落后的国家中的工业先驱，只要邻国购买他们的羊毛、棉花货品、丝绸、铁器和机器以及各种奢侈品的价格允许他们以牺牲客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致富，工人就会因希望自己也分得越来越多的赃物而振奋起来。但这些条件正在消失。落后国家已成为棉花货品、羊毛、丝绸、机器和奢侈品的主要生产国。在某些工业领域，它们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与遥远国度的工商业先驱展开斗争，甚至还与本国的先驱展开竞争。短短几年间，德国、瑞士、意大利、美国、俄罗斯和日本都已成为工业大国。墨西哥、印度群岛，甚至塞尔维亚，都在前进，而当中国开始模仿日本为世界市场制造产品时，情况又会如何呢？

其结果是，工业危机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一直在增加，在许多行业已进入长期状态。

在当前的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一切都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所有的一切都趋向于使我们所生活的工业和商业体系的衰落不可避免。它的持续时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

能已经可以用年来计算，而不再是用世纪来计算。这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的问题！怠惰者不会创造历史：他们只能承受历史！

正因为如此，这些强大的少数派才会在文明国家中自立门户，大声要求将前几代人劳动所得的一切财富归还给社会。共同占有土地、矿山、工厂、住宅和交通工具已经成为这些强权派别的口号，而镇压——权贵们最喜爱的武器——再也无法阻止反抗精神的胜利前进。如果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没有起来用武力从垄断者手中夺取土地和工厂，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愿望。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一个像1848年那样的机会，届时他们将有希望得到国际运动的支持，开始摧毁现行的经济制度。

我们已经获得了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的一致同意，即一个社会在恢复了对其内部积累的所有财富的占有之后，只要每天从事四五个小时的有效体力劳动，就可以在生产方面向所有人慷慨地保证富足。如果每个人从小就知道他所吃的面包、他所住的房子、他所读的书等等都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于通过在某些生产部门从事体力劳动来完成脑力劳动，那么社会就可以很容易地完成这项任务，更不用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简化生产。

事实上，只要回想一下目前的可怕浪费现象，就足以想象文明社会在人人参与的情况下，只需少量劳动就能生产出什么，也足以想象可以开展哪些今天已不可能开展的伟大工程。遗憾的是，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从未关注过它的本质——劳动经济。

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用我们目前的机器和工具武装起来，实现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只有当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行为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是否能够存在；为了实现福祉，欧洲社会是否不需要牺牲他们在本世纪付出如此多牺牲的代价才重新获得的一点个人自由？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在国家的祭坛上牺牲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与此相反，我们所属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有通过废除国家，通过个人对完全自由的征服，通过自由协议、联合和绝对自由的联邦，我们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共同拥有我们的社会遗产，共同生产所有财富。

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问题，社会主义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它的一切努力都将受到威胁，它的一切未来发展都将陷于瘫痪。

因此，让我们对其进行应有的分析。

如果每个社会主义者都能把思绪拉回到更早的年代，他无疑会记得，当他第一次意识到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土地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时，在他心中激起的一系列偏见。

今天，当一个人第一次听说废除国家、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也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他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废除一个国家而不废除另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请注意，我们的整个教育都是由教会和国家为了两者的利益而创造的。

难道这还不够真实吗？我们是否应该让对国家的信仰在已经为解放而牺牲的一系列偏见中幸存下来？

首先，如果说人类自其起源以来就一直生活在社会之中，那么国家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就欧洲社会而言则是最近才出现的。在第一个国家建立之前，人类已经生活了几千年；在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建立之前，希腊和罗马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只有在中世纪自由公社失败之后，我们称之为“国家”的军事、司法、地主和资本主义权力之间的互助保险公司才得以完全建立。

只是到了十六世纪，地方独立、自由联合和组织、主权团体之间各种程度的联邦、拥有国家现在所攫取的一切职能的思想才遭到致命的打击。直到那时，教会与新生的

王权之间的联盟才结束了以联邦原则为基础的组织，这种组织从九世纪一直存在到十五世纪，并在欧洲产生了中世纪自由城市的伟大时期。

我们很清楚这个由领主、牧师、商人、法官、士兵和国王组成的联合体是通过什么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它消灭了所有自由联盟：村社、行会、行业联盟、兄弟会和中世纪城市。它没收了公社的土地和行会的财富。它绝对而凶残地禁止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自由协议。正是通过屠杀、车轮、绞刑架、刀剑和烈火，教会和国家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并从此成功地统治了一群不连贯的“臣民”，这些“臣民”之间再也没有直接的联系。

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通过斗争和反抗，重新获得结社权的第一步。在整个中世纪，工匠和耕作者都在自由地行使这一权利。

现在，欧洲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志愿协会，它们从事学习和教学，从事工业、商业、科学、艺术、文学、剥削、抵制剥削、娱乐、严肃工作、满足和自我否定，从事构成一个活跃而有思想的人的生活的一切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艺术、知识等各个领域的各个角落崛起。它们有的像昙花一现的玫瑰花，有的却坚持了几十年；都在努力——在保持每个团体、圈子、分支或部门独立性的同时——跨越国界，在各国之间结成联盟、联合起

来；用一张网覆盖文明人的所有生活，网眼相互交叉、交织在一起。他们的人数已经可以以万计，拥有数百万的追随者——尽管教会和国家从开始容忍他们中的少数——的确是极少数——至今还不到五十年。

这些社团已经开始到处侵犯国家的职能，并努力用志愿者的自由行动来取代中央集权国家的自由行动。在英国，我们看到了防盗保险公司、海岸防卫协会、土地防卫志愿者协会等组织，国家竭力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使它们成为统治的工具，尽管它们最初的目的是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如果没有教会和国家，自由社会早就征服了整个教育领域。尽管困难重重，但它们也开始侵入这一领域，并使人们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

尽管国家千方百计维护其近代以来的霸主地位，尽管国家与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时；当我们看到自愿社会如何侵入一切，而只是被国家阻碍其发展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趋势，一种潜在的力量。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五年、十年或二十年后——这并不重要——工人通过起义成功摧毁由地主、银行家、牧师、法官和士兵组成的互助会；如果人民在几个月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掌握了他们创造的、按权利属于他们的财富——他们真的会开始重建吸血虫——国家吗？还是说，他们不会根据相互之间的协议，

根据每个地方无限多样、不断变化的需求，尝试从简单到复杂地组织起来，以确保自己拥有这些财富，相互保障彼此的生活，并生产生活所需的东西？

他们是会顺应本世纪的主流趋势，走向权力下放、地方自治和自由协议；还是会逆势而行，努力重建被摧毁的权威？

受过教育的人一想到有一天社会可能会没有法官、警察或狱卒，就不寒而栗。

但坦率地说，你是否像那些发霉的书上所说的那样需要它们呢？请注意，这些书是由科学家们写的，他们通常对前人的著作了如指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完全忽视了人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漫步，不仅是在警察林立的巴黎街头，尤其是在人迹罕至的乡间小路上，难道我们的安全是警察的功劳吗？或者说没有人想抢劫或谋杀我们的功劳？我说的显然不是那些身背数百万现金的人。最近的审判告诉我们，这种人很快就会被抢劫，因为他偏爱那些警察和灯柱一样多的地方。不，我说的是那些担心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装满不义之财的钱包的人。他的担心是真的吗？

此外，最近的经验不也证明，开膛手杰克是在伦敦警察——一支最活跃的队伍——的眼皮底下作案的，而且他只是在白教堂的居民开始追捕他的时候才停止杀人的吗？

在我们与同胞的日常关系中，你认为真的是法官、狱卒和警察阻碍了反社会行为的泛滥吗？凶残的法官，因为他是一个法律狂人；控告者、告密者、警察间谍，所有这些在法庭周围苟且偷生的人，难道不是在社会上四处散播士气吗？读一读审判，看一看幕后，把你的分析推得比法庭的外表更远，你就会感到恶心。

监狱扼杀了人的全部意志和力量，其围墙内的罪恶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难道监狱不是犯罪的大学吗？法庭不也是凶残的学校吗？等等。

当我们要求废除国家及其机构时，我们总是被告知，我们梦想着一个由比现实更好的人组成的社会。但是，不，千真万确，并不是这样。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这些机构把人变得比现实更坏！

如果你听从了边沁（Bentham）提出的古老建议，开始思考法律强制的致命后果——直接的，尤其是间接的，那么你就会像托尔斯泰一样，像我们一样，开始憎恨使用强制，你就会开始说，社会拥有千百种其他手段来防止反社会行为。如果说今天的社会忽视了这些手段，那是因为教会和国家的教育下，我们的懦弱和麻木阻碍了我们看

清这一点。当一个孩子犯了错，惩罚他是如此容易：这就结束了所有的讨论！绞死一个人是如此容易——尤其是当有一个刽子手，每次行刑都能得到高额报酬时——这让我们不再去思考犯罪的原因。

人们常说，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在未来的梦想世界中，看不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并且看清了它们的真面目，这也是促使我们向困扰我们的偏见之林开刀的原因。

我们远非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想象人比现实更好，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本来面目；正因为如此，我们申明，最优秀的人本质上都因行使权力而变坏，“权力平衡”和“权力控制”的理论是那些攫取了权力的人发明的虚伪公式，目的是让他们鄙视的“主权人民”相信人民自己在治理国家。正是因为我们了解人，所以我们才会对那些幻想如果没有这些管理者，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吞噬的人说：“你们的理由就像国王一样，他被派往边疆，叫道：‘没有我，我可怜的臣民会怎么样？’”

啊，如果人是那些乌托邦权威主义者喜欢对我们说的那些优越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闭上眼睛不看现实，像他们一样生活在一个梦想和幻想的世界里，幻想那些自以为有权有势的人的优越性，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一样；也许我们也应该相信那些统治者的美德。

如果掌权的先生们真的像权力的颂扬者们喜欢描述的那样，如此聪明，如此献身于公共事业，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构建一个多么美好的政府和家长式的乌托邦啊！雇主永远不会成为工人的暴君，他将是工人的父亲！工厂将是一座欢乐的宫殿，大批工人的身体将永远不会退化。法官不会凶残地判处被他送进监狱的人的妻子和孩子长年忍受饥饿和痛苦，并在某一天死于贫血症；检察官绝不会为了炫耀自己的演说才能而索要被告的人头；我们也找不到狱卒或刽子手来听命于没有勇气亲自执行判决的法官。

哦，只要我们承认，那些管理者代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种姓，他们对普通人的弱点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完全不知，我们就能造就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一个可爱的圣诞梦！这样一来，只要让他们以等级方式相互控制，在国道上的一棵树被风刮倒时，最多在不同的管理者之间交换五十份文件，就足够了。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在选举期间，他们只需要由那些被认为在相互关系中充满愚蠢，但在必须选举主人时却变得聪明起来的凡人大众，按照他们应有的价值进行估价。

执政者所想象的所有政府科学都充斥着这些乌托邦。但我们太了解人了，不会做这样的美梦。我们对被统治者和治理者的美德没有两套衡量标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我们中最优秀的人很快就会因为行使权

力而堕落。我们以人的价值来衡量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憎恨人治，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也许还不够强大——来结束人治。

但仅有破坏是不够的。正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群众在历次革命中总是误入歧途。在摧毁之后，他们把重建的任务交给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或多或少都对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因此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建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当它致力于从各方面摧毁权威时，当它要求废除法律并取消强加法律的机制时，当它拒绝一切等级组织并宣扬自由协议时，它同时努力维护和扩大社会习俗的宝贵内核，没有这些内核，就没有人类社会或动物社会的存在。只不过，它不是要求通过少数人的权威来维持这些社会习俗，而是要求通过所有人的持续行动来维持。

共产主义习俗和制度对于社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经济困难，也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使人们相互接触的社会习俗。必须依靠它们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每个人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他们。

事实上，当我们扪心自问，在人类社会或动物社会中，通过什么手段才能维持一定的道德水平时，我们发现只有三种手段：压制反社会行为；道德教育；以及互助实践本身。而这三种手段都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效果来判断。

至于镇压的无能为力——当前社会的混乱和革命的必要性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都渴望革命，也都觉得革命不可避免。在经济领域，胁迫使我们沦为工业奴役；在政治领域，胁迫使我们沦为国家；也就是说，胁迫破坏了公民之间原有的一切联系，胁迫使我们沦为国家，而国家只不过是一群不连贯的、服从于中央政权的臣民。

强制制度不仅促成并有力地助长了当前所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弊端，而且还证明了它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方面的绝对无能为力；它甚至无法将社会道德水平维持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如果有一位仁慈的神仙能够向我们揭示文明社会中每天每分钟在未知或法律本身的保护下犯下的所有罪行，那么社会将会为这种可怕的情况而颤抖。最严重的政治罪行，如拿破仑·伊利的政变，或1871年公社垮台后五月的血腥一周，其始作俑者从未被提起公诉。

几个世纪以来，镇压取得了如此严重的成功，以至于把我们带入了一条死胡同，而我们只有举着火把和斧头才能从这条死胡同中走出来，走进我们过去的专制体制。

我们不能不承认第二个因素，即道德教化的 importance，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中无意识传播的、来自我们每个人对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和事件所发表的全部观点和评论的道德教化。但是，这种力量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对社会产生作用，那就是不能被各种机构的做法所产生的大量相互矛盾的不道德教导所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影响就是零或有害的。就拿基督教道德来说：还有什么其他教义能比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名义所说的话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并以其神秘的力量、殉道的诗意、宽恕刽子手的伟大精神发挥作用呢？然而，制度比宗教更有力量。很快，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反抗——就被罗马征服了；它接受了罗马的准则、习俗和语言。基督教会把罗马法当作自己的法律来接受，因此，它与国家结盟，在历史上成为所有半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凶猛的敌人，而基督教在其起源时就诉诸这些制度。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在公共教育部长的通告的支持下，道德教育会产生基督教所没有的创造性力量？而真正社会人的口头教导，如果被建立在非社会原则基础上的制度（如我们目前的财产和国家制度）所产生的全部教导所抵消，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只剩下第三个因素——制度本身，它的作用是使社会行为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这个因素——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从来没有错过它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一把双刃剑那样发挥作用；它的影响力只是在习俗努力变得不可动摇、固化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宗教、努力吸收个人、剥夺个人的一切行动自由、迫使个人反抗通过固化而成为进步的敌人时才被削弱。

事实上，过去人类进步的一切因素，人类道德和智力进步的一切工具，都要归功于互助的实践，归功于承认人类平等的习俗，这些习俗使人类结盟、联合，为生产和消费的目的而结社，为防御的目的而联合，为联邦的目的而联合，在解决分歧时，除了他们从自己中间选出的仲裁者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法官。

每当这些制度从人民的天才中产生，当它暂时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每当这些制度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道德水平、物质福利、自由、思想进步和对个人原初的肯定就前进了一步。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在外国征服之后，还是由于专制偏见的发展，每当人们越来越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时，道德水平就会下降，大众的福祉就会减少，以确保少数人的富裕，时代精神就会衰落。

历史告诉我们这一点，从这一教训中，我们学会了对自由的共产主义机构充满信心，以提高因实行权威而堕落的社会的道德水平。

今天，我们并肩生活，却互不相识。在选举日的集会上，我们聚在一起：倾听候选人的谎言或虚假的信仰表白，然后回家。国家负责处理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只有国家才有责任确保我们不损害邻居的利益，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就惩罚我们，以弥补过失。

我们的邻居可能会饿死或杀害他的孩子，这与我们无关，而是警察的事。你们几乎互不相识，没有什么能把你们团结在一起，一切都会使你们彼此疏远，而你们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于是就请求万能的上帝（以前是上帝，现在是国家）尽其所能，阻止反社会的激情达到最高潮。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种隔阂，这种对外部力量的信任。共产主义组织不能由被称为议会、市议会或社区委员会的立法机构来建立。它必须是所有人的工作，是自然的成长，是广大群众的建设性天才的产物。共产主义不能从上面强加于人；如果没有所有人持续不断的日常合作来维护它，它甚至连几个月都活不了。它必须是自由的。

如果不为成千上万共同交易在所有人之间建立起持续的联系，它就无法存在；如果不在最小的单位——住宅区、街道、地区、公社——中建立起独立的地方生活，它就无法存在。如果不在社会中建立一个由数以千计的协会组成的网络，以满足人们的千百种需要：生活必需品、奢侈品、学习、享受、娱乐，那么它就无法实现其目的。而且，这些协会不可能一直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它们必须趋向于国际化（就像学术协会、自行车俱乐部、人道主义协会等已经出现的情况一样）。

而共产主义——即使它的起源只是局部的——必然会在生活中产生的一种社会风尚，在维护和发展这种社会风尚的内核方面，已经是一种比所有镇压机器都要强大无比的力量。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求发展的教会和国家承诺强加给我们的和谐精神的形式——社会机构——其可悲结果我们再清楚不过了。这些话包含了我们对那些认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能共存的人的回答。你们看，它们是必要的互补。正如我们的一位同志所说的那样，只有当食物和住所的最初需要得到满足时，只有当与自然力量的生存斗争得到简化时，只有当人的时间不再完全被日常生存的琐事

所占用时，只有当人的智慧、艺术品味、创造精神和天才得以自由发展并不断取得更大成就时，个性和个人原初的最有力的发展才会产生。

共产主义是个人发展和自由的最佳基础；共产主义不是那种驱使人类进行各自为战的个人主义——这是迄今所知的唯一的个人主义——而是代表着人类能力的充分扩展，代表着人类原初内涵的卓越发展，代表着智慧、情感和意志的最大丰硕成果。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不能立即实现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对社会的分析，找出其在特定演变时刻的特征趋势，并将其清晰地表述出来。然后，在我们与所有与我们有相同想法的人的关系中，根据这些趋势采取行动。最后，从今天起，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我们要努力摧毁阻碍这些趋势发展的制度和偏见。

这就是我们通过和平或革命方式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知道，支持这些趋势，我们就能促进进步，而抵制这些趋势的人则会阻碍进步的步伐。

然而，人们常常说要经历一些阶段，他们建议努力达到他们认为最近的站点，然后才走上通往他们认为更高理想的坦途。

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推理似乎误解了人类进步的真正特征，并且使用了一个错误的军事对比。人类不是滚动的球，甚至也不是行进的队伍。它是一个整体，在千百万人中同时发展。如果你想进行比较，那你就应该用有机进化的规律来比较，而不是用无机运动物体的规律来比较。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智慧活动的结果；它带有所有这些千百万意志的烙印。因此，无论二十世纪为我们准备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的社会状态都将显示出目前正在发生的自由主义思想觉醒的影响。而这场运动对二十世纪体制的影响有多深，将取决于今天打破专制偏见的人有多少，取决于他们在抨击旧体制时所发挥的能量，取决于他们给群众留下的印象，取决于自由社会的理想在群众心中留下的印象有多清晰。

现在所有政党——包括社会主义专制主义政党——总是有意无意地用党的纪律扼杀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委员会、中心命令一切；地方机关只能服从，“以免危及组织的团结”。一言以蔽之，就是一整套教条；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编写的一整套虚假的历史；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阐述的一整套难以理解的伪经济学。

那么，那些致力于打破这些过时策略的人，那些知道如何在个人和团体中唤起首创精神的人，那些能够在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以自由理解原则为基础的运动和生活的人，那些能够理解多样性，甚至冲突是生命而统一是死亡的人，他们将不是为了未来的世纪，而是为了下一次革命，为了我们自己的时代，认真地工作。

我们不必担心自由的危险和“滥用”。只有那些无所作为的人才不会犯错。至于那些只知道服从的人，他们犯的错误同样多，甚至比那些按照自己的智慧和社会教育所建议的方向努力行事的人更多。个人自由的理想——如果由于周围环境中的制度没有充分强调团结的概念而被错误地理解——肯定会导致孤立的人做出违背人类社会情感的行为。让我们承认，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然而，这难道是将自由原则抛到九霄云外的理由吗？为了防止“离经叛道”，那些主子们重新建立了对已获得选举权的新闻界的谴责，并将先进的政党送上断头台，以维持统一和纪律——而这一切在1793年都是确保反动胜利的最佳手段——他们的教导难道是我们接受的理由吗？

当我们看到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实施反社会行为时，唯一要做的就是摒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勇于当着任何人的面大声说出我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这也许

会带来冲突，但冲突本身就是生命。从冲突中产生的对这些行为的理解，要比在旧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所有理解都要公正得多。

显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如此深刻的革命，不可能只局限于思想领域而不扩展到行动领域。

因此，新思想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可能的条件下激起了大量的反抗行动：首先是个人对资本和国家的反抗；然后是集体反抗——罢工和工人阶级起义——两者都在人们的思想中和行动中准备着群众的反抗，准备着革命。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是遵循了进化的进程，而进化总是在伟大的人民起义临近时通过武力——理念来完成的。

因此，把造反行为的垄断权归于无政府主义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我们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造反行为时，我们会发现它们来自所有党派。

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工人群众和农民纷纷起义。曾经是“双臂交叉之战 (a war of folded arms)”的罢工，如今很容易转变为起义，有时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叛乱。无论在新世界还是旧世界，罢工者的起义转化为起义的次数多达十几次。

如果你们和我们一样，希望个人的全部自由，进而希望个人的生命得到尊重，那么，你们就必然要反对人治，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你们就不得不接受你们长期以来所唾弃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然后，你们必须和我们一起寻找最能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形式，并结束引起你们愤怒的一切暴力。

《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的摘要

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无政府主义奠定科学基础，是克鲁泡特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大约同时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小册子中，他描述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趋势的关系。由于讨论的大部分内容涉及有争议的哲学问题和普通读者不再感兴趣的作家，因此这部分内容被省略了。克鲁泡特金引用它们只是为了摧毁它们——几乎没有必要重复这场战斗。关于“行动的手段”的一章，虽然与小册子的主要论题内容关系不大，但由于其简明扼要的表述而被重印。

小册子中的一段话是其中的关键：“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以对所有现象的机械解释为基础，涵盖整个自然……。它的研究方法是精确自然科学……。其目的是构建一种综合哲学，将自然界的所有现象概括在一起。”

克鲁泡特金修订了原初作品，并于1913年出版，但只有法文版。修订后，有争议的材料得到了更新，但主要论题的内容却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这也是普通读者唯一感兴趣的地方。

无政府主义就像社会主义一样具有普遍性，也像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当然不是从科学或某个哲学流派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距离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精确的时代还很遥远。即使是气象学，我们也无法提前一个月甚至一周预测天气。因此，对年轻的社会科学寄予厚望是不合理的，因为社会科学所涉及的现象要比风雨复杂得多，它们对社会事件的预报也不可能有任何准确性。此外，不能忘记的是，科学研究者也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是占有阶级的后裔，沉浸在本阶级的偏见中，要么就是在为政府实际服务。因此，无政府主义并非来自大学。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也与其他所有社会运动一样，诞生于人民之中；只有当它仍然是人民的东西时，它才会继续充满生机和创造力。

在人类社会中，始终有两种趋势在交战。一方面，大众以习俗的形式发展出许多必要的制度，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解决可能出现的争端，以及在一切需要合作的事情上互相帮助。最早期的野蛮氏族、村社、猎人，以及后来中世纪自由城镇共和国的工业行会、这些城市在早期为解决相互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法的雏形，还有许多其他制度，都不是由立法者，而是由人民的创造力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时候，巫师、先知、祭司和军事组织的首领也都会出现，他们都在努力建立和加强自己对人民的权威。他们互相支持，结成联盟，以便统治人民，使他们臣服，迫使他们为主人工作。

无政府主义显然是第一种趋势的代表，即人民自己的创造力和建设性力量的代表，他们的目标是发展普通法律制度，以保护他们免受少数权力追求者的侵害。现在，无政府主义以现代科学和技术为基础，通过同样的人民创造力和建设性活动，试图发展能够确保社会自由发展的制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政府主义者和政府主义者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存在过。

同样，制度——即使是那些以确保平等、和平和互助为目标而建立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变得僵化，失去其原初意义，被少数统治者所控制，最终成为个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于是，人们就会起来反对这些制度。但是，当这些不满者中的一些人试图摆脱旧制度——种姓制度、公社制度或行会制度——的枷锁时，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超越其他人，并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发财致富；而另一些人则旨在从所有人的利益出发来修改这些制度，尤其是为了摆脱固定在社会上的权威。所有真正严肃的改革者，无论是政治改革者、宗教改革者还是经济改革者，都属于这一类。在他们中间，总是有这

样一些人，他们不等待所有同胞，甚至大多数同胞都抱有同样的观点，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群策群力，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前进。这些人就是革命者，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他们。

但是，革命者本身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奋起反抗既有的权力，不是要废除它，而是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改革者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来取代已经成为压迫性的权力机构，他们承诺，如果他们行使权力，将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并永远代表人民自己。然而，通过这种方式，罗马帝国建立了“沙皇 (Cxsars)” 的权威，教会的权力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头几个世纪中不断上升，而独裁者的暴政则在中世纪公社衰落时逐渐发展起来。同样，在封建社会末期，国王和沙皇也利用这一趋势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为人民服务”的皇帝的信仰，即“沙皇主义 (Cxsarism)”，至今仍未消亡。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趋势也在不断显现。从古希腊开始，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和民众运动，他们的目标不是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彻底废除权力。他们宣称个人和人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并努力使人民机构摆脱外来的有害力量，以便人民不受阻碍的创造才能能够按照新的要求重塑这些机构。在古希腊共和国的历史上，特别

是在中世纪的联邦历史上，我们发现了无数这种斗争的例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者和革命者中始终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者。

在过去的时代，甚至出现过后一种（无政府主义）性质的伟大民众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奋起反抗权威——权威的工具、法庭和法律——并宣布人的权利至高无上。这些运动的倡导者摒弃一切成文法，努力建立一个以平等和劳动为基础、以每个人凭良心治理自己为基础的新社会。基督教反对罗马法律、罗马政府和罗马道德（或者说罗马不道德）的运动始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犹太地区，在这场运动中，无疑存在着许多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退化成了一场教会运动，以古代希伯来教会和罗马帝国本身为蓝本，扼杀了无政府主义的萌芽，采用了罗马政府的形式，并逐渐成为政府权力、奴役和压迫的主要堡垒。

同样，在再洗礼派运动（它真正奠定了宗教改革的基础）中，也有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但是，在路德的领导下，一些改革者与王公们联合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这就扼杀了这一运动。在荷兰和德国对农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之后，这一运动就消亡了。于是，温和的改革者逐渐堕落为今天以新教徒之名存在的良心与政府之间的妥协者。

无政府主义因此，概括地说，它起源于人民的建设性和创造性活动，过去所有的社区生活机构都是通过这种活动发展起来的；它还起源于一种抗议——对强加于这些机构的外来力量的反抗；这种抗议的目的是给人民的创造性活动以新的空间，使其能够以新的活力建立必要的机构。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政府主义产生于同样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抗议，这种抗议呼唤着社会主义的诞生。只不过，有些社会主义者在否定了资本和以剥削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了。他们没有谴责我们认为构成资本主要堡垒的东西，即政府及其主要支持：中央集权、法律（总是由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制定）和法院（主要为维护权威和资本而设立）。

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将这些机构排除在批判之外。它不仅攻击资本，还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来源：法律、权威和国家。

但是，尽管无政府主义像所有其他革命运动一样，诞生于人民之中，诞生于现实生活的斗争之中，而不是诞生于哲学家的工作室之中，但了解它在目前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思潮中占据何种地位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它属于哪个法哲学流派，与哪种现存的科学倾向最有亲和力。

无政府主义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它建立在对所有现象的机械解释之上，涵盖了整个自然界——也就是说，包括人类社会的生活及其经济、政治和道德问题。它的研究方法是精确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它自诩为科学，那么它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必须通过科学结论必须通过的方法来验证。它的目标是构建一种综合哲学，概括自然界的所有现象，因此也包括社会生活。

因此，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无政府主义自然应该给出新的答案，并在这类问题上采取不同于所有政治党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同于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立场。

当然，对一个完整的机械世界概念的阐述，在其社会学部分——即涉及社会生活和演变的部分——几乎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完成的少量工作无疑具有明显的特点，尽管这些特点往往不是完全有意识的。在法哲学、道德理论、政治经济学、国家和制度的历史领域，无政府主义已经表明，它不会满足于形而上学的结论，而会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在自然科学领域寻求基础。

就像形而上学中关于宇宙精神或自然中的创造力、观念的化身、自然的目标、存在的目的、不可知、人类（被认为具有独立的精神存在）的概念一样，今天的唯物主义哲学把所有这些都撇在一边，隐藏在这些虚无缥缈的术语之下的概括雏形正在转化为自然科学的具体语言。我们在处理社会生活的事实时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也要努力扫除形而上学的蛛网，看看在各种虚无缥缈的词语下隐藏着哪些概括雏形（如果有的话）。

当形而上学家试图说服自然科学家，人类的精神和道德生活是按照某些“内在的精神法则”发展的时候，自然科学家耸耸肩，继续从生理学角度研究生命现象、智力现象、情感和激情现象，以期证明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化学和物理现象。他努力发现这些现象所依据的自然规律。同样，举例来说，当无政府主义者被告知，每一种发展都是由正题、反题和综合组成的；或者“法律的目的是建立正义，而正义代表着最高理念的实现”；又或者，当有人问他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们也只是耸耸肩，不明白在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怎么还会有老古董继续相信这样的“话语”，还在用原始拟人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把自然界看成是由具有人类属性的存在物所支配的事物）。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被华丽的词藻所迷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词藻所掩盖

的要么是无知——即未完成的研究，要么是更糟糕的迷信。因此，他们按照科学的归纳方法，继续研究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思想和制度。在此过程中，他们当然会发现，社会生活的发展比我们用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判断要复杂得多，也比我们用形而上学的公式来判断要有趣得多。

我们最近听到了很多关于“辩证法”的说法，有人建议用这种方法来制定社会主义理想。这种方法我们并不认可，现代自然科学也与之毫无关系。“辩证法”让现代自然科学家想起了一些早已逝去的東西——一些过时的、现在已被科学愉快地遗忘的东西。十九世纪在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方面的发现，都不是用辩证法，而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取得的。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既然人的“精神”生活，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都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就像花朵的生长或蚂蚁和蜜蜂的社会生活的演变一样，那么当我们从花到人，或从海狸的聚居地到人类的城镇时，就没有理由突然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

归纳法很好地证明了它的优点，应用归纳法的十九世纪使科学在一百年内取得了比之前两千年更大的进步。而在本世纪下半叶，当这种方法开始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时，还没有人发现有必要放弃这种方法，重新采用中世纪

的经院哲学。此外，当庸俗的自然科学家似乎以“达尔文主义”为论据，开始教导我们“碾碎比自己弱小的人，这就是自然法则”时，我们很容易首先证明这不是达尔文的结论，并用同样的科学方法证明这些科学家走错了路；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动物的生活教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的结论绝对是不科学的。这些结论就像断言财富不平等是自然规律，或者资本主义是最有利于促进进步的社会生活形式一样不科学。正是这种应用于经济事实的自然科学方法，使我们能够证明，中产阶级社会学的所谓“规律”，包括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规律，而只是猜测，或者只是从未被验证过的断言。

此外，每项研究只有在具有明确的目标——为了获得一个明确的、措辞清晰的问题的答案——时，才会结出硕果。探索者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问题与他对宇宙的总体概念之间存在的联系，就越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对问题在总体概念中的重要性理解得越透彻，就越容易找到答案。因此，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式能为特定社会，进而为全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从而也带来最大的活力？”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形式最有可能使这种幸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增长和发展，即变得更加完整和更加多样？朝着这个方向促进进化愿望决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科学活动以及社会和艺术活

动。而这种活动，正是由于它与社会朝着这个方向的发展相吻合，才成为了增强生命力、活力与人类的一体感及其最佳生命力的源泉。

因此，它成为个人增强活力和幸福感的源泉。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之前的革命

无政府主义，如前所述，它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

在1789—1793年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戈德温有机会亲眼目睹了革命期间和革命本身所建立的政府权力是如何阻碍革命运动的。他也知道当时英国在议会的掩护下发生了什么——没收公有土地，工厂代理人绑架贫民区的儿童，将他们驱逐到织布厂，让他们在那里大批死亡。他明白，一个政府，即使是“统一”的主义共和国的政府，也不会带来必要的革命；革命政府本身，由于它是国家和每个国家必须捍卫的特权的守护者，是解放的障碍；为了确保革命的成功，人们首先应该放弃对法律、权威、统一、秩序、财产以及我们从奴役的过去继承下来的其他迷信的信仰。为此，他写下了《政治正义》一书。

戈德温之后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蒲鲁东——亲身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亲眼目睹了革命共和政府犯下的罪行和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的无能。蒲鲁东带着耳闻目睹的深刻印象，写下了令人钦佩的著作《社会革命的一般思想》和《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大胆地主张废除国家，并宣布无政府主义：“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最后，在1871年巴黎公社试图进行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再次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公社委员会的彻底失败和它作为一个革命机构的无能——尽管它按适当的比例由当时的每一个革命派别的代表成员组成——使许多人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国际伦敦总委员会的无能和它可笑的、甚至是有害的自命不凡，企图用从英国发出的命令来指挥巴黎的暴动，也使许多人大开眼界。这使包括巴枯宁在内的许多国际党员开始反思各种权力和政府的危害性——即使是像公社和国际工人协会那样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几个月后，在1871年于伦敦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而不是在年度代表大会上，协会的同一个总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使在国际中建立政府的危险性更加明显。通过这场可怕的革命，他们决定把整个工人运动转入另一个渠道，把它从经济革命运动——工人组织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转变为选举议会和政治运动。这一决定导致了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以及部分比利时联合会对伦敦总理事会的公开反抗，而现代无政府主义就是在这一反抗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每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兴起，都是对现实生活教训的回应，都源于事件的实践倾向。在这种推动下，无政府主义运动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论和科学基础。科学——

不是指采用难以理解的术语，也不是指固守古老的形而上学，而是指在当时的自然科学中为自己的原则找到基础，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门。

与此同时，它还制定了自己的理想。任何斗争，如果不简明扼要地阐明自己的目标，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如果在推翻现存秩序时，或者在导致推翻现存秩序的斗争中，头脑中没有始终存在着以什么取代被摧毁的东西的想法，那么就不可能摧毁现存秩序。除非批判者的头脑中或多或少有一幅他希望取代现有状态的清晰图景，否则即使是对现有条件的理论批判也是不可能的。每个批判社会制度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头脑中形成理想，形成对更好事物的构想。

行动者更是如此。如果告诉人们：“首先让我们废除专制或资本主义，然后我们再讨论用什么取而代之”，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而权力从来不是靠欺骗产生的。那些贬低理想、嗤之以鼻的人，总是怀有某种理想，希望用什么来取代他所攻击的东西。在那些致力于废除专制的人当中，有些人不可避免地会想到英国或德国那样的宪法，而另一些人则会想到一个共和国，或者是置于自己政党的强大独裁之下，或者是以法兰西帝国共和国为蓝本，或者是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共和国。

当人们攻击资本主义时，他们总是有某种概念，一种模糊或明确的想法，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某种国家共产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联合体，以生产、交换和消费商品。

因此，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未来理想，它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有事件的标准，也是确定其适当行动方式的基础。无政府主义也有自己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使它找到了自己的直接目标和行动方法，这些目标和方法不同于所有其他政党的目标和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那些保留了旧罗马和教会政府组织理想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目标和方法。

从上文可以看出，历史学、人种学 and 经济学等多方面的考虑使无政府主义者构想出了一个与专制政党所认为的理想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成员的所有相互关系都不是由法律来调节的，也不是由权力机构（无论是自封的还是选举产生的）来调节的，而是由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议和社会风俗习惯的总和来调节的，这些风俗习惯不是被法律、常规或迷信所固化，而是根据科学进步、发明创造和更高理想的稳步发展所刺激的自由生活不断增长的要求而不断发展和不断调整的。

没有统治当局。没有以人治人；没有固化和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进化——就像我们在大自然中所看到的那样。个人自由发挥，充分发展个人天赋，实现个性化。换句话说，个人不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被强加任何行为；社会不会要求他做任何事情，只有他自由接受的事情才会被要求做。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这就足以防止那些可能对其他个人和社会本身有害的不合群行为，并有利于社会道德的稳定发展。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和倡导的理念。

当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实现这些原则，尽管人类一直在为部分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不同于迄今为止大多数哲学家、科学家和政党领袖所倡导的社会理想，他们妄图统治人类和管理人类。

但把这样的构想描述为乌托邦并不公平，因为“乌托邦”一词在我们现在的语言中表达的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想法。

因此，从其通常的现有含义来看，“乌托邦”一词应仅限于那些仅仅基于理论推理的概念，即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可取的，而不是基于人类聚居区已经发展的东西。例如，教皇的天主教帝国、拿破仑帝国、密茨凯维奇的救世主主义等等都是乌托邦。但是，它不能适用于一种

社会概念，这种社会概念的基础是对社会中已经发生的演变趋势的分析，以及由此对未来的推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趋势几千年来一直是社会习惯和风俗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学上以习惯法的名义为人所知，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习惯和风俗越来越明确地肯定了自己。

当我们探究无政府主义社会观念的起源时，我们会发现它有双重起源：一方面是对等级组织和专制社会观念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人类进步运动中出现的趋势的分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

从最遥远的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一定意识到让其中一些人获得个人权力会带来的恶果——即使他们是最聪明、最勇敢或最有智慧的人。因此，他们在原始氏族、乡村社区、中世纪行会（邻里行会、工艺行会、商人行会、猎人行会等），最后在自由的中世纪城市中发展出了这样的制度，使他们能够抵御那些征服他们的陌生人和那些试图建立个人权威的本族成员对他们的生活和财富的侵犯。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及其胡斯派和再洗礼派先驱的早期群众宗教运动中，同样的民众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在更晚的时期，即1793年，同样的思想和行动潮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和所有大城市的“区”以及许多小“公社”的引人注目的独立、自由联合活动中得到了体现。后来，在英国和法国，尽管有德拉科克法律的约束，但工厂制度一开始发展起来，就出现了劳工联合，这也是民众反抗少数人——这里指的是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结果。

这些都是我们所知的历史上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言而喻，这些运动必然会在文学中得到体现。从中国的老子开始，到希腊最早的一些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犬儒学派；芝诺和一些斯多葛派），他们都是这样做的。然

而，由于诞生于群众之中，而不是在任何学术中心，这些民众运动，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深刻的建设性的，在有识之士中都很少得到同情——远不如专制的等级制倾向。

1793年，戈德温在《政治正义探询》中以相当明确的形式阐述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原则。他没有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本身，但他非常有力地阐述了其原则，大胆地抨击了法律，证明了国家的无用性，并坚持认为只有废除法院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所有社会的唯一真正基础。关于财产，他公开主张共产主义。

蒲鲁东是第一个使用“无政府”（an-archy）一词的人，他有力地批判了人们为建立一个既能防止富人统治穷人，又能始终受被统治者控制的政府而做出的徒劳无益的努力。法国自1793年以来多次试图建立这样的宪法，而1848年革命的失败则为他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蒲鲁东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而当年（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一个分支，因此他猛烈抨击了所有此类尝试；他采用罗伯特·欧文的劳动支票制度来代表劳动时间，并发展了一种互助主义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任何形式的政治政府都是无用的。

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是以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衡量的，生产者之间的所有交换都可以通过一家国家银行来进行，这家银行接受以劳动支票支付的款项——一家清算所负责确定这家银行数千家分行之间每天的交换余额。

这样，不同的人所交换的服务将是等价的；由于银行可以无息借出劳动支票的钱，每个协会也可以借钱，但只需支付1%或更少的管理费用，资本将失去其有害的力量；它再也不能被用作剥削的工具。

蒲鲁东在他的反政府和反国家思想中，互助主义体系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纲领中的互助主义部分在英国已经由威利安·汤普森（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是一名互助主义者）以及汤普森的英国追随者约翰·格雷（1825年、1831年）和J.F.布雷（1839年）得到了发展。

在美国，乔赛亚·沃伦（Josiah Warren）也代表了同样的方向，他在参加了罗伯特·欧文的殖民地《新和谐》之后，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并于1827年在辛辛那提创办了一家“商店”，其中的货品物品按照时间价值和劳动支票的原则进行交换。直到1865年，这种机构一直以“公平商店”、“公平村”和“公平之家”的名义存在。

1843年和1845年，摩西·赫斯（Moses Hess）和卡尔·格吕恩（Karl Grün）在德国倡导了同样的劳动价值和按劳动成本进行交换的思想；在瑞士，威廉·马尔（Wilhelm Marr）反对魏特林的专制共产主义学说。

另一方面，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在德国工人中拥有大量拥护者。为了反对魏特林的共产主义，1845年出现了德国人黑格尔式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约翰·卡斯帕尔·施密特（Johann Kaspar Schmidt）是他的真名）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部著作最近被J.H. Mackay重新发现，并在无政府主义圈子里广为流传，被视为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宣言。

施蒂纳的作品既是对国家的反抗，也是对新的暴政的反抗。黑格尔式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推理，施蒂纳宣扬

“我”的复活和个人至上；他以这种方式主张完全的“无道德主义”（没有道德）和“利己主义者的联合体”。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无政府主义作家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法国教授V. Basch最近在了一本有趣的著作《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Anarchist Individualism）中也指出过这一点：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904年，法文）中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面发展”，而只是为了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天赋的人的“全面发展”，它并不关心所有人的全面

发展权利，这只不过是对目前存在的少数人垄断教育的一种变相回归。它仅仅意味着少数特权阶层的“全面发展权利”。但是，由于这种垄断只有在垄断立法的保护下和国家有组织的强制下才能维持，因此，这些个人主义者的主张必然以回归国家观念和他们自己猛烈抨击的那种强制而告终。因此，他们的立场与斯宾塞以及所有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学家的立场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从严厉批评国家开始，最终完全承认国家，以维持财产垄断，而国家是财产垄断的必要堡垒。

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法国大革命和戈德温到蒲鲁东的发展过程。下一步是在伟大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中迈出的，它在1868-1870年间——就在德法战争之前——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的希望和中产阶级的恐怖。

不言而喻，这个协会并非如英雄崇拜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马克思或任何其他人士创立的。它是1862年前来参观第二届国际博览会的法国工人代表团与接待该代表团的英国工会和激进分子在伦敦会面的结果。

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公社

随着法德战争的爆发，法国惨败，甘贝塔和梯也尔的临时政府成立，巴黎公社成立，随后法国的圣埃蒂安、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卡塔赫纳也发生了类似的尝试。这些人民起义证明了社会革命的政治方面应该是什么。

不是1848年所说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自由、独立的共产主义公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黎公社本身也受到了关于革命应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步骤的思想混乱的影响。起义中既有雅各宾主义者，也有公社主义者，即中央集权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最好战的分子是布朗基派和布朗库派，但在他们的中产阶级领袖中，巴贝夫的经济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逐渐消失。他们将经济问题视为次要问题，在公社取得胜利后再加以解决，这种想法占了上风。但不久之后的惨败和中产阶级的嗜血报复再次证明，如果人民没有在经济领域同时取得胜利，人民公社的胜利实质上是不可能的。

对拉丁国家而言，巴黎公社以及随后在卡塔赫纳和巴塞罗那的类似尝试，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这就是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的形式——独立公社。让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反对它吧；但是，一旦它的居民决定将商品消费、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公有化，他们就必须在自己中间实现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如果他们试图把整个国家，包括最落后或最冷漠的地区，都纳入革命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些力量是永远不可能被唤醒并为伟大的事业服务的。与其把这些反动堡垒像许多锁链一样拴在战士的脚上，不如光明正大地同它们作斗争。

不止于此。我们更进一步。我们明白，如果不需要中央政府来统治独立的公社，如果国家政府被抛弃，国家统一是通过自由联邦来实现的，那么中央市镇政府就会变得同样无用和有害。同样的联邦原则也适用于公社内部。

因此，巴黎公社的起义解决了困扰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问题。法国曾两次试图通过一个或多或少愿意接受它的中央政府来推行某种社会主义革命：1793—94年，法国试图通过强有力的雅各宾主义措施来推行真正的经济平等；1848年，法国试图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每一次她都失败了。但现在，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出现了：自由公社必须在自己的领土上实现这一目标，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理想——无政府主义。

我们当时就明白，在蒲鲁东的《二十世纪革命总论》（*Idée Générale sur la Révolution au Dix-neuvième Siècle*）（可惜尚未译成英文）的底层，蕴藏着一个深刻而实用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拉丁国家，更先进的思想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唉！只在拉丁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的法语区和比利时的瓦隆区。相反，德国人从对法国的胜利中汲取了另一个教训和完全不同的理想——对中央集权国家的崇拜。

中央集权的国家，甚至敌视民族独立的倾向；中央集权的力量和强大的中央政权——这些都是他们从德意志帝国的胜利中汲取的教训，他们甚至现在还在坚持这些教训，却不明白这只是军事群众的胜利，是德国人的普遍义务兵役制战胜了法国人的征兵制度，战胜了拿破仑第二帝国的腐朽。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因为德国人的入侵而受阻，本可以造福人类。

在拉丁国家，巴黎公社和卡塔赫纳公社的教训为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国际劳动人民协会总委员会的专制倾向很快就显露出来，并对大公社的统一行动产生了致命的破坏作用，这更加强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更有甚者，由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法国布朗基难民——都是纯粹的雅各宾主义者——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利用自己的权力

在国际中发动了政变。它在协会的纲领中用议会的政治行动代替了劳工反对资本的经济斗争，而后者一直是国际的精髓。通过这种方式，它在西班牙、意大利、尤拉希克和东比利时联合会以及英国国际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中挑起了对其权威的公开反抗。

巴枯宁与国家

巴枯宁和他的汝拉朋友们聚集了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青年，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巴枯宁的思想。巴枯宁主要利用他广博的历史和哲学知识，在一系列强有力的小册子和信件中确立了现代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

他大胆宣布的口号是彻底废除国家及其所有组织和理想。国家在过去是历史的必然，是由宗教种姓赢得的权威发展而来的。但现在，国家的彻底消亡反过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国家代表着对自由的否定，甚至破坏了国家为普遍福祉所做的努力。在国家范围内制定的一切法律，即使是所谓的普选产生的法律，也必须予以否定，因为它总是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公社都必须有绝对的自由，只要不对邻国构成威胁，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起来。

“联邦制”和“自治”是不够的。这些只是用来掩盖国家权力的字眼。公社的完全独立、公社的自由联合以及公社内部的社会革命——他证明，这才是我们文明从过去的迷雾中崛起的理想。个人明白，只有当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获得自由时，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至于他的经济观念，巴枯宁本质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与国际联盟的联邦主义同志们一样，作为对专制共产主义者在法国激发的共产主义对立的让步，他把自己称为“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当然不是维达尔或佩奎尔或他们的现代追随者意义上的“集体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只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对“集体主义”的理解是上述意义上的，即不事先决定生产者在其不同的团体中应采取何种分配形式——无论是共产主义方案，还是劳动支票、平等工资或任何其他方法。基于这些观点，他热衷于宣扬社会革命，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预见到了这场革命的临近，而他也用火热的语言预言了这场革命。

国家是为了建立有利于奴隶主和农奴主、土地所有者（教会的和非教会的）、商人行会和放债人、国王、军事统帅、贵族，最后是19世纪的工业资本家的垄断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旦这些垄断不复存在，国家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无用的机构。一旦取消了富人剥削穷人的机制，生活就会变得简单。

以独立的公社来组织领土，以工会联合会根据人们的不同职能将他们组织起来，这些想法为社会革命带来的社会再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概念。除了这两种组织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种组织方式，即成千上万的自由联合体和社团，它们在过去五十年中迅速发展，因为在这

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点自由：为了满足一切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需要，包括经济、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需要；为了相互保护、宣传思想、艺术和娱乐等方面的需要，自由联合体和社团在各地发展起来。所有这些组织和社团都互相覆盖，并随时准备通过新的组织和调整来满足新的需求。

不仅如此。我们现在开始明白，如果人类社会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强制和惩罚必然会走向衰落。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维持一定道德水平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社会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正义感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发展，因为正义意味着承认平等；而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正义的原则不会在每一步都与现存的权利和发展可能性的不平等相矛盾，那么正义的原则就一定会传播开来，并成为人们的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将是自由的，因为他的自由将不再受到恐惧的限制：对社会或神秘惩罚的恐惧，或对被认为是他的上级的其他人或神秘和形而上学实体的服从——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智力上的奴役（人类最大的诅咒之一）和人的道德水平的降低。

在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环境中，人可以充满信心地让自己的理智（当然，理智必然会打上社会环境的烙印）引导自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把“个人主义”视为天赋较好的个人发展的手段，但正如每个人自己所看到

的那样，“个人主义”是这种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和国家把生产力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绝大多数有天赋的人既没有闲暇，也没有机会发展他们更高的天赋；而且还因为那些有闲暇的人得到了当今社会的承认和奖励，条件是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批评决不能“太过分”，尤其是决不能做出可能导致这个社会毁灭，甚至导致严重改革的行为。只有那些在这方面不危险的人才能获得一定的“个性发展”——他们只是“有趣”，但对非利士人来说并不危险。

我们说过，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 的预测是建立在对当前生活 的观察所提供的数据之上的。

因此，当我们研究自十八世纪末以来文明国家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趋势时，我们当然不会看不到，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中产阶级还是在那些接受过中产阶级思想教育、现在正努力进入他们现在的统治者和剥削者行列的劳动者中间，集权和专制的趋势是多么强烈。

但与此同时，反集权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思想，以及对自由的理解，在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或多或少自由的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在西欧——中越来越强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我已经在其他地方（《面包与自由》和《互助论》中）说明了，在国家和教会之外，目前自由组成成千上万个自由组织的趋势是多么强烈，这些自由组织可以满足各种需要：经济的（铁路公司之间的协议、劳工辛迪加、雇主信托、农业合作、出口合作等）、政治的、知识的、艺术的、教育的等等。以前毫无疑问属于国家或教会职能的东西，现在都进入了自由组织的领域。

这种趋势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只要解放的气息稍微限制了教会和国家的权力，它们就会永不满足地进一步扩张，而志愿组织已经成千上万地萌芽了。我们可以确信，对国家和教会这两个自由的死敌施加的每一个新的限制，都会进一步扩大自由组织的行动范围。

未来的进步就在这个方向上，而无政府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

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观点

现在来谈谈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观点，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概念。

只要社会主义被理解为广义的、一般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努力废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政府主义者就会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并进。但是，当社会主义者开始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经济进化阶段，我们只能减轻剥削，并对资本家施加某些法律限制时，他们就不得不与社会主义者分离。

与当今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倾向相反，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废除资本主义对劳动剥削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而不必等待它的到来。我们现在就必须努力把生产所需的一切——土壤、矿山、工厂、通讯工具和生存手段——从资本家个人手中转移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手中。

至于政治组织，即在其中可以实现经济革命的共同国家的形式，我们与所有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者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在现在以集体主义名义宣扬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看不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在邮政和电报组织、国营铁路等被当作无资本家社会例证的组织

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新的、也许是改进的、但仍然不可取的工资制度形式。我们甚至认为，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与文明人类目前的自由主义倾向背道而驰，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认为，国家组织曾是少数人建立和组织他们对大众权力的力量，它不可能成为摧毁这些特权的力量。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种新的经济生活形式总是呼唤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集体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正如不能利用教堂把人从旧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一样，人类团结的情感除了教堂之外还必须找到其他表达渠道一样，人类的经济和政治解放也必须创造新的生活表达形式，而不是国家建立的那些形式。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人民劳动群众的建设性力量，这种力量在所有伟大的历史时刻都会挺身而出，完成必要的变革。

这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接受立法者或国家公仆职能的原因。我们知道，社会革命不会通过法律来完成。法律只能追随既成事实；即使法律真的追随既成事实——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只要现场没有使法律所表达的趋势成为既成事实所需的有生力量，法律仍然是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时代起，无政府主义者就一直建议积极参加那些开展劳工反对资本及其保护者——国家——的直接斗争的工人组织。

他们说，这种斗争比任何其他间接手段都更能使工人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获得一些暂时的改善，同时也使工人睁开眼睛，看到资本主义和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家所造成的罪恶，并唤起他们对在没有资本家和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的思考。

劳动报酬

对于在一个摆脱了资本和国家枷锁的社会中劳动报酬可能采取的形式，无政府主义者的意见仍然存在分歧。

首先，所有人都一致反对新形式的工资制度，如果国家成为所有土地、矿山、工厂、铁路等的所有者，并成为农业和所有工业的伟大组织者和管理者，就会建立起这种制度。如果在国家已经拥有的权力（税收、领土防卫、宗教补贴等）之外再加上这些权力，我们就会建立一个比旧暴政更可怕的新暴政。

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接受共产主义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在文明社会中，唯一可以接受的共产主义形式就是没有政府持续干预的共产主义形式，即无政府主义形式。他们还认识到，一个规模庞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它首先保证其所有成员共同享有一定的最低福利。因此，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相互完善的。

然而，在这股主要潮流的一侧，也有人从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复苏。

在我们看来，这最后一股潮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食品和所有工业品的生产能力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完善程度。在那个时代，共产主义确实被视为等同于普遍的贫困和苦难，而幸福则被视为只属于极少数人的东西。但

是，共产主义面临的这一相当现实和极其重要的障碍已不复存在。由于当今人类在农业和工业等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相反，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共产主义工作，在几年内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很高的福利水平。

尽管如此，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细分为两个分支。首先是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意义上的纯粹个人主义者，他们最近在尼采的著作中以优美的诗歌形式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一次，这种“个人的自我主张”是多么形而上学，多么远离现实生活；它是多么违背我们大多数人的平等意识；它是多么危险地使未来的“个人主义者”接近那些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人——国家、教会、现代立法、警察、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都是拜他们所赐。

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个分支是蒲鲁东意义上的互助主义者。然而，始终有人反对这种制度，认为它很难与土地和生产必需品的共同所有制相容。拥有土地、工厂等的共产主义和生产中的个人主义太矛盾了，无法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更不用说用生产产品所需的平均时间或实际使用的时间来估算产品的市场价值或销售价值的困难了。要使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做出这样的估价达成一致，就需要将共产主义原则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中——至少对于所有的第一需要的产品来说是这样。如果一个社会为

了进一步向个人主义让步，对技术性工作给予更高的报酬，或者在职务等级制度中给予晋升的机会，这就会重新带来现行工资制度中的种种不便，而工人们现在正在与这些不便作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美国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他们在5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S.P.安德鲁斯和W.格林，后来是莱桑德·斯普纳，现在的代表人物是《纽约自由报》的著名编辑本杰明·塔克。他们的思想部分来自蒲鲁东，部分来自赫伯特·斯宾塞。他们的出发点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唯一必须遵守的法律就是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每个人和每个团体都有权压迫全人类——如果他们有力量这样做的话；如果管好自己的事这一唯一的法律得到普遍和彻底的应用，它就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因为每个人的权利都会受到其他人平等权利的限制。

但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推理是对形而上学辩证法的过分推崇，是对现实生活事实的忽视。我们不可能想象，在一个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事务都与其他许多成员，甚至与所有成员无关；更不可能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成员之间的持续接触不会使每个人都对所有其他人产生兴趣，从而使我们在采取行动时不可能不考虑我们的行动可能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塔克和斯宾塞一样，在对国家进行了令人钦佩的批判并大力捍卫个人权利之后，又开始承认国家有保卫其成员的权利。然而，正是由于承担了“保卫”弱小成员的职能，国家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出了其所有的侵略职能，而斯宾塞和塔克正是对这些职能进行了精辟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虽然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追随者，但却没有在工人中传播开来，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一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它在防止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对国家官僚主义的旧思想做出过多让步方面发挥了真正的作用。旧思想是很难摆脱的。

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办法如今在那些试图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有一个明确概念的工人中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工团主义者和工会运动比任何选举都更能让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团结，更能让他们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为这些概念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无政府主义与法律

当我们被告知，法律（用大写字母书写）“是真理的客观化”；或者“法律发展的基本原则与人类精神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或者“法律与道德是相同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我们对这些论断的敬意就像对歌德《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论断的敬意一样少。我们知道，发表这些看似深奥的言论的人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很多心思。但是，他们走错了路；因此，我们在这些高谈阔论的句子中看到的仅仅是在不充分的基础上进行无意识的概括的尝试，而且还被那些以晦涩难懂来催眠人的词语所迷惑。古时，他们试图赋予“法”以神圣的起源；后来，他们开始为“法”寻求形而上学的基础；而现在，我们能够研究它的社会习俗起源。利用人类学派取得的成果，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习俗，从原始野蛮人的习俗开始，追溯法律在不同时代的起源和发展。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已经表达过的结论，即所有法律都有双重起源，在这一点上，它们与那些由习俗建立起来的、被普遍认为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道德准则的制度不同。法律确认并固化了这些习俗，但同时也利用这一事实，为了少数武装统治者和未来统治者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伪装的形式），建立了奴隶制和阶级差别的萌

芽、祭司和武士的权威、农奴制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就这样，一个枷锁不知不觉地套在了人的身上，而人只有通过后来的流血革命才能摆脱这个枷锁。这就是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过程——甚至在当代的“劳动立法”中，除了“保护劳工”之外，还暗中引入了在罢工情况下强制国家仲裁、强制规定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在罢工期间对铁路进行军事剥削、在爱尔兰对剥夺农民财产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等等。只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继续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律，从而加强构成资本主义主要支撑的国家权力，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因此，很明显，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比任何立法者都更渴望正义，正义等同于平等，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从戈德温时代起就拒绝一切成文法。

然而，当我们被告知拒绝法律就是拒绝一切道德时，我们的回答是这种反对意见的措辞本身对我们来说是奇怪和不可理解的。对我们来说，这就像对每一个从事道德现象研究的自然主义者一样奇怪和难以理解。针对这一论点，我们要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不能把你的说法翻译成可以理解的语言吗？”

现在，一个坚持“普遍法则”立场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以德报怨更好吗？如果是这样，那就

好办了。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人类这些道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让我们把研究扩展到人类以前的时代。然后，我们可以分析正义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平等的观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那些视他人为平等的人才能接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地主和奴隶主不把“农奴”和黑人视为平等的人，他们不承认“普遍法则”适用于人类大家庭中这些不幸的成员。如果我们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传授不平等学说的同时，是否还有可能灌输道德。

最后，我们将像马克·居约那样，分析自我牺牲的事实。然后，我们将考虑是什么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道德情感的发展——首先是那些在关于我们邻居的诫命中所表达的情感，然后是导致自我牺牲的其他情感；经过这样的考虑，我们将能够从我们的研究中准确地推断出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什么样的制度有望在未来取得最好的结果。宗教是否促进了这种发展？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以及阶级的划分是否促进了这种发展？是法律促进的？惩罚？监狱？法官？狱卒？刽子手？

让我们详细研究这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通过法律、法庭、狱卒、间谍和警察来再次谈论道德和道德化。但是，我们最好放弃使用这些铿锵有力的词语，因为它们只能掩盖我们半知半解的肤浅。在他们的时代，使用

这些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的应用永远不会有用。既然我们现在能够像园丁和生理学家研究最有利于植物生长的条件一样来研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那就让我们这样做吧！

经济法

同样，当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上，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社会劳动量来衡量的”时，我们并不会因为这一论断是由某些权威人士提出的，或者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似乎“非常社会主义”而信以为真。我们说，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正是通过这句话，你们坚持认为价值和必要劳动是成正比的——就像下落物体的速度与下落的秒数成正比一样？这样，你就在这两个量之间建立了一种量的关系；而量的关系只能通过量的测量来证明。如果你只是说，当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商品的交换价值

“一般”会增加，然后就断言这两个量是成正比的，那就像有人断言降雨量是通过气压计降到平均高度以下来测量的一样。谁首先观察到，一般来说，气压计下降时的降雨量比上升时的降雨量大；或者谁首先观察到，石块下落的速度与石块下落的高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人肯定是做出了科学发现。但是，如果有人在他之后断言，降雨量是通过气压计跌落到平均高度以下来测量的，或者落体经过的空间与落体时间成正比，并且是通过落体时间来测量的，那么这个人不仅会胡说八道，而且会用他的话证明，科学研究的方法对他来说是绝对陌生的；他的工作是

不科学的，尽管它可能充满了科学的表述。缺乏数据显然不是借口。科学界已知有成百上千种类似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量级对另一个量级的依赖——例如，大炮的后坐力取决于装药的火药量，或者植物的生长取决于它所接受的热量或光量。但是，任何科学工作者都不会在没有定量研究这些量级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就贸然肯定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更不会把这种比例关系说成是科学定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依存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价值理论中也是如此。必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绝不成正比。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当今某些圈子里流行的几乎所有经济学说，它们被天真地说成是不变的定律。我们不仅发现这些所谓的定律大多是严重错误的，而且还认为，一旦那些相信这些定律的人发现有必要通过定量调查来验证他们的定量推论，他们自己就会确信这些定律是错误的。

此外，在我们看来，整个政治经济学与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现代经济学家所看到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由于他们完全不懂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因此，尽管他们乐于使用“自然法则”这一术语，却无法明确说明什么是“自然法则”。他们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会不断地忘记——每一条自然法则都具有条件性。事实上，每一条自然法则都有这样的含义：“如果

自然界中的某些条件起作用，某些事情就会发生。”“如果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相交，在交叉点两侧形成直角，那么后果将是这样那样的。”“如果两个物体只受到星际空间中存在的运动的作用，并且在可测量的距离内没有第三个或第四个物体作用于这两个物体，那么它们的重心将以一定的速度相互接近（万有引力定律）。”诸如此类。每种情况都有一个“如果”——一个条件。

因此，所有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定律和理论，实际上不过是以下性质的陈述：“假定一个国家总有相当多的人，如果不挣工资，不接受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工作条件，或接受国家承认的土地、工厂、铁路等所有者向他们提供的工作条件，就无法维持一个月甚至两星期的生活，那么结果就会如此这般”。

迄今为止，学术界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列举在上述条件下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明确说明这些条件本身。然后，在描述了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社会中出现的事实之后，他们就把这些事实作为僵化的、不可避免的经济规律向我们表述。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它批评了一些推论，或对另一些推论作了不同的解释，但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它仍然沿袭着老一套，在大多数情况下重复着同样的错误。

然而，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着眼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人类社会而言，政治经济学应该在科学中占据类似于生理学在动植物方面的地位。它必须成为社会的生理学。它的目的应该是研究社会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各种手段，包括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手段和在目前科学知识水平下可以使用的手段。然后，由于每一门科学的最终目的（正如培根已经指出的那样）显然是预测和实际应用于生活的需求，它应该关注的是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同时尽可能减少劳动的浪费，并为全人类带来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这些手段只是上述相关研究的必然结果，只要最后一项研究是按照科学的思路进行的。

无政府主义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社会形式，尤其是国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它不能满足于当前形而上学的如下论断：

“国家是对社会最高正义理念的肯定”；或者“国家是进步的动力和工具”；或者“没有国家，社会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研究，恰如博物学家对蜜蜂和蚂蚁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或对在亚北极湖畔孵化幼鸟的候鸟的研究。关于不同政治形式的历史（以及它们在未来的理想或可能的演变），在此重复这项研究给我们带来的结

论是没有用的。如果我要这样做，我就不得不重复无政府主义者从戈德温时代就开始写的东西，以及可以在一整套书籍和小册子中找到的所有必要的解释。

我只想说，国家是一种社会生活形式，它在一系列原因的影响下，自16世纪末才在我们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在16世纪之前，罗马形式的国家并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存在于那些把俄国专制制度的谱系追溯到鲁里克·Rurik、把法国专制制度的谱系追溯到墨洛温国王·Merovingian kings的历史学家的头脑中。

此外，在我们看来，国家（国家司法、国家教会、国家军队）和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在历史上，这些制度并肩发展，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同时代发展的巧合，而是因与果、果与因的纽带。因此，在我们看来，国家是地主、武士、法官和牧师相互保险的社会，其建立是为了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对人民行使各自的权力，剥削穷人。

这就是国家的起源，这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就是国家的本质。

因此，我们认为，幻想资本主义可以被废除，而国家却得以维持，而且还得到了国家的帮助——而国家的建立是为了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国家的力量和稳固性也在不断增强——就像期望从教

会、凯撒主义或帝国主义那里解放劳工一样不合理。当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曾做过这样的梦；但在我们进入二十世纪的今天，还生活在同样的梦境中，实在是太幼稚了。

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需要新的政治结构形式。而且，无论这种变革是通过革命突然实现的，还是通过渐进演化缓慢实现的，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变革都必须齐头并进，携手并行。

向经济自由迈出的每一步，对资本主义取得的每一次胜利，同时也是向政治自由迈出的一步——通过自由协议、领土协议、职业协议和职能协议，从国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国家手中夺取任何一种权力和属性的每一步，都是在帮助人民群众赢得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行动手段

显然，既然无政府主义在研究方法和基本原则上与学术界的社会学家及其社会民主主义兄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在行动手段上也必然与他们有同样的差异。

根据我们对法律、权利和国家的理解，我们无法从个人服从国家中看到任何进步的保证，更无法从个人服从国家中看到实现必要的社会变革的途径。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像那些肤浅的社会现象解释者那样，当社会现象要求国家对工业进行管理时，就说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剥削的无政府状态”、通过“不干涉理论”产生的。我们被告知，国家是通过实践“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自由放任、放任自流）的公式来实现这一点的。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给予资本家任何程度的自由空间，让他以牺牲无助的劳动者为代价来积累财富的同时，政府在整个十九世纪从未给劳动者提供过“随心所欲”的机会。可怕的革命者，也就是雅各宾主义会议，把罢工当作一种联盟，并制定了法律：“对于罢工，对于在国家内部形成一个国家——处死！”1813年，英国有人因罢工被处以绞刑，1831年，他们因成立罗伯特·欧文的大行业联盟（各行各业的联盟）而被驱逐到澳大利亚。到了六十年代，人们仍然会因为参加罢工而被判处苦役，甚至到了现在，工

会也会因为在罢工期间劝阻工人不要工作而被起诉，要求赔偿损失。那么，法国、比利时、瑞士，尤其是德国和俄罗斯又该如何呢？国家如何通过征税把劳动者推向贫困的边缘，使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受制于工厂老板；如何从人民手中夺走公有土地，这些都不用说了。或者，我们还必须提醒读者，甚至在当前，所有国家都在无一例外地直接建立各种垄断企业——铁路、电车、电话、煤气厂、自来水厂、电厂、学校等等。总之，“不干涉”——自由放任——的制度从未被任何政府实行过一个小时。

因此，如果说中产阶级经济学家可以肯定“不干涉”制度是可行的（因为他们努力证明贫穷是自然法则），那么社会主义者这样对工人说话就是可耻的。迄今为止，反对剥削的自由从未在任何地方存在过。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以无数牺牲为代价，一步步用武力夺来的。“不干涉”，不仅仅是不干涉，还有直接的支持、帮助和保护，这些都只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教会的使命是使人们在思想上成为奴隶。国家的使命则是使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成为经济奴隶。

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把地主、企业主、武士阶层和神职人员的统治强加给土地上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工匠。富人非常清楚，如果国家机器不再保护他们，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权力就会荡然无存。

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无论在向共产主义演变的过程中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农奴制和绝对君主制一直并驾齐驱。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资本主义统治也是如此，其政治形式是代议制，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利用代议制政府作为解放劳动者的武器，正如它不能利用教会及其神权理论、帝国主义和凯撒主义及其官僚等级理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一样。

一旦社会主义原则进入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制定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不言而喻，这种新形式必须比代议制政府更受欢迎、更去中心化地接近民间自治。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认为在更大程度上让所有人服从国家是进步的保证。我们追求的进步是个人从国家权力中获得最充分的解放，是个人主动性的最大发展，是对所有政府职能的限制，但肯定不是政府职能的扩展。在我们看来，政治体制的进步首先在于废除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已经把自己固定在社会上，而且现在还试图越来越多地扩大自己的职能；其次在于允许自由协议原则得到尽可能广泛的发展，并承认所有可能的、为明确目的而组成的、包含整个社会的联合体的独立性。我们所理解的社

会生活本身，并不是一种完整和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永远不会完美的东西——一种不断追求新形式，并根据时代需要不断改变这些形式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界的生命。

这种对人类进步和我们认为未来可取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可以增加幸福的東西）的观念，必然会引导我们在斗争中采取自己的特殊策略。它促使我们努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主观能动性，并确保行动的统一，这不是通过纪律，而是通过目标的统一和相互信任。

然后，我们断言并努力证明，每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经济形式都有责任发展自己的新政治关系形式。过去如此，未来无疑也将如此。新的形式已经在各地萌芽。

封建权利和专制制度，或者至少是沙皇或国王几乎无限的权力，在历史上是并驾齐驱的。它们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资本家的统治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在严格集权的君主制和共和制中发展出了自己特有的政治秩序——代议制政府。

社会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无论在何种程度上接近其不可避免的目标——共产主义，都必须选择自己的政治结构形式。它无法利用旧的形式，就像它无法利用教会的等级制度或专制制度一样。国家官僚机构和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不可调和，就像专制与资本主义统治不可调和一

样。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必须变得更加大众化、更加社区化，减少对通过民选代表产生的间接政府的依赖。它必须变得更加自治。

此外，当我们仔细观察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现代生活时，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些国家里，有一种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由完全独立的公社、城镇和乡村组成的团体，它们将通过自由联邦的方式结合起来，以满足无数的需要和达到某些直接目的。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趋势表现为数以千计的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尝试，以及试图掌握国家以前篡夺的、当然国家从未适当履行过的各种职能的尝试。然后，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社会现象，这种趋势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一系列类似起义中得到了体现；而在思想领域——在社会中传播的思想——这种观点已经具有了未来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力量。法国和西班牙未来的革命将是公社主义的，而不是中央集权的。

有鉴于此，我们深信，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其视为必要条件，就意味着与已经显现的进步趋势背道而驰。我们从这种工作中看到了对社会主义本身历史使命的严重误解——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我们要向它宣战。向劳动者保证，只要保留整个政府机构，只改变管理机构的人员，他们就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甚至能够在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这不是为了促进，而是为了延缓劳动人民一心探索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新形式的那一天的到来，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错误，几乎是犯罪。

最后，由于我们代表的是一个革命政党，我们努力研究过去革命的起源和发展史。首先，我们努力使迄今为止撰写的革命史摆脱党派色彩，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政府色彩。在迄今为止所写的历史中，我们还看不到人民，也看不到革命是如何开始的。关于人民在革命前的绝望状况的陈词滥调，无法解释从何而来的绝望，从何而来的更好的希望，从何而来的革命精神。因此，在阅读了这些历史之后，我们将其搁置一边，回到最初的源头，试图从中了解是什么导致了人民的崛起，人民在革命中的真正角色是什么，人民从革命中获得了什么好处，人民在革命中传播了什么思想，人民在革命中犯下了什么策略上的错误。

因此，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完全不是路易·勃朗所描绘的那样，他把大革命主要描绘成一场由雅各宾俱乐部领导的伟大政治运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场混乱的人民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罗伯斯庇尔”，了解人民起义的格雷瓜尔神父对历史学家施洛瑟

如是说)。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摧毁一切封建权利的残余和为废除其中一些权利而强加的重赋，以及收回被各种秃鹫从村社攫取的土地。至此，农民运动取得了成功。

然后，在革命骚动、生活节奏加快和国家一切权力涣散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城镇劳动者中出现了一种模糊理解的社会主义平等的倾向，以及在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部门”中为各种经济和政治职能而建立的令人钦佩的人民自愿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努力工作，成功地在王室和贵族的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为此，中产阶级进行了顽强而拼命的斗争，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包罗万象的中央集权政府，维护并确保他们的财产权（部分是在大革命之前和期间通过掠夺获得的），使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剥削穷人。我们研究了这两种势力的发展和斗争，并试图找出为什么后者比前者占上风。我们看到，在革命雅各宾派建立的国家中央集权中，拿破仑如何找到了建立帝国的优良土壤。巴黎无产阶级直到1871年才第一次试图摆脱中央集权的枷锁，这一尝试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我们在此不对其他革命运动进行分析，只想说，我们理解的社会革命，根本不是雅各宾主义专政，根本不是通过大会、元老院或独裁者颁布的法律来改革社会制度。这样的革命从未发生过，采取这种形式的运动注定会走向死

亡。我们把革命理解为一场广泛的人民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在起义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群众都必须承担起重建社会的任务，必须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不等待上层的任何命令和指示，自己承担起建设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组织起来，为每个人提供食物，为每个人提供住所，然后生产出每个人吃饱穿暖所需的一切。

他们可能不是——他们肯定不会成为全国的大多数。但是，如果他们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中数量可观的少数人，按照自己的新社会主义路线开始生活，他们就能够赢得走自己道路的权利。他们很可能会吸引相当一部分土地向他们靠拢，就像 1793-94 年法国的情况一样。

至于代议制政府，无论是自封的还是选举产生的——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选举产生的“临时政府”，还是雅各宾主义的“公约”，我们对它都不抱任何希望。我们事先就知道，只要人民自己不当场制定出必要的新制度来实现变革，它就无法完成革命。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不喜欢政府，而是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从未在任何地方发现，被革命浪潮推向政府的人民被证明是能够胜任的。

在根据新原则重建社会的任务中，单独的人，无论多么聪明和执着，都肯定会失败。为此，群众的集体精神必不可少。孤立的人有时可以找到合法的表达方式概括对旧社会形式的破坏——而此时破坏已经开始。最多，他们也许可以扩大重建工作的范围，把在国家的一部分地区正在进行的工作扩大到更大的地区。但是，通过法律强制推行重建是绝对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整个历史和其他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革命大会通过的数以千计的法律甚至还没有生效，反动派就把这些法律扔进了废纸篓。

在革命期间，新的生活形式总会在旧形式的废墟上萌芽，但只要这些形式还没有在重建工作中形成明确的形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找到它们的表现形式。为未来立法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模糊地猜测其基本趋势，并为其扫清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对待革命的问题，无政府主义显然不能对旨在“征服当前社会的权力”的纲领采取同情的态度。我们知道，在现今的国家里，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征服的。中产阶级不会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权力。它将进行反抗。只要社会主义者在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中成为力量，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必须消亡。否则，在智力和数量上都比社会主义报刊所承认的要强大得多的中产阶级将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统治者。我

们还知道，如果一场革命使法国、英国或德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如果没有人民自己的活动，这些政府将是绝对无能为力的，而且，它们必然会很快开始对革命起致命的束缚作用。

最后，我们对所有革命准备阶段的研究得出结论，没有一场革命起源于议会或任何其他代表大会。所有革命都是从人民开始的。没有一场革命是像密涅瓦从木星的头顶上蹦出来一样，在一天之内全副武装地出现的。它们都有自己的潜伏期，在此期间，人民群众慢慢地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变得更加大胆，开始抱有希望，并一步步地从以前的冷漠和顺从中走出来。革命精神的觉醒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的：起初，单个的人被现存的情况深深打动，一个接一个地对它提出抗议。许多人牺牲了，坐在扶手椅上的评论家会说“毫无用处”。但是，社会的冷漠被这些先驱者们动摇了。最愚钝、最狭隘的人也不得不反思：

“为什么年轻、真诚、充满力量的人要以这种方式牺牲生命？”人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思想正在觉醒。随后，越来越多的小团体也被同样的反抗精神所感染。他们也反抗——有时是希望在当地取得成功——罢工或小规模反抗他们不喜欢的官员，或者是为了给饥饿的孩子们争取食物，但往往也没有

成功的希望：仅仅是因为条件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在每次革命之前，不是一次、两次、几十次，而是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起义。没有这些，就不会有革命。

如果没有这些起义所包含的威胁，统治阶级就不会做出丝毫让步。就连托尔斯泰常说的俄国著名的“和平”废除农奴制，也是由一系列农民起义迫使政府作出的，这些起义从50年代初开始，逐年蔓延，直到1857年，其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亚历山大·赫尔岑说过：“与其等着从下面废除农奴制，不如从上面废除农奴制。”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的农奴主面前重复了这句话。每次革命前夕都是如此。在每一次革命之前，都有数以百计的局部起义。可以说，每一场革命的性质都是由它之前的起义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因此，如果不经个人良知的一系列抗议，不经决定革命性质的数以百计的初步反抗，就等着社会革命作为生日礼物到来，这至少可以说是荒谬的。但是，如果向劳动人民保证，他们只需进行选举鼓动就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好处，并强烈抨击每一次个人反抗行为和所有小规模初步群众反抗，这就意味着他们会像基督教会一样，成为革命精神发展和一切进步的巨大障碍。

结论

在不进一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纲领的情况下，我认为已经说得足够多了，足以说明无政府主义在现代社会学科学中的地位。

无政府主义试图将通过自然科学归纳法获得的概括应用于人类制度的研究，并试图预见人类在通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道路上的未来步骤，以期实现人类社会每个单位的最大幸福总和。

它是始于十八世纪末期的自然科学思想运动的必然结果，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这场运动受到了整个欧洲反动派的阻碍，而自五十年代末以来，这场运动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其根源在于上述世纪的自然科学哲学。然而，它只有在自然主义觉醒之后才能获得完整的科学基础，自然主义觉醒带来了对人类社会制度的自然科学研究。

在无政府主义中，没有那些伪科学规律的空间，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德国形而上学家不得不满足于这些规律。无政府主义不承认自然科学以外的任何方法，并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所有所谓的人道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利用这种方法以及最近由这种方法引发的所有研究，努力重建所有

与人有关的科学，并在修订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修订当前的每一种权利和正义观念。它的目标是形成一种科学的宇宙观，包括整个自然界，也包括人类。

这一世界观决定了无政府主义在实际生活中的立场。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与十八世纪的前辈们一样，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反对国家，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反对压迫社会的权威。它利用现代科学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表明国家——它的拥护者们现在倾向于扩大它的权力范围，而在实际生活中则倾向于限制它——实际上是一种上层建筑，既有害又不必要，而且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它的起源相对较晚。这种上层建筑符合资本主义——土地、工业和金融——的利益，它在古代历史上导致了政治自由的罗马和希腊的衰落，也导致了东方和埃及所有其他专制文明中心的消亡。

这种权力是为了把地主、法官、武士和牧师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在整个历史中，它一直反对人类为自己创造更有保障、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每一次尝试。这种权力不可能成为解放的工具，就像帝国主义或教会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工具一样。

在经济领域，无政府主义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罪恶的根源不在于资本家侵占了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在于这些利润的可能性本身。这些利润的产生只是因为千百万人如果

不按一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实际上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赖以生存，而这种价格使得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为可能。

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理解，在政治经济学中必须首先关注所谓的“消费”，革命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组消费，以便为所有人提供衣食住行。另一方面，“生产”必须进行调整以满足社会这一原初基本需求。因此，无政府主义不能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看到仅仅是货币符号与劳动支票的交换，或者是现在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交换。它看到的是通往无政府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第一步。

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是否正确，将由对其基础的科学批判和未来的实践生活来证明。但有一点它是绝对正确的：它把对社会制度的研究纳入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永远地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并使用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唯物主义哲学赖以发展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在研究中可能犯的错误才更容易被发现。但是，它的结论只能用自然科学的归纳法来验证，而每一门科学和每一个科学宇宙观都是用归纳法创造的。

《法律与权威》的摘要

这本关于法律的起源及其在当今世界中的应用的小册子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论点，即政府可以被废除，而社会仍然可以生存。不仅是生存，而且是在自由中第一次成长。私人资本主义当然也必须消失，因为它是政府所保护的不平等和特权的根源。权衡法律的善恶，所有人都会同意它们弊大于利。

克鲁泡特金追溯法律的起源，最初是原始迷信，后来是征服者的法令。我们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真正的法律并不是这两种，而是在它们之前就存在的不成文习俗，甚至在动物中也存在。与它们并存的是成文法，之所以受到尊重，只是因为它们的根源在于保护人们免受国王的任性之害。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被誉为法律基础的说法却是谎言。我们现在知道了它们的阶级性。它们体现了两套控制，即社会习俗和阶级利益；“不要杀人，交税”，这在表面上让人无所适从！

当今的大多数法律都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保护对他人劳动的不正当占有；另一个是维持政府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来保护财产。保护人身是法律的一项非常微不足道的职能。大多数针对人身的犯罪都是

抢劫。废除所有保护人身的法律，复仇或激情犯罪就不会增加。至于所谓的“自由”法律，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废除了对以前自由的限制。

通过财产社会化废除一切法律；仅通过习俗和教育进行社会控制，这些就是克鲁泡特金的论点。

I

“当无知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当人们的思想混乱时，法律就会成倍增加，人们期望立法能够无所不能，而每一部新的法律都是一次新的误判，人们就会不断地向法律要求那些只能从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教育和他们自己的道德中产生的东西。”说这番话的不是革命家，甚至也不是改革家。而是法学家达洛伊，他是法国法律汇编《法律汇编》的作者。然而，尽管这几句话是由一个本身就是法律的制定者和崇拜者的人写的，但它却完美地代表了我们社会的不正常状况。

在现有的国家中，新的法律被视为对邪恶的补救。人们不是自己去改变不好的东西，而是首先要求一部法律来改变它。如果两个村庄之间的道路无法通行，农民会说：“应该制定一部关于教区道路的法律。”如果一个公园管理员利用那些奴颜婢膝地跟在他后面的人缺乏精神的弱点，侮辱了其中一个人，那么被侮辱的人就会说：“应该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公园管理员必须更加礼貌。”如果农业或商业停滞不前，农场主、养牛人或玉米投机商就会说，“我们需要的是保护性立法。”上至老裁缝，下至老衣工，没有一个不要求制定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小买卖。当雇主降低工资或增加劳动时间时，政治家就会感叹：“我

们必须有一部法律来纠正这一切。”总之，法律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一部关于时尚的法律，一部关于疯狗的法律，一部关于美德的法律，一部制止人类的懒惰和懦弱所导致的一切恶习和一切罪恶的法律。

我们的教育如此变态，从孩提时代起就试图扼杀我们的反抗精神，培养我们服从权威的精神；我们的生活如此变态，在法律的约束下，我们的出生、教育、成长、爱情、友情等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到法律的制约。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将失去所有的主动性，失去所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们的社会似乎再也无法理解，除了由代议制政府制定并由少数统治者管理的法律统治之外，还有其他存在的可能。即使社会已经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它首先关心的也是如何重建桎梏。《自由元年》从未持续过一天，因为人们在宣布自由元年后，第二天一早就把自己置于法律和权力的枷锁之下。

事实上，几千年来，那些管理我们的人除了“尊重法律，服从权威”之外，什么也没做。父母就是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教育子女的，而学校也只会加深这种印象。为了证明法律的必要性，学校巧妙地向孩子们灌输各种虚假的科学知识；服从法律成为一种宗教；道德的善意和主人的法律融为一体。学校课堂上的历史英雄就是遵守法律、捍卫法律、抵御叛逆的人。

后来，当我们进入公共生活时，社会和文学就像水滴石穿一样，日复一日、每时每刻地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继续灌输着同样的偏见。历史学、政治学、社会经济学的书籍中充斥着这种对法律的尊重。甚至物理科学也被强加于此，将借用神学和专断权力的人为表达方式引入纯粹观察结果的知识中。这样，我们的智慧就被成功地迷惑了，并始终保持着对法律的尊重。报纸也是这样做的。报纸上没有一篇文章不在宣扬对法律的尊重，即使第三版每天都在证明法律的低能，表明它是如何被那些负责管理法律的人拖入各种泥潭和污秽之中的。在法律面前奴颜婢膝已经成为一种美德，我怀疑是否有哪位革命者在年轻时不是从捍卫法律开始，反对所谓的“滥用”，尽管这些滥用是法律本身不可避免的后果。

艺术与科学齐头并进。雕刻家、画家、音乐家中的英雄将罗置于自己的盾牌之下，闪烁的眼睛和胀大的鼻孔时刻准备着击倒对她动手动脚的人。人们为她建立了庙宇；革命者自己也不敢触碰为她服务的大祭司，而当革命要扫除一些古老的制度时，它仍然通过法律来努力使这一行为神圣化。

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制和皇权遗留给我们的一堆混乱行为规则被称为法律，它们取代了那些石头怪兽的位置。

自从中产阶级掌握了最高权力——自从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新的崇拜就特别成功地建立起来了。在古代制度下，人们很少谈论法律，除非像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那样，将法律与王权的任性对立起来。服从国王及其走狗的喜好是强制性的，否则就会被处以绞刑或监禁。但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当律师们崛起掌权时，他们竭尽全力巩固他们赖以上位的原则。中产阶级立即接受了这一原则，将其视为拦截民众洪流的堤坝。牧师们急忙将其神圣化，以避免他们的船在巨浪中倾覆。最后，人民接受了它，认为它是对过去专横的权威和暴力的一种改进。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自己带入十八世纪的想象中。在我们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出身贵贱，一律服从法律”这句话对农民的心灵产生了怎样的魔力之前，我们的心一定已经为当时的权贵们对人民犯下的暴行而痛不欲生。在此之前，他受到的待遇比野兽还残酷，他从来没有任何权利，他从来没有为贵族最令人反感的行为伸张过正义，除非他为了报复而杀死贵族并被绞死——他看到自己被这条准则承认了，至少在理论上，至少在个人权利方面，他与贵族是平等的。无论这条法律是什么，它都承诺对领主和农民一视同仁；它宣布富人和穷人在法官面前一律平等。这个承诺是谎言，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

但在那个时代，它是一种进步，是对正义的敬意，就像虚伪是对真理的敬意一样。正因为如此，当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的救世主们（罗伯斯庇尔们和丹东们）站在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的立场上，宣称“尊重法律，人人平等”时，人民接受了这种妥协；因为他们的革命动力已经在与敌人的较量中消耗殆尽，而敌人的队伍却在一天天拉近；他们在法律的枷锁下屈服，以免遭领主专横权力的蹂躏。

从那时起，中产阶级就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准则原则，它与另一个原则，即代议制政府，共同概括了资产阶级时代，即十九世纪的整个哲学。它在学校里宣扬这种学说，在著作中传播这种学说，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塑造自己的艺术和科学，把自己的信仰塞进每一个洞穴和角落，就像一个虔诚的英国妇女从门缝里塞进小册子——它把这一切都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是，渴望自由的人在试图获得自由的时候，首先恳求他们的主人好心保护他们，修改这些主人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是一个可憎的事实！

但时代变了，脾气也变了。叛逆者随处可见，他们不再愿意在不知道法律从何而来、其用途是什么、服从法律的义务从何而来以及法律所包含的崇高意义的情况下服从法律。当今的反叛者正在批判迄今为止一直被视为神圣的社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这一拜物教。

批评家们分析了法律的来源，发现法律要么是神——野蛮人恐惧的产物，与那些为法律的超自然起源作担保的祭司一样愚蠢、苍白和恶毒；要么是血腥——火与剑的征服。他们研究了法律的特点，发现法律并没有像人类一样不断发展，而是具有固定不变的特点，即把本应日复一日修改和发展的东西固化下来。他们不禁要问，法律是如何得到维护的？他们看到了拜占庭的暴行、宗教裁判所的残酷、中世纪的酷刑、刽子手鞭子撕裂的鲜血、铁链、棍棒、斧头、阴森的地牢、痛苦、诅咒和眼泪。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和以前一样看到斧头、绳索、步枪和监狱；一方面是被残暴对待的囚犯，他的整个道德沦丧，沦为笼中的野兽；另一方面是法官，他被剥夺了人性中的一切情感，像一个幻想家一样生活在法律虚构的世界里，陶醉于监禁和死亡，甚至在他疯狂的冷酷恶毒中都没有怀疑，在他所谴责的人眼前，他自己已经堕入了堕落的深渊。

他们看到一群立法者在立法时却不知道他们的法律是关于什么的；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关于城镇卫生的法律，却对卫生没有丝毫概念；明天制定关于军队军备的规定，却对枪支一无所知；制定有关教学和教育法律，却从未给自己的孩子上过任何一堂课，甚至没有对他们进行过诚实

的教育；随意制定各方面的法律，却从未忘记对流氓的惩罚、监狱和大牢，这些都是比这些立法者本身更不道德的人的份。

最后，他们看到狱卒在失去人性的路上，侦探被训练成猎犬，警察间谍鄙视自己；“告密”被蜕变成一种美德；腐败被树立成一种制度；人类的所有恶习、所有邪恶品质都得到了支持和培养，以确保法律的胜利。

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因此，我们不再愚蠢地重复“尊重法律”的老一套，而是说：“蔑视法律及其一切属性！”我们的呼声是“反抗一切法律！”，而不是“遵守法律”这种懦弱的说法。

只要比较一下以每一项法律的名义所做的坏事和它所能带来的好处，仔细权衡一下善与恶，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否正确。

II

相对而言，法律是现代的产物。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即使是符号形式刻在寺庙入口石头上的法律。在那个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由习俗、习惯和惯例来调节的，这些习俗、习惯和惯例通过不断重复而变得神圣，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就学会了这些习俗、习惯和惯例，就像他学会了如何通过狩猎、养牛或务农来获取食物一样。

所有人类社会都经历过这一原始阶段，时至今日，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类没有成文法。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礼仪和习俗，即法学家所说的习惯法。它有社会习惯，这足以维持村庄居民、部落或社区成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即使在我们这些“文明”国家中，当我们离开大城市，走进乡村时，我们也会发现，那里的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是根据古老的、普遍接受的习俗来调节的，而不是根据立法者的成文法。俄罗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民，甚至法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农民，都没有成文法的概念。成文法只会干涉他们的生活，调整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有时非常复杂，但也只是根据古老的习俗来调节。以前，人类一般都是这样。

通过分析原始人的习惯，可以发现两种明显的风俗习惯。

由于人类并非生活在孤独的状态中，因此在他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有益于维护社会和种族繁衍的习惯和情感。没有社会情感和习惯，共同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建立社会情感和习俗的不是法律；它们先于一切法律。也不是宗教规定了它们，而是它们先于一切宗教。它们存在于生活在社会中的所有动物之中。它们自发地发展成为事物的本质，就像人们称之为本能的动物习性一样。它们产生于一个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是有益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可以使社会在被迫维持生存的斗争中保持团结。野蛮人最终不再互相残杀，因为他们发现，从长远来看，从事某种耕作比每年享用一次年迈亲人的肉体更有好处。许多旅行者都描绘过绝对独立的部落的礼仪，那里没有法律和酋长，但部落成员在每次争端中都放弃了互相捅刀子，因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习惯已经结束，形成了某种博爱和利益一致的情感，他们宁愿求助于第三者来解决他们的分歧。原始民族的热情好客、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互惠义务感、对弱者的同情、勇气，甚至为他人牺牲自我的精神——这些最初是为了孩子和朋友，后来是为了同一社区的成员——所有这些品质都是人类在所有法律之前发展起来的，

与所有宗教无关，就像社会动物一样。这种情感和做法是社会生活的必然结果。这些品质并不像祭司和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共同生活的结果。

然而，与这些社会生活和种族存续所必需的习俗并存的是，在人类的交往中还产生了其他的欲望、激情，以及其他的习惯和习俗。支配他人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欲望；攫取邻近部落劳动产品的欲望；不生产任何东西而将自己包围在舒适环境中的欲望，而奴隶则为主人提供各种享乐和奢侈的手段——这些自私的个人欲望催生了另一股习惯和风俗。牧师和战士、江湖术士，他们利用迷信牟利，在摆脱对魔鬼的恐惧后，又在他人身上培养迷信；恶霸，他们促使邻居入侵和掠夺，以便自己满载战利品和奴隶返回。这两个人联手，成功地把对他们都有利的习俗强加给原始社会，但却使他们对大众的统治永久化。他们利用群众的懒惰、恐惧和惰性，通过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永久性地建立起了习俗，这些习俗已成为他们统治的坚实基础。

为此，他们首先会利用人类高度发达的在凹槽中奔跑的倾向。在儿童和所有野蛮人身上，这种倾向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动物身上也可以观察到这种倾向。人类一旦迷信，就总是害怕在现有条件下引入任何形式的变化；他通常崇尚古老的东西。每当年轻人想改变现状时，老人就会

对年轻人说：“我们的父辈是这样做的，那样做的；他们过得很好，他们把你们养大，他们并没有不快乐，你们也要这样做！”未知的事物会让他们感到害怕，他们宁愿选择已知的事物。未知让他们恐惧，他们宁愿固守过去，哪怕过去代表着贫穷、压迫和奴役。

甚至可以说，一个人越悲惨，他就越害怕各种变化，生怕变化会让他更加悲惨。在他开始渴望更好的事物、批评旧的生活方式并准备为实现变革而不惜牺牲旧的生活方式之前，他的阴郁居所必须有一线希望、几片慰藉。只要他还没有被灌输希望，只要他还没有摆脱那些利用他的迷信和恐惧的人的教导，他就宁愿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如果年轻人希望有所改变，老人就会对革新者大声疾呼。有些野蛮人宁死也不愿意违背自己国家的习俗，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稍有违背既定惯例就会带来厄运，毁掉整个部落。即使在今天，还有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未来的革命家抱着同样的印象行事，并固守着已经消失的过去。多少人只顾寻找先例。多少火热的创新者只是过去革命的复制者。

源于迷信、懒惰和懦弱的例行公事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压迫的支柱。在原始人类社会，祭司和军事首领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延续着只对自己有用的习俗，并成功地将其强加于整个部落。只要这种保守精神能够被利

用，从而保证酋长能够侵犯个人自由，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是自然造成的，而且这种不平等并没有因为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而成百上千倍地扩大，就不需要法律以及法庭和不断加重的刑罚这些可怕的工具来强制执行。

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阶级，一个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个则在挣扎着逃脱，争斗开始了。现在征服者急于以永久的形式确保其行动的结果，他试图将其置于不容置疑的地位，用他所能采取的一切手段使其变得神圣和可敬。法律在祭司的认可下出现了，战士的棍棒为法律服务。它的职责是使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习俗永恒不变。军事当局负责确保服从。这一新职能为战士的权力提供了新的保障；现在，他不仅拥有蛮力，还是法律的捍卫者。

然而，如果法律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规定的集合，那么它就很难被接受和服从。那么，立法者们就把我们刚才谈到的两种风俗混淆在一部法典中：一种是代表道德和社会联合原则的准则，它们是共同生活的结果；另一种是旨在确保不平等的外部存在的规定。在法典中，对社会存在绝对重要的习俗与统治种姓强加的惯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两者都要求得到群众的同等尊重。法典说：“不可杀

人”，并匆忙补充说：“向祭司缴纳什一税。”“不可偷盗，”法典说，直接紧接着又说，“拒绝交税的人，将被砍掉手。”

这就是法律；它至今仍保持着双重特性。它的起源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将自己强加的习俗永久化。它的特点是巧妙地将对社会有益的习俗（无需法律来确保尊重的习俗）与只对统治者有益、对广大人民有害、只因害怕受到惩罚而得以维持的其他习俗混合在一起。

个人资本诞生于欺诈和暴力，并在权威的支持下发展壮大。与个人资本一样，法律无权获得人们的尊重。它诞生于暴力和迷信，建立在消费者、牧师和富有的剥削者的利益之上。当人民渴望打破枷锁的那一天，它必须被彻底摧毁。

当我们以后分析了在宗教、权威和现有议会制度的支持下法律的最终发展之后，我们会更加确信这一点。

III

我们已经看到，法律是如何起源于既定的用法和习俗，又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巧妙地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社会习惯与那些利用大众迷信和强者权利为自己谋利的人所强加的其他习俗融合在一起。法律的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它后来在政治组织成长过程中的发展。在漫长的岁月中，铭刻在法律中的社会习俗的核心部分只经历了轻微而渐进的修改，而另一部分则在很大程度上沿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所指明的方向发展，并对他们所压迫的阶级造成伤害。

这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时允许从他们那里榨取法律，为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提供或似乎提供某种保障。但是，这样的法律不过是废除了以前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巴克尔说：“最好的法律，”“是那些废除了先前法律的法律。”“但是，每当出现废除这些束缚人民的基本法令的问题时，都需要付出多么可怕的努力，流过多么惨烈的鲜血。在废除农奴制和封建权利的最后残余、瓦解王室权力之前，法国被迫经历了四年革命和二十年战争。要废除过去遗留给我们的最起码的不公正的法律，也需要几十年的冲突。

关于资本起源的历史，社会主义者已经讲述过多次。他们描述了资本如何诞生于战争和掠夺、奴隶制和农奴制、现代欺诈和剥削。他们说明了资本是如何靠工人的鲜血滋养，又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征服整个世界的。关于法律的起源和发展，同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与往常一样，大众的智慧已经领先于读书人。它已经整理出了这段历史的哲理，并忙着为其奠定重要的里程碑。

法律是掠夺、奴役和剥削结果的保障，与资本的发展阶段相同。这对孪生兄妹携手并进，用人类的苦难支撑着彼此。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它们的历史都大致相同。只要看一眼法国或德国的法律发展，就能了解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

首先，法律是一种国家契约或合同。诚然，这种契约并非总是被自由接受。即使在早期，富人和强者也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人。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遇到人民大众的阻挠，而人民大众也常常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但随着教会和贵族一方成功地蛊惑人心，立法权从国民手中转移到特权阶层手中。教会凭借国库中积累的财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她越来越多地干涉私人生活，并以拯救灵魂为借口，攫取农奴的劳动成果，向各阶层征税，扩大管辖权，加重刑罚，并根据违法行为的数量按比例发财，因为每一笔罚金都流入了她的国库。法律与国家

利益不再有任何联系。“一位研究法国法律的历史学家指出：”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法律与其说是立法者制定的，不如说是宗教狂热者的议会制定的。”

与此同时，男爵的权力也扩展到了田间的劳动者和城镇的工匠，他也成为了立法者和法官。十世纪以来为数不多的国家法律遗迹，只是一些规定农奴和附庸向领主缴纳的役务、法定劳动和贡品的协议。那一时期的立法者是一小撮强盗，他们组织起来掠夺日渐安宁的人民，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强盗利用了人民固有的正义感，他们冒充正义的管理者，利用正义的基本原则为自己创造收入来源，并编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后来，这些由法学家收集和分类的法律构成了我们现代法典的基础。难道我们要谈论尊重这些男爵和牧师遗留下来的法典吗？

第一次革命，即乡镇起义，只成功地废除了这些法律中的一部分；获得自治权的乡镇的宪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男爵和主教立法与在自由市镇内部建立的新关系之间的妥协。然而，这些法律与我们现在的法律有多么大的不同！市政当局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原因而自行监禁和处决公民：它满足于驱逐任何与城市敌人密谋的人，并将其房屋夷为平地基础。它只限于对所谓的“罪行和轻罪”处以罚款，在十二世纪的乡镇中甚至可以看到今天被遗忘的公正

原则，即要求整个社会对其每个成员的错误行为负责。当时的社会将犯罪视为意外或不幸，这种观念在此时的俄罗斯农民中很普遍。因此，他们不承认《圣经》中宣扬的个人复仇原则，而是认为每一次错误行为的责任都归咎于整个社会。拜占庭教会将东方专制主义的精致残酷传入西方，并将死刑和随后对罪犯施加的可怕酷刑引入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习俗中，这需要拜占庭教会的全部影响力。同样，罗马法典是罗马帝国腐朽的产物，它需要施加各种影响才能引入土地绝对财产的观念，推翻原始人的公有制习俗。

受制于富人和穷人、布尔乔亚人和农奴之间的内部分歧，自由市镇很容易成为王室的猎物。随着王室实力的增强，立法权越来越多地落入朝臣集团手中。只有在批准国王要求的税收时，才会向全国呼吁。每隔两个世纪，议会就会根据宫廷的喜好或任性召集一次“特别会议”，这些会议由名流、大臣组成，几乎不理睬“国王臣民的不满”——这些就是法国的立法者。后来，当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可以说“我就是国家”时，诏书就在“王子的秘密会议”中根据大臣或弱智国王的心血来潮炮制出来；臣民必须服从，否则就会被处死。所有的司法保障都被废除了；国民成了王室和少数朝臣的奴仆。在这一

时期，最可怕的刑罚让我们目瞪口呆——车轮、火刑柱、活剥皮、各种酷刑，这些都是僧侣和疯子的变态幻想所发明的，他们从被处死的罪犯的痛苦中寻找快乐。

大革命开始摧毁封建主义和王权留给我们的法律框架。然而，在摧毁了古老大厦的某些部分之后，大革命又将制定法律的权力移交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则开始制定新的法律框架，以维护和延续中产阶级在群众中的统治。他们的议会左右逢源，法律堆积如山，速度快得吓人。但这些法律的根本是什么呢？

大部分人只有一个目标——保护私有财产，即通过人剥削人获得的财富。它们的目的是为资本开辟新的剥削领域，并支持资本在吞并人类活动的另一个分支——铁路、电报、电灯、化学工业、在文学和科学中表达人类思想等——时不断采取的新剥削形式。其余这些规律的目标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持政府机制，以确保资本对所生产财富的剥削和垄断。司法、警察、军队、公共教育、金融，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一个上帝——资本；所有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便利。分析一下所有通过的法律，你就会发现无非如此。

保护人身是法律的真正使命，但在这些使命中，保护人身却占据着微不足道的位置，因为在现今社会中，直接由仇恨和残暴所支配的对人身的攻击已趋于消失。如今，

如果有人被谋杀，一般都是为了抢劫，很少是因为个人复仇。但是，如果说这类罪行和不端行为在不断减少，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立法。这是由于我们社会中人道主义的增长，由于我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习惯，而不是由于我们法律的规定。如果明天废除所有关于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停止所有关于攻击他人的诉讼，那么由个人复仇和野蛮行为所导致的未遂案件的数量将不会增加一例。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颁布了许多自由主义的法律。但是，如果对这些法律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自由主义的立法都是在废除前几个世纪野蛮主义遗留给我们的法律。每一项自由主义的法律，每一项激进主义的计划，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废除中产阶级本身已经感到厌烦的法律，将十二世纪乡镇所享有的自由还给所有公民。废除死刑、由陪审团对所有“罪行”进行审判（十二世纪的陪审团更加自由）、选举地方行政长官、有权对公职人员进行审判、废除常备军、自由教学等等，所有这些被指出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发明的东西，只不过是回到了教会和国王对人类生活的一切表现施加影响之前的自由。

因此，通过有关财产的法律直接保护剥削，通过维护国家间接保护剥削，这既是我们现代法典的精神和实体，也是我们耗资巨大的立法机制的一项职能。但是，现在是

我们放弃仅仅满足于短语，学会领会其真正意义的时候了。法律一开始是作为维护社会的习俗汇编出现的，但现在人们发现，它不过是有钱的闲人维持剥削和统治劳苦大众的工具。如今，它的文明使命已化为乌有；它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加强剥削。

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法律的发展。我们是否因为这段历史而必须尊重它呢？当然不是。它与掠夺的成果——资本一样，没有资格得到尊重。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焚毁一切现行法律，就像焚毁一切财产所有权一样。

IV

为规范人类而存在的数百万部法律，经调查后似乎可分为三大类：保护财产、保护人身、保护政府。通过对这三大类法律的逐一分析，我们得出了同样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法律的无用性和危害性。

社会主义者知道保护财产的含义。制定财产法不是为了保障个人或社会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恰恰相反，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剥夺生产者创造的部分成果，并向某些其他人保证他们从生产者或整个社会窃取的那部分成果。例如，当法律规定某某先生有权拥有房屋时，并不是规定他有权拥有他自己建造的小屋，也不是规定他有权拥有他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建造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质疑他的权利。恰恰相反，法律确立的是他对并非自己劳动所得的房屋的权利；首先是因为他的房屋是他人为他建造的，而他并未向他人支付其劳动的全部价值；其次是因为该房屋所代表的社会价值是他自己无法创造的。法律规定了他对属于所有人而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的权利。我们知道，这种价值来自于大约五十代人的劳动，他们建造了这座城市，美化了它，为它提供了水和煤气、漂亮的长廊、学院、剧院、商店、铁路和四通八达的公路。因此，法律承认某某先生对巴黎、伦敦或鲁昂某处房屋的所有

权，就是不公正地将全人类劳动成果的一部分据为己有。正因为这种侵占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财产具有同样的性质，是一种明显的不公正，所以才需要一整套法律和一大批士兵、警察和法官来维护它，以对抗人类固有的良好意识和正义感。

我们的法律——每个国家的民法典——有一半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种侵占、这种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对全人类的垄断。法庭裁决的四分之三的案件都是垄断者之间的争吵——两个强盗在争夺他们的赃物。我们许多刑法也有同样的目的，其目的是使工人处于从属于雇主的地位，从而为剥削提供保障。

至于保证生产者的劳动成果，没有任何法律试图这样做。这是如此简单和自然，如此成为人类礼仪和习俗的一部分，以至于法律连想都没想过。手持利剑的公然抢劫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工人也不会来和另一个工人争夺他的劳动成果。如果他们之间有误解，他们会找第三者来解决，而不会诉诸法律。唯一向他人索要劳动所得的人是业主，因为业主会进来扣除大部分份额。至于整个人类，它无处不在地尊重每个人对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权利，而没有任何特殊法律的干预。

由于所有关于财产的法律都是厚厚的法典，都是我们律师的乐趣所在，其目的无非是保护某些垄断者对人类劳动的不公正占有，因此它们没有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可以把所有与所谓的“财产权”有关的法律、所有产权证、所有登记簿，总之，所有与这种制度有关的东西都烧掉，因为这种制度很快就会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就像过去时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一样屈辱。

刚才关于财产法的论述同样适用于第二类法律，即维护政府的法律，即宪法。

这又是一个由法律、法令、条例、议会命令等组成的完整武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各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无论是被授权的还是被篡夺的，而人类就在这些代议制政府之下挣扎。我们非常清楚，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各种形式的政府进行长期批判时经常指出，所有政府，无论是君主制政府、立宪制政府还是共和制政府，其使命都是通过武力来保护和维持拥有特权的阶层，即贵族、神职人员和商人。我们三分之一的法律——每个国家都有数以万计的法律——关于税收、消费税、部委及其办公室的组织、军队、警察、教会等的基本法律，除了维护、修补和发展行政机器之外，别无其他目的。而这台机器反过来又几乎

完全是为了保护占有阶级的特权。分析一下所有这些法律，每天观察它们的运作，你就会发现，没有一条法律是值得维护的。

关于这些法律，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激进主义者也或多或少地认为，有关政府组织的法律的唯一用途就是将其付之一炬。

第三类法律仍有待考虑，即与保护人身安全以及侦查和预防“犯罪”有关的法律。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们对它的偏见最多；因为，如果说法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那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法律对于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全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些法律是从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习俗核心发展而来的，被统治者用来使自己的统治神圣化。部落首领、城镇富户和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们的司法职能，甚至直到今天，每当谈到政府的必要性时，政府作为最高法官的职能都是暗含的。“乡村演说家认为：没有政府，人们就会互相撕咬。”伯克说：“所有政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每个被告确保十二个诚实的陪审员。”

好吧，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偏见，但现在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大胆宣布这类法律与前一类法律一样无用和有害的时候了。

首先，关于所谓的“犯罪”——对人的攻击——众所周知，这种“犯罪”的三分之二，往往多达四分之三，都是由占有他人财富的欲望煽动起来的。在私有财产不复存在的那一天，这一大类所谓的“犯罪和轻罪”就会消失。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没有法律来约束，没有惩罚来制止，总会有一些野蛮人企图夺走同胞的生命，他们会在每一次争吵中动刀，用谋杀来报复最轻微的冒犯。”每当社会的惩罚权受到质疑时，人们就会重复这句话。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事实目前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证实：惩罚的严厉程度并不会减少犯罪的数量。绞死杀人犯，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他们四分五裂，谋杀案的数量也不会减少一件。另一方面，废除死刑，谋杀案不仅不会增加一起，反而会减少。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收成好，面包便宜，天气晴朗，谋杀案直接就会减少。统计数字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犯罪数量的增减总是与粮食价格和天气状况成正比。并不是说所有的杀人犯都是因为饥饿。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当庄稼丰收、粮食价格适中、阳光明媚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就会轻松一些，痛苦也会比平时少一些，就不会产生阴郁的情绪，就不会因为琐碎的动机而把刀子插进同胞的怀里。

此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害怕惩罚从来没有阻止过一个杀人犯。因复仇或痛苦而杀害邻居的人不会考虑太多后果；很少有杀人犯不坚信他们应该逃脱起诉。

即使在我们的社会中，即使是我们今天在大城市的公共场所看到的那些悲惨的产物，当杀人犯不受惩罚的时候，谋杀案的数量也不会增加一例。极有可能的是，谋杀案的数量反而会因为目前那些在监狱里受到残暴对待的惯犯而减少。

我们不断被告知法律的益处和刑罚的有利影响，但演讲者是否曾试图在法律和刑罚的益处与这些刑罚对人类的有辱人格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只要计算一下以前在我们的街道上实施的残暴惩罚在人类心中唤起的所有邪恶激情就知道了！人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如果不是国王、法官和祭司，不是他们用法律武装起来，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把肉撕成一条条，把沸腾的沥青倒进伤口，把肢体弄脱臼，把骨头压碎，把人锯成两半，那么，又是谁溺爱和发展了甚至连猴子都不知道的残忍本能呢？只要估算一下，法官支持的“告密”，政府以协助发现“犯罪”为借口支付的“酬金”，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堕落洪流。只要走进监狱，研究一下当人被剥夺自由，与其他堕落的人关在一起，沉浸在从我们现有监狱的墙壁上渗出的罪恶和腐败中时，人会变成什么样。请记住，这些监狱越是改

革，就越是令人憎恶。我们的现代模范监狱比中世纪的地牢可恶百倍。最后，请想一想，作为法律精髓的服从观念、惩罚观念、权威有权惩罚、有权不顾我们的良知和朋友的尊重进行审判的观念、刽子手、狱卒和告密者的必要性的观念——总之，法律和权威的所有属性——在人们中间滋生了怎样的腐败、怎样的思想堕落。考虑到这一切，你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施加惩罚的法律是一种应停止存在的憎恶。

没有政治组织的民族，因此也没有我们这么堕落，他们完全明白，被称为“罪犯”的人只是不幸；补救的办法不是鞭打他、用铁链锁住他，或者把他杀死在脚手架上或监狱里，而是通过最兄弟般的关怀、基于平等的待遇、诚实人之间的生活习俗来帮助他。在下一次革命中，我们希望这一呼声能够响彻云霄：

"烧毁断头台；拆毁监狱；赶走法官、警察和告密者——地球上最不纯洁的种族；把因激情而对同伴施暴的人当作兄弟对待；最重要的是，剥夺中产阶级游手好闲的卑劣产物以诱人的色彩展示其恶行的可能性；这样就能确保我们的社会很少发生犯罪。"

犯罪的主要支撑点是懒惰、法律和权力；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政府的法律、关于刑罚和轻罪的法律；以及负责制定和实施这些法律的权力。

不再有法律，不再有法官，自由、平等和实际的人类同情心是我们能够抵制某些人反社会本能的唯一有效障碍。

《监狱及其对囚犯的道德影响》的摘要

这是1877年12月20日在巴黎向众多工人和妇女发表的演讲的编辑文本。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法国出版并广泛传播。这是它首次以英文面世。

虽然克鲁泡特金经常表达他对监狱的不公正性以及需要一种正确对待罪犯的方法的看法，但他从未如此清晰地描述过监狱系统的弊端。没有哪位作家能在如此简短的篇幅内做得如此出色。指出这些弊端并不需要一位无政府主义哲学家，除了讨论补救措施之外，他没有做出任何无政府主义思想特有的贡献。

但他的补救措施是革命性的，而他的控诉则是必要的。废除监狱，视所有罪犯为兄弟，必要时对他们应用医学和现代心理学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治疗反社会行为。他对即将到来的全面革命抱有天真的信心，预见到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废除所有监狱，然后通过合作建立互助和机会制度，这样反社会行为将不复存在。在这之前，他认为社会会自发地保护自己免受罪犯的侵害，尽管他对这一困难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该书对犯罪的分析具有启发性和彻底的现代性，而且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能取得进步。

在经济问题和国家问题之后，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反社会行为的控制。司法始终是创造权利和特权的主要手段，因为它是建立在既定权利的坚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处置反社会行为者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政府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是时候问一问判处死刑或监禁是否公正了。它是否达到了作为其目标的双重目的——防止反社会行为再次发生，以及（就监狱而言）改造罪犯？

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系到成千上万囚犯的幸福，不仅关系到丈夫和父亲在铁窗后无力帮助的悲惨妇女和儿童的命运，而且关系到人类的幸福。对一个人的每一次不公正，最终都将由全人类来承受。

我有机会结识了法国的两所监狱和俄罗斯的几所监狱，在我生命中的各种情况下，我又回到了刑罚问题的研究中。我认为我有责任公开说明监狱是什么——讲述我的观察结果和我的信念。

监狱是一所犯罪学校

人一旦坐过牢，就会再回来。这是不可避免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国刑事司法的年度报告显示，在陪审团审判的所有犯人中，有一半的人是在监狱里接受的教育；在每年因轻微犯罪而进入警察法庭的所有犯人中，有五分之二的人是在监狱里接受的教育。近一半的谋杀案受审者和四分之三的盗窃案受审者都是惯犯。至于中央监狱，从这些所谓的惩教机构释放出来的囚犯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获释后的十二个月内又被重新监禁。

另一个重要的角度是，一个人再次入狱所犯的罪行总是比他第一次入狱时更加严重。如果他以前是小偷小摸，现在则会因为一些大胆的盗窃行为而再次入狱；如果他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一些暴力行为，那么他往往会以杀人犯的身份再次入狱。所有犯罪学作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前科犯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大问题。你们知道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她下令用卡宴的热病将他们全部消灭，这种消灭从航行中就开始了。

监狱的徒劳

尽管迄今为止进行了各种改革，尽管对不同的监狱制度进行了各种试验，但结果总是一样的。一方面，违反现行法律的犯罪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无论惩罚制度如何——俄国废除了死刑，意大利也废除了死刑，而那里的谋杀案数量却依然如故。法官的残忍程度有增无减，耶稣会刑罚制度的残忍程度也在变化，但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数量却保持不变。这只是受到其他原因的影响，我很快就会提到。另一方面，无论监狱制度发生何种变化，再犯问题都不会减少。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如此；监狱扼杀了一个人最适合社会生活的所有品质。监狱使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回到监狱，在刻有“拘留所和教养所”的石墓中结束他的生命。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怎样才能改善这个刑罚系统？”没有办法。监狱是无法改善的。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改进之外，除了拆除它之外，别无他法。

我建议在每所监狱里都安排一位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先生。裴斯泰洛齐是一位伟大的瑞士教育家，他曾收留过被遗弃的儿童，并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公民。我还可以建议，用六十个裴斯泰洛齐来代替现在的看守，即退伍军人和退伍警察。但你会问，“我们到哪儿去找他们呢？”这是一个中肯的问题。这位伟大的瑞士教师

肯定会拒绝当狱警，因为从根本上说，所有监狱的原则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剥夺了人的自由。只要你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你就不会让他变得更好。你会培养出惯犯：这就是我现在要证明的。

监狱内外的罪犯

首先，没有一个囚犯承认对他们的惩罚是公正的。这原本是对我们整个司法系统的谴责。跟一个被监禁的人或一些大骗子谈谈。他会说：“小骗子在这里，大骗子却自由自在，受到公众尊重。”要知道，有一些大金融公司就是专门为了骗取穷人最后一分钱的积蓄，而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则及时退休，从这些小钱中赚取丰厚的合法收益。我们都知道这些发行股票的大公司，它们的通告谎话连篇，骗术高明。除了囚犯说得没错，我们还能回答他什么呢？

或者这个因抢劫钱柜而入狱的人会告诉你：“我只是不够聪明，仅此而已”。你又能回答什么呢？你知道在重要的地方会发生什么吗？你知道在可怕的丑闻之后，这些大盗是如何被判“无罪”的吗？你听犯人说过多少次“把我们关在这里的是大盗，我们是小贼”。当他知道在高级金融和商业领域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诈骗时，当他知道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取财富的渴望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时，谁还会对此提出异议呢？当他研究了这些由诚实的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和罪犯之间划分的大量可疑交易时，当他看到这一切时，他一定会相信，监狱是为没有技能的人而建的，而不是为罪犯而建的。这就是外面的标准。至于监狱本身的标准，无需赘言。我们很清楚它是什

么。从旧金山到堪察加，无论是在食物方面还是在恩惠分配方面，用囚犯们的话说：“最大的小偷是那些把我们关在这里的人，而不是我们自己”。

监狱劳动

每个人都知道懒惰的邪恶影响。工作能使人解脱。但是，工作有工作和工作之分。自由人的工作让他感到自己是这个巨大整体的一部分。奴隶的工作则使人堕落。囚犯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只是因为害怕受到更严重的惩罚。这种工作本身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它没有锻炼工人的任何心智能力，但报酬却很低，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惩罚。

当我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们在克莱尔沃制作胸衣或珍珠母纽扣时，十个小时的劳动可以得到12美分，其中4美分归国家所有。当他一周后拿到36美分时，他就会说：

“把我们关在这里的是小偷，不是我们。”

断绝社交关系的影响

囚犯被剥夺了与外界生活的所有联系，他又如何能够得到启发来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呢？那些规划我们监狱的人残忍至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切断囚犯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在英国，囚犯的妻子和孩子每三个月才能见他一次，而他被允许写的信却少得可怜。慈善家们有时甚至无视人性，限制囚犯除了在打印的通告上签名外，不得书写任何东西。囚犯所能受到的最好的影响，也是唯一能给他带来一线光明、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柔和的因素——与亲属的关系，却被有计划地阻止了。

在没有激情和情感的沉闷囚犯生活中，所有美好的情感都会迅速萎缩。热爱自己职业的熟练工人失去了工作的乐趣。体力慢慢消失。思想不再有持续关注的能力；思维不再那么迅速，无论如何也不再那么持久。它失去了深度。在我看来，监狱中神经能量的降低首先是由于缺乏各种印象。在普通生活中，每天有无数的声音和色彩冲击着我们的感官，无数的小事实浮现在我们的意识中，刺激着我们大脑的活动。囚犯的感官却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的印象很少，而且总是一成不变。

意志力理论

监狱中士气低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所有违反公认道德标准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缺乏坚强的意志。监狱中的大多数囚犯都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周围的诱惑或控制一时冲动激情的人。在监狱里和在修道院里一样，一切都是为了扼杀一个人的意志。他通常无法在两种行为中选择其一。他能行使意志的难得机会非常短暂。他的整个生活都被事先规定和安排好了。他只能随波逐流，服从命令，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入监狱时可能拥有的所有意志力都消失了。当他离开监狱的高墙时，到哪里去寻找力量来抵御那些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面前的诱惑呢？如果在几年的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扼杀这种内在的力量，让他成为控制者手中的温顺工具，那么又到哪里去寻找力量来抵制激情爆发的第一波冲动呢？我认为，这一事实是对以剥夺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整个刑罚制度的最可怕的谴责。

这种对个人意志的压制是所有监狱的本质所在，其根源显而易见。它源于用尽可能少的看守看管尽可能多的囚犯的愿望。监狱管理人员的理想状态是，让成千上万的自动人通过一名狱警接通的电流来起床、工作、吃饭和睡觉。这样也许可以节省预算，但我们不应该惊讶地发现，

沦为机器的人在获释后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类型。囚犯一旦被释放，他的老伙伴们就会等着他。他受到友爱的接待，并再次被曾经把他送进监狱的潮流所吞噬。保护组织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抵消监狱的邪恶影响，抵消被释放者身上的某些结果。

他的老伙伴们的接待与那些为刑满释放人员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们的接待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有谁会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并简单地对他说：“这里有房间，这里有工作，请坐到这张桌子旁，成为家庭的一员”？刑满释放者只是在寻找伸出的温暖的友谊之手。但是，社会在竭尽所能与他为敌，在给他接种了监狱的恶习之后，拒绝了他。他注定要成为一个“惯犯”。

监狱服装和纪律的影响

每个人都知道得体服装的影响力。即使是动物，如果有什么东西让它看起来滑稽可笑，它也会羞于在同伴面前露面。一只被人涂成黑黄色的猫是不敢和其他猫混在一起的。但是，人们一开始就给那些他们声称要改造的人穿上疯子的衣服。

在整个监狱生活中，囚犯受到的待遇是对其感情的最大蔑视。囚犯得不到人类应有的尊重。他是一个物体，一个数字，被当作有数字的物体对待。如果他屈从于最人性的愿望，即与战友交流，他就犯了违纪行为。在进入监狱之前，他可能不会撒谎或欺骗，但在监狱里，他将学会撒谎和欺骗，这将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而对于那些不屈服的人，这就很难了。如果被搜查是一种羞辱，如果一个人觉得食物难吃，如果他对看守人贩卖烟草表示反感，如果他与邻居分享他的面包，如果他还足够有尊严对侮辱感到恼怒，如果他足够诚实对小阴谋感到反感，那么监狱对他来说就是地狱。除非把他送进禁闭室，否则他的工作将不堪重负。稍有违纪，就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每一次惩罚都会导致另一次惩罚。迫害会把他逼疯。他可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离开监狱时不是躺在棺材里。

狱警

报纸上很容易写道，看守必须小心谨慎，狱警必须从好人中挑选。没有什么比建立行政乌托邦更容易的了。但人终究是人，既是看守，也是囚犯。当这些看守注定要在这些虚假的岗位上度过余生时，他们就会承受后果。他们变得挑剔。现在除了寺院或修道院，哪里还有这样的小阴谋精神？现在在狱警中，丑闻和小道消息如此发达。

给一个人任何权力都会使他腐化。他会滥用权力。当他的行动范围受到限制时，他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甚至会更加感受到自己的权威。被迫生活在敌营中的卫兵不可能成为仁慈的楷模。除了囚犯联盟，还有狱卒联盟。是制度使他们成为鄙陋卑鄙的迫害者。把裴斯泰洛齐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他很快就会变成狱卒。

对社会的怨恨很快进入囚犯的内心。他开始习惯于憎恨那些压迫他的人。他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和他的同志们所属的世界，另一部分则是以看守和他们的上级为代表的外部世界。囚犯们组成了一个联盟，对抗所有不穿囚服的人。这些人是他们的敌人，欺骗他们的一切手段都是正确的。

囚犯一获得自由，就会将这一准则付诸实践。入狱前，他可以不假思索地犯罪。现在他有一种哲学，可以用左拉的话来概括：“这些老实人真是无赖。”

如果我们考虑到监狱对囚犯的所有不同影响，我们会相信这些影响会使一个人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影响都没有提高囚犯的智力和道德能力，也没有引导他树立更高的人生观。监狱不会改善囚犯。此外，我们已经看到，监狱并不能防止囚犯犯下其他罪行。因此，监狱并没有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任何目的。

我们该如何处理违法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如何处置那些违法者？”我指的是不是成文的法律——它们是可悲的过去遗留下来的，而是铭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道德原则。

曾几何时，医学只是通过实验摸索出的一门用药艺术。但我们的时代已经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医学问题。现在，医学的主要目标不再是治疗疾病，而是预防疾病。卫生是所有药物中最好的。

对于这种我们仍然称之为“犯罪”，但我们的后代将称之为“社会疾病”的巨大社会现象，我们还没有采取同样的措施。预防这种疾病将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一结论已经成为现代“犯罪”问题思想家们的座右铭。在这些创新者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必要的要素，以便对那些迄今为止还被社会以懦弱的方式斩首、绞死或监禁的人采取新的立场。

犯罪原因

产生这些被称为犯罪的反社会行为有三大原因。它们分别是社会原因、生理原因和心理原因。我将从最后一类原因说起。它们不太为人所知，但其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物理原因

当看到朋友寄来的信忘记写地址时，人们会说这是个意外，是不可预见的。在人类社会，这些意外、意料之外的事件与那些可以预见的事件一样经常发生。每年寄出的无地址信件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其规律性令人吃惊。每年的数量可能略有不同，但也只是略有不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反复无常的因素，那就是心不在焉。然而，这一因素也受制于与行星运动一样严格的规律。

每年的谋杀案数量也是如此。有了往年的统计数据，任何人都可以提前准确地预测出欧洲各国在这一年中将要发生的谋杀案的大致数量。

物理原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还远未完全分析清楚。不过，众所周知，暴力行为在夏季占主导地位，而侵犯财产的行为则在冬季占主导地位。当我们研究恩里科·费里教授绘制的曲线时，观察到暴力行为曲线随着气温曲线的上升而下降时，就会对这两条曲线的相似性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明白人类是多么像一台机器。自诩有自由意志的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依赖于温度、风和雨。谁会怀疑这些影响呢？天气好、收成好的时候，村民们心情舒畅，肯定不会以刀子相向来结束他们的小争吵。如果天气不好，收成不好，村民们就会变得情绪低落，争吵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生理原因

生理原因，即那些取决于大脑结构、消化器官和神经系统的因素，当然比物理原因更重要。遗传能力和生理组织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一直是我們深入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可以对其重要性形成一个相当正确的认识。

当切萨雷·龙勃罗梭认为，我们监狱中的大多数囚犯的大脑结构都存在某种缺陷时，我们可以接受这一说法，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将死在监狱中的囚犯的大脑与死在监狱外一般恶劣生活条件下的囚犯的大脑进行比较。当龙勃罗梭证明最残忍的谋杀案是由那些有严重精神缺陷的人所为时，我们同意他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已被观察所证实。但是，当龙勃罗梭宣称社会有权对有缺陷的人采取措施时，我们拒绝听从他的意见。社会无权消灭那些大脑有病的人。我们承认，许多实施这些残暴行为的人几乎都是白痴。但并不是所有的白痴都会成为杀人犯。

在许多家庭、宫殿和疯人院中，白痴（idiot）都发现了与伦勃罗梭认为的“犯罪性精神病”特征相同的人。他们与那些被送上绞刑架的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生活的环境。脑部疾病当然会刺激谋杀倾向的发展，但这并非不可避免。一切都取决于精神病患者所处的环境。

每一个聪明人都能从积累的事实中看出，现在被当作罪犯的大多数人都患有某种疾病，因此，有必要通过最好的护理来治愈他，而不是把他们送进监狱，因为在监狱里，疾病只会加重。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有时在他的头脑中会闪过一些想法的萌芽，它们像闪电一样迅速，构成了罪恶行为的基础。我们摒弃了这些想法，但如果这些想法在我们的环境中得到了有利的回应，或者如果其他情感，如爱、怜悯和兄弟情谊，没有抵消这些闪烁的利己主义和残暴的想法，它们最终就会导致邪恶的行为。简而言之，生理原因是导致人们入狱的重要原因，但正确地说，生理原因并不是“犯罪”的原因。这些精神、脑脊髓系统等方面的影响，可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萌芽状态。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患有其中的某种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并不会导致一个人做出反社会的行为，除非外部环境让这些疾病变得病态。

社会原因

但是，如果生理原因对我们的行为有如此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生理经常成为我们所做的反社会行为的原因，那么社会原因又有多么强大。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前瞻性和智慧的头脑宣称，整个社会都要为所犯下的每一个反社会行为负责。我们的英雄和天才的荣耀行为有我们的一份；我们的刺客的行为也有我们的一份。是我们造就了他们——一个是我们，另一个也是我们。

年复一年，数以千计的孩子在我们大城市的道德和物质污浊中成长，在手足无措的生活中消沉。这些孩子不知道真正的家。他们的家今天是简陋的住所，明天就是街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像样的出路来发挥自己的青春活力。当我们看到大城市里的儿童以这种方式成长时，我们只能对他们中很少有人成为强盗和杀人犯感到惊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人类社会情感的深度，即使是最糟糕的邻里之间的热情友好。如果没有这种友善，向社会公开宣战的人会更多。如果没有这种友善，没有这种对暴力的厌恶，我们奢华的城市宫殿将寸草不生。

而在阶梯的另一端，在街头长大的孩子看到了什么？奢华、愚昧无知、精明的商店、专门展示财富的读物、崇拜金钱的邪教，培养出对财富的渴求、对以牺牲他人利益

为代价的生活的热情。他们的口号是：“致富。摧毁一切阻碍你致富的东西，不择手段，只求不坐牢。”体力劳动被鄙视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统治阶级宁愿沉迷于体操，也不愿使用铲子或锯子。长满老茧的手被认为是自卑的象征，而丝绸衣服则被认为是优越的象征。

社会本身每天都在制造这些人，他们没有能力过诚实劳动的生活，充满了反社会的欲望。当他们的罪行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时，社会就会美化他们。当他们没有“成功”时，社会就把他们送进监狱。当社会革命彻底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不再有游手好闲者，当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当每个孩子在学习和灵魂得到正常发展的同时学会用双手劳动时，我们将不再需要监狱、刽子手或法官。

人是其成长和生活环境的产物。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习惯于工作，习惯于被视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习惯于明白他不能伤害任何人，否则他自己也会受到影响，那么他就很少会违反道德法则。

今天，三分之二被定为犯罪的行为是侵犯财产的行为。它们将随着私有财产的消失而消失。至于对人的暴力行为，它们已经随着社会意识的增长而减少，当我们抨击其原因而不是其结果时，它们也将消失。

如何治愈罪犯？

在此之前，律师们所珍视的刑罚制度是《圣经》中的复仇思想、中世纪对魔鬼的信仰、现代律师的恐吓思想以及通过惩罚预防犯罪的思想之间的妥协。

必须建造的不是疯人院，而是监狱。我从未想过这种可恶的想法。疯人院永远是监狱。慈善家们不时提出的把监狱留给医生和教师的想法也与我相去甚远。今天，囚犯们在社会上没有找到的是一双简单而友好的援助之手，这只手能帮助他们从小就发展思想和灵魂的高级能力；这些能力的自然发展或因生理缺陷，或因社会本身为千百万人创造的邪恶的社会条件而受到阻碍，但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如果他从未有过行动的选择权，他的思想和心灵的这些高级能力就无法得到发挥。医生监狱、疯人院比我们现在的监狱要糟糕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自由是唯一可以用来纠正那些导致所谓犯罪的人类机体疾病的方法。

当然，在每个社会中，无论组织多么完善，都会有一些人的激情容易被激发，他们可能会不时地做出反社会的行为。但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给他们的激情一个健康的方向，另一个出口。

今天，我们的生活过于孤立。私有财产使我们在所有相互关系中都陷入了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我们只是略微了解彼此，我们的接触点太少。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生活的例子，例如中国的“复合家庭”和农业公社。这些人真正了解彼此。迫于形势，他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互相帮助。

以原初社区为基础的家庭生活已经消失。一个以愿望共同体为基础的新家庭将取而代之。在这个家庭中，人们必须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并在任何场合都相互依靠，以获得精神支持。这种相互支持将防止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反社会行为。

然而，有人会说，总会有一些人——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病人。难道不需要以某种方式摆脱他们，或至少防止他们伤害他人吗？

任何社会，无论多么缺乏智慧，都不需要这样荒谬的解决方案，原因就在于此。以前，精神病人被视为恶魔附身，并受到相应的对待。他们被锁在马厩一样的地方，像野兽一样被铆钉固定在墙上。但大革命时期的皮涅尔出现了，他敢于解开他们的枷锁，并试着把他们当作兄弟来对待。“你们会被它们吃掉的，”看守们喊道。但皮涅尔敢。那些被认为是野兽的人聚集在皮涅尔身边，用他们的

态度证明，皮涅尔相信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正确的，即使被疾病蒙蔽了智慧。于是，事业取得了胜利。他们不再用铁链锁住疯子。

后来，比利时小村庄Gheel的农民发现了更好的办法。他们说：“把你们的疯子送过来，我们会给他们绝对的自由。”他们收养了这些人，让他们在自己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让他们有机会和自己一起耕种田地，让他们在乡村舞会的年轻人中占有一席之地。“和我们一起吃喝玩乐工作，在田间奔跑，自由自在。”这就是制度，这就是比利时农民所拥有的一切科学。（我说的是早期的情况。如今，在盖尔（Gheel）治疗精神病人已成为一种职业，而这种职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还有什么意义呢？）自由创造了奇迹。精神病人痊愈了。即使是那些患有无法治愈的器质性病变的人，也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成为家庭中可爱、温顺的一员。病态的大脑总是以不正常的方式工作，但心灵却在正确的地方。他们哭着说这是一个奇迹。治愈的原因是一位圣人和一位处女。但处女是自由，圣人是田间劳作和博爱。

在莫兹利所说的“精神疾病与犯罪之间的巨大空间”的一个极端，自由和兄弟般的待遇创造了奇迹。在另一个极端，它们也将创造同样的奇迹。

总结

监狱并不能阻止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它只会增加反社会行为的数量。监狱并不能改善那些进入监狱的人。无论如何改革，监狱始终是一个限制场所，一个像修道院一样的人造环境，它将使囚犯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活。它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使社会堕落。它必须消失。它是野蛮与耶稣会慈善的混合体。

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废除监狱——人类虚伪和懦弱的纪念碑。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在一个自由的民族中间，在所有人都接受了健康的教育并养成了互相帮助的习惯之后，反社会行为将不再可怕。更多的反社会行为将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其他行为将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至于革命后现存社会将传给我们的那些具有邪恶倾向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防止他们行使这些倾向。社会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共同打击这些侵略者，已经相当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取得成功，那么唯一切实可行的纠正办法仍然是兄弟般的对待和道义上的支持。

这不是乌托邦。个别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这将成为普遍做法。这种手段在保护社会免受反社会行为侵害方面，要比现有的惩罚制度强大得多，因为现有的惩罚制度

是新犯罪的温床。

《革命政府》的摘要

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反动报》上的文章改编而成的，大约写于1880年，当时克鲁泡特金正在猛烈抨击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实现革命变革的两种主要手段——投票和武力独裁。他认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倡导的议会制政府在实现革命目标方面是徒劳无益的，就像现在共产党人倡导的武力独裁一样。

这篇简短的论述试图通过历史实例说明，不可能性建立任何政府都要符合革命原则的利益，即把权力和财产移交给人民群众。他说，只有人民大众在自己的自由社团中开展集体工作，才能实现和维持真正的革命。

议会

目前存在的政府应该被废除，这样自由、平等和博爱就不再是空话，而应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所有已经尝试过的政府形式都不过是压迫的多种形式，应该被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得出这一结论并不需要有多大的创新精神。当今各国政府的弊端以及改革它们的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有理智的观察者都无法将其掩盖起来。至于推翻政府，众所周知，在某些时代，推翻政府并不困难。有些时候，政府几乎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在人民的反抗声中轰然倒塌。

对革命的中产阶级来说，推翻政府就是一切；而对我们来说，这只是社会革命的开始。国家机器一旦瘫痪，官僚阶层一盘散沙，不知何去何从，士兵们对自己的军官失去信心。总之，资本捍卫者的整支军队一旦被击溃，我们就将开始摧毁所有使经济和政治奴役永久化的机构的伟大事业。有了自由行动的可能性，革命者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无政府主义者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没有政府！”其他人都说：“革命政府！”他们的分歧只在于政府的形式。一些人决定在国家或公社中建立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政府；另一些人则决定实行革命专政。

革命政府！对于那些真正理解社会革命和政府含义的人来说，这两个词听起来非常奇怪。这两个词相互矛盾，相互摧毁。我们当然见过许多专制政府——所有政府的本质都是站在反动派一边反对革命，都有专制的倾向。但革命政府这样的东西却从未见过，原因在于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既定的财产形式、摧毁种姓制度、迅速改变人们所接受的道德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是对政府的否定，是“既定秩序”、保守主义、维护现有制度、否定自由首创精神和个人行动的代名词。然而，我们不断听到有人谈论这只白色的乌鸦，仿佛“革命政府”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就像皇室、帝国和教皇一样普通，为所有人所熟知！

所谓的中产阶级革命家宣扬这种思想并不奇怪。我们很清楚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所理解的革命是加强他们的共和政体，让所谓的共和党人占据今天专属于保皇党人的有利可图的职位。它最多意味着政教分离，取而代之的是政教合一，将教士的货物财产收归国有，首先是为了这些货物财产的未来管理者。也许这意味着全民公决或其他政治机制。但是，革命社会主义者把自己当作这种思想的使徒，这只能用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来解释。要么是他们从文学作品中，尤其是从为迎合中产阶级思想而编写的历史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偏见的熏陶；要么是他们并不真正

渴望这场他们一直挂在嘴边的革命。他们只满足于对现有体制进行简单的修补，只要他们能为自己确保权力，而让未来来决定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满足被称为“人民”的“野兽”。他们只是为了取而代之而与当代的统治者作对。我们不想与这些人争论。因此，我们只与那些真诚地自欺欺人的人交谈。

让我们从所倡导的《革命政府》的第一种形式——民选政府开始。

我们假设王权刚刚被推翻，资本捍卫者的军队被击溃；到处都在发酵，到处都在讨论公共事务，到处都在渴望前进。新的思想出现了，人们意识到了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必须采取行动，必须毫不怜悯地开始拆除工作，以便为新生活做好准备。但他们建议我们做什么呢？召集人民进行选举，立即选出一个政府，并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承担的工作交给它。

这就是巴黎在1871年3月18日之后所做的事情。“一位朋友对我们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愉快的解脱时刻。我从拉丁区的上层房间下来，加入了那个巨大的露天俱乐部，从巴黎的一端到另一端，林荫大道上到处都是这个俱乐部的身影。每个人都在谈论公共事务；所有的个人琐事都被抛诸脑后；不再考虑买卖；所有人都感到身心俱疲，准备向未来迈进。即使是中产阶级，也被这股热情

所感染，欣喜地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说：‘如果有必要进行社会革命，那就革命吧！’他们又说：‘如果有必要进行社会革命，那就革命吧！把所有东西都集中起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革命的所有要素都在那里，只需要让它们开始工作。当我晚上回到住处时，我对自己说：‘人性终究是多么美好啊！但没有人知道它，它一直被人诽谤。’接着是选举，公社成员被任命，然后，奉献的热情和行动的渴望一点一点地熄灭了。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对自己说：‘现在我们有一个诚实的政府，让它为我们行动吧。’”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

人民没有为自己采取行动，没有勇往直前，没有朝着事物的方向前进，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了他们的长官。这是选举的必然结果的第一个后果。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得到了所有人信任的州长们都做了什么。

从未有过比1871年3月的选举更自由的选举。公社的反对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广大选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让最优秀的人、未来的人、真正的革命者掌权。他们做到了。所有著名的革命家都以巨大的多数票当选；雅各宾派、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所有三个革命派都在公社委员会中有代表。任何选举都不可能产生一个更好的政府。

但结果如何呢？这些热血沸腾的革命者、改革者被关在市政厅里，被要求按照以往政府制定的形式行事，他们发现自己能力不足，毫无生气。尽管他们有良好的意愿和勇气，但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组织巴黎保卫战。当然，人们现在把责任归咎于人，归咎于个人；但造成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事实上，普选权在相当自由的情况下，充其量只能产生一个代表当时人民大众所持意见平均值的议会。而这个平均值在革命爆发时对要完成的工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去做。啊，如果全国人民和公社的大多数人能够在运动之前就明白，一旦政府被推翻，需要做什么！如果椅子上的乌托邦者的这个梦想能够实现，我们就不会有血腥的革命了。大部分国民的意愿一旦表达出来，其他人就会欣然顺从。但事情并非如此。革命早在达成普遍共识之前就爆发了，而那些对第二天应该做什么有清晰认识的人只是极少数。广大人民还只是对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却不知道如何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对前进的方向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有在变革开始之后，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才能明确变革的方向。它将是革命本身的产物，是人民行动的产物，否则它将一事无成，因为少数人的大脑绝对无法找到只有从人民生活中才能找到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普选产生的机构所反映的情况，即使它没有一般代议制政府所固有的恶习。代表时代革命思想的少数人被淹没在过去的革命流派和现有秩序之中。这些人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播撒他们的思想，让群众运动起来，摧毁过去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但他们却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大厅里，徒劳地讨论如何从温和派那里夺取让步，如何转化他们的敌人，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们接受新思想——那就是把它付诸实施。政府变成了一个具有中产阶级议会所有恶习的议会。它远非一个“革命”政府，而是革命的最大障碍，最后，人民发现自己不得不把它赶走，把那些昨天还被他们认为是他们的选民的人赶走。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新政府匆忙组织新的行政机构，以扩大其统治范围并使自己得到服从，它不会轻易放弃。它妒忌自己的权力还在，就像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衰老的机构一样，以全部精力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它决定以武力对抗武力，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将其赶下台，那就是拿起武器，发动另一场革命，将人民寄予厚望的那些人赶下台。

在这里，你看到的是革命的自我分裂！在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之后，它现在又在新政府的朋友和那些认为必须解散新政府的人之间的内讧中失去了力量。而这一切的发

生，都是因为人们不明白，新的生活需要新的形式；革命不是靠固守古老的形式就能实现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们不了解革命与政府的不相容性，不了解革命与政府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对另一种形式的否定，在革命之外不存在革命。

对于经常被赞颂的另一种“革命政府”形式——革命专政，情况也是如此。

独裁统治

当革命允许自己被民选政府控制时，它所面临的危险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整个革命者流派都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他们明白，起义中的人民不可能通过选举给自己一个政府，而只能是一个代表过去的政府，它必须像铅鞋一样穿在人民的脚上，尤其是当需要完成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巨大复兴时。因此，他们放弃了“合法”政府的想法，至少在那个反抗合法性的时期，他们主张“革命专政”。

“他们说：‘推翻政府的政党当然会取而代之。它将夺取政权，以革命的方式前进。它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叛乱成功。它将摧毁旧体制，组织保卫国家。至于那些不承认它的权威的人，如果他们拒绝服从革命前进所必需的命令，那么无论他们属于人民还是中产阶级，断头台都会解决他们。断头台仍在运转？看看这些初出茅庐的罗伯斯庇尔们是如何争辩的，他们对这个世纪的宏伟史诗一无所知，只知道它的衰落期，他们除了从共和国的刽子手们的演说中了解到一些东西之外，从未了解过它。’”

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个人专政或政党专政（根本就是一回事）最终都会受到谴责。我们知道，革命和政府是不相容的。无论政府的名称是什么，是独裁、王权还

是议会，其中一个必须摧毁另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党的力量和真理就蕴含在这个公式中——“除了人民的自由首创精神，没有什么好事或持久的事情能够办成，而每一个政府都倾向于摧毁它”。因此，如果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成为政府这台强大机器的主人，如果他们的思想在付诸实施之前没有经过民众思想的锤炼，那么他们在一周之内就会变成只适合被送上绞刑架的人。我们知道，每一种独裁统治，哪怕是最善意的独裁统治，都会走向何方——那就是一切革命运动的死亡。我们还知道，这种独裁思想从来都不过是政府拜物教的病态产物，它和宗教拜物教一样，总是使奴役永久化。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的对象是那些政府革命党人，他们被自己所受教育的偏见引入歧途，真诚地自欺欺人，只想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与他们对话。

首先，我想谈一个普遍的看法：那些鼓吹独裁的人一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坚持这种偏见的时候，只会为那些日后会割断他们喉咙的人铺平道路。不过，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最好记住他的一句话。他在原则上并不否认独裁；但“好好考虑一下吧，”当曼达尔对他谈到独裁时，他突然回答说，“布里索将是独裁者！”是的，布里索，这个狡猾的吉伦特派成员，人民平等倾向的死敌，财产的

狂热捍卫者（尽管他曾经称之为盗窃），布里索，他会冷静地把希贝尔、马拉和所有温和派雅各宾派人送进修道院监狱！

现在这是1792年说的！当时，法国已经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事实上，王权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在等待死亡的降临。封建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然而，即使在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最有机会成为独裁者的仍然是反革命分子布里索！那么，在1789年之前会是谁呢？米拉波是公认政府首脑！如果不是起义人民在长矛的支持下强加自己的主权，如果不是雅克里（Jacquerie）的既成事实使巴黎或各省的每一个政府都变得虚幻，这个人就是那个与国王讨价还价、出卖自己口才的人，这个人就是那个在这个时候被推上权力宝座的人。

但是，政府的偏见如此彻底地蒙蔽了那些谈论专政的人，以至于他们宁愿要一个新的布里索或拿破仑的专政，也不愿放弃为那些正在挣脱奴役枷锁的人们提供另一个主人的想法！

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利普时期的秘密组织有力地维护了这种独裁偏见。当时的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工人的帮助下，策划了一长串阴谋，目的是推翻王权，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不了解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前必须在法国实现的深刻变革，他们幻想着通过一场巨大的阴谋，有朝一日能够

推翻皇室，掌握权力，宣布成立共和国。三十多年来，这些秘密组织从未停止过无限的奉献和英雄般的勇气与毅力。如果说1848年的叛乱导致了共和国的诞生，那么这要归功于这些秘密团体，归功于他们三十年来用行动进行的宣传。没有他们的崇高努力，共和国是不可能成立的。

他们的目的是自己掌握权力，建立共和国独裁政权。但他们当然没有成功。从事情的本质来看，阴谋永远不可能颠覆王权。实际上，阴谋家们已经为王权的覆灭做好了准备。他们广泛传播了共和思想；他们的殉道者使共和成为人民的理想。但是，最终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国王的努力要比来自秘密组织的任何努力都要伟大和强大得多；它来自人民群众。

结果众所周知。为皇权倒台铺平道路的政党被推下了政府大厦的台阶。另一些人则过于谨慎，不敢冒阴谋的风险，但他们更有名气，也更温和，一直在等待把握掌权的机会，取代了阴谋家们希望用刺刀征服的位置。记者、律师、善于言辞的人，当真正的共和党人在监狱里伪造武器或过期作废时，他们却努力为自己扬名立万，从而掌握了权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名声在外，受到了人民的赞誉；另一些人则奋勇向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名字只不过代表了与所有人达成一致的方案。

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行动党缺乏务实精神，而其他人今后会做得更好，这是没有用的。不，千真万确！行动党必须被抛弃，阴谋家和空谈家必须攫取权力，这是一条像支配星体运行一样永恒不变的规律。他们总是更为做出最后努力的广大群众所熟知。他们得到更多的选票，因为不管有没有选票，不管是以鼓掌方式还是以投票箱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最根本的总是一种以鼓掌方式进行的默许选举。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许，尤其是革命的敌人的赞许，因为他们更喜欢推举无名小卒，这样，那些真正与运动为敌或对运动漠不关心的人就以鼓掌方式被接受为统治者。

他是这个阴谋体系的化身，他在狱中度过了一生，为他对这个体系的献身付出了代价。他在临死前说出了这些话，这些话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纲领——“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主人！”

革命政府的无能

想象一个秘密团体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而这个秘密团体又可以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错误。自1820年以来在共和主义中产阶级怀抱中诞生的所有革命组织都陷入了这个错误。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了这是一个怎样的错误。青年意大利党的共和派秘密组织没有表现出何等的献身精神、何等的无私奉献、何等的坚忍不拔！然而，所有这些巨大的工作，所有这些意大利青年所做出的牺牲，甚至连俄国革命青年的牺牲在他们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所有这些尸体堆积在奥地利要塞的碉堡里，堆积在刽子手的刀枪下——所有这一切只是让狡猾的、强盗般的中产阶级和皇室掌权！

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因为能够给政府致命一击的不是秘密社团，甚至也不是革命组织。他们的职能、他们的历史使命是让人们为革命做好思想准备，然后当人们的思想准备好了，外部环境也有利了，最后的冲锋就不是由发起运动的团体，而是由完全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人民大众发起的。8月31日，巴黎对布朗基的呼吁充耳不闻。四天后，他宣布政府垮台；但此时布朗基分子已不再是运动的发起者。是人民，是数百万人推翻了十二月党人的统治，宣布了那些两年来一直在他们耳边回响的虚

伪的名字。当一场革命蓄势待发时，当运动已经蔚然成风时，当运动的成功已经板上钉钉时，成千上万从未被组织直接影响过的新人，就会像战场上的猛禽一样，前来加入运动，以牺牲者为食。这些人帮助进行最后的努力，但他们不是在真诚的、不可调和的阴谋家队伍中，而是在围观者中寻找他们的领袖。那些仍然抱有独裁统治偏见的阴谋家们，会不自觉地努力让自己的敌人上台。

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对于政治革命或者说对于革命的爆发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我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来说，就更加正确了。允许建立任何政府，一个强大的、公认的政权，都会使革命工作立即陷入瘫痪。这个政府将带来的好处是零，而坏处则是巨大的。

我们如何理解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更换统治者。它是人民对所有社会财富的占有。它是废除长期以来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力量。但是，这场巨大的经济革命是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来实现的吗？在上个世纪，我们看到波兰革命独裁者柯斯丘什科颁布了废除个人奴役的法令，但在这一法令颁布后的八十年里，奴役依然存在。我们看到公约，这个无所不能的公约，这个被其崇拜者称为可怕的公约，颁布了按人头平均分配从贵族手中夺回的所有公有土地的法令。和其他许多法令一样，这项法令仍然是一纸空文，因为要执行这项法令，农村地区的无产者就必须进行一场全

新的革命，而革命不是靠法令的力量来实现的。要使占有社会财富成为既定事实，人民就必须放开手脚，摆脱他们习以为常的奴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不等任何人的命令，勇往直前。而这正是独裁政权所要阻止的，无论它的初衷是多么美好，它都无法丝毫推进革命的进程。

但是，如果政府——即使是理想的革命政府——在我们必须完成的破坏工作中不能创造新的力量，也没有任何用处，那么在破坏之后必须进行的重组工作中，我们就更不能指望它了。社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革将是如此巨大和深刻，它必须如此改变今天以财产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关系，以至于一个人或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阐述未来社会必须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只能依靠群众的集体努力。为了满足私有财产一旦被废除就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需求，必须有全体人民的集体智慧。任何外在的权威都只会成为障碍，而且还会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根源。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放弃革命政府的幻想的时候了，这种幻想常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常常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现在是彻底承认“政府不可能是革命的”这一政治公理的时候了。人们都在谈论国民大会，但我们不要忘记，国民大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尽管没有什么革命性，却只是当时践踏一切政府的人民所完成的行动的认可。正如维

克多·雨果所说，丹东推动着罗伯斯庇尔前进，马拉注视着并推动着丹东前进，而马拉本人则被西穆尔丹——狂热分子和反叛者俱乐部的化身——推动着前进。与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政府一样，公约只是人民行动的拖累。

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在这方面是如此确凿无疑，革命政府的不可能性和被冠以这一名称的政府的有害影响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似乎很难解释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某一学派坚持政府思想的决心的原因。但解释起来非常简单。那就是，社会主义者虽然自称是这一学派的追随者，但他们对我们必须完成的革命却有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观念。对他们来说，就像对所有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一样，社会革命毋宁说是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必多想。他们在内心深处所梦想的，尽管他们不敢承认，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就是建立一个像瑞士或美国那样的政府，对他们所谓的“公共服务”进行一些有利于国家的征用。这是俾斯麦理想的产物。这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愿望和中产阶级的愿望之间事先达成的妥协。他们确实希望彻底没收，但他们没有勇气尝试；因此，他们将其推迟到下个世纪，并在战斗之前与敌人进行谈判。

《俄罗斯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摘要

克鲁泡特金对苏维埃政府在俄国革命问题上的态度，只在给朋友的信和两份公开声明中有所表露，这里略去不重要的部分予以刊印。《致西欧工人的信》写于1919年初，寄给了丹麦伟大的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德斯，当时军事共产主义仍在实行，其中部分内容涉及的是本质上仍未改变的方面。这封信是为1920年英国劳工代表团撰写的，并被收录在他们的报告中。

1921年他去世前几个月的备忘录对革命的论述要笼统得多。该备忘录尚未完成，不应被视为他对《怎么办？》这是为了回应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再向他提出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应该做些什么的呼吁而写的。

致西欧工人的信

俄国，德米特罗夫，1919年4月28日。

有人问我，难道我没有给西方世界的工人以信息吗？

当然，关于俄国发生的实际事件，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东西要学。由于要涵盖所有内容，信息必须很长，所以我将只指出要点。

首先，文明世界的工人及其他阶级的朋友应该说服本国政府完全放弃武装干涉俄国的想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俄国现在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其程度和重要性与英国在1639年至48年、法国在1789年至94年所经历的革命相同。每个国家都应拒绝扮演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的可耻角色。

此外，必须牢记的是，俄国革命——它试图建立一个所有生产劳动、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都将完全公有的社会——并不仅仅是竞争各方斗争中的偶然事件。自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时代以来，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为这场革命做好了准备。虽然通过政党专政来推行新社会制度的努力显然注定要失败，但我们必须承认，革命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引入了关于劳动权利、劳动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以及每个公民的义务的新理念，而且这些新理念将经久不衰。

不仅是工人，文明世界的所有进步力量都应该结束迄今为止对革命敌人的支持。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方法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远非如此！但是，一切外国武装干涉都必然会加强政府的独裁倾向，并瘫痪那些准备独立于政府之外帮助俄国恢复生机的俄国人的努力。

政党独裁所固有的弊端由于该党维持其权力的战争状态而更加突出。战争状态成了加强独裁手段的借口，这种独裁手段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集中在政府手中进行控制，从而使国家的大部分正常活动陷于停顿。在“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外国干涉造成的”这一借口下，国家共产主义的自然弊端被扩大了十倍。

我还应该指出，如果盟军继续进行军事干预，必然会在俄罗斯形成一种对西方国家的怨恨情绪，这种情绪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冲突中被利用。这种怨恨情绪一直在发展中。

总之，现在是欧洲各国与俄罗斯民族建立直接关系的时候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应该有话要说。

就一般问题再说几句。欧美各国与俄罗斯重建关系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民族凌驾于构成沙皇帝国的各民族之上。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已经死亡，不会复兴。这些不同省份的未来在于一个伟大的联邦。熟悉俄罗斯历史和民族学的人

都知道，这个联邦各部分的自然领土是截然不同的。将俄罗斯帝国自然分开的各个部分统一在一个中央控制之下的所有努力都注定要失败。因此，西方国家应当承认旧俄罗斯帝国各部分的独立权。

我认为，这种发展将继续下去。我认为，这个联邦的每一部分都将成为农村公社和自由城市的联邦。我也相信，西欧的某些地区不久也会走同样的道路。

至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俄国革命是英国和法国伟大革命的延续，它正试图达到法国革命在成功创造所谓的“事实上的平等”，即经济平等之前所停止的地步。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是在俄罗斯强烈集权的党专政下进行的。这种努力与巴博夫的极端集权和雅各宾努力如出一辙。我有责任坦率地告诉你们，在我看来，这种在党专政铁律下的高度集权国家共产主义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努力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在俄国，我们正在学习如何不推行共产主义，即使人民已经厌倦了旧政权，对新统治者的试验也不积极抵抗。

苏维埃，即工人和农民代表会议，是在1905年革命尝试时首先提出的设想。直接在1917年2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立即实现了这一设想。这种代表会议控制国家经济和

政治生活的设想是一个伟大的设想。更重要的是，这些委员会必须由所有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国家财富生产的人组成。

但是，只要国家由党派专政统治，工农委员会显然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它们沦为了以前“国家总会”所扮演的被动角色，当时它们是由国王召集的，必须与无所不能的御前会议对抗。

当新闻自由不复存在时，工人委员会就不再是自由的，也不再有任何作用，而我们两年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借口是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但还有更多。如果在选举之前没有进行自由的竞选活动，如果选举是在政党专政的压力下进行的，工农委员会就失去了意义。当然，通常的借口是，为了打击旧政权，独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状况显然是一种倒退，因为革命致力于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设新社会。这意味着新制度的丧钟已经敲响。

推翻已经衰弱的政府的方法，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很清楚。但是，当需要创造新的生活形式，特别是新的生产和交换形式，而又没有可以模仿的榜样时；当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时；当一个政府承诺为每个公民提供一盏灯，甚至连点灯的火柴都要提供时，即使有再多的官员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时，这个政府就成了一个麻烦。它发展出的官僚机构如此可怕，以至于法国的官僚机构需要40名官员的帮助

才能卖掉国道上一棵被暴风雨刮倒的树，与之相比，法国的官僚机构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就是我们在俄国学到的东西。这也是你们西方工人应该千方百计避免的，因为你们的核心是真正的社会重建取得成功。派你们的代表到这里来，看看社会革命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

社会革命所要求的巨大的建设性工作不可能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完成，即使它有比几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手册更重要的东西来指导它。它需要知识，需要头脑，需要一大批地方和专门力量的自愿合作，只有这些力量才能从地方的角度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拒绝这种合作，把一切交给党的独裁者的天才，就是要摧毁我们生活的独立中心——工会和地方合作组织，把它们变成党的官僚机构，就像现在这样。这样就无法完成革命，使革命无法实现。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你们，不要借用任何这样的方法……

战争后期为整个文明世界带来了新的生活条件。社会主义必将取得长足进步，在地方自治和自由首创精神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独立的新生活形式。它们将以和平或革命的方式产生。

但是，重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不同民族之间直接合作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直接团结各国的工人阶级，重新拾起建立一个由全世界工人组成的伟

大国际的想法，但不是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那样，采取由一个政党领导的联盟的形式。当然，这样的联盟有充分的理由存在，但在它们之外，应该有一个世界所有工人组织的联盟，联合起来使世界生产摆脱目前对资本主义的屈从。

怎么办？

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一种自然现象的总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类似于东亚沿海突然刮起的台风。

数以千计的原因，其中单独的个人甚至政党的工作只是一粒沙子，一个微小的地方旋风，都促成了巨大的自然现象，巨大的灾难，要么更新，要么毁灭；或许既毁灭又更新。

我们所有人都为这场不可避免的伟大变革做好了准备。但是，1793年、1848年至1871年的历次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所有著作，科学、工业、艺术等方面的所有成就，也为这场变革做好了准备。总之，数以百万计的自然原因做出了贡献，就像数以百万计的空气或水的微粒运动导致了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成百上千的船只沉没或成千上万的房屋被毁一样，就像地震中地球的颤抖是由数以千计的微小震动和独立微粒的预备运动造成的一样。

一般来说，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并不具体、扎实。他们更多的是用语言来思考，而不是用清晰的想象来描绘，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不知道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原因赋予了革命现在的形式，因此，他们倾向于夸大他们的个性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夸大他们、他们的朋友和共同思考者在这场巨大的动荡中将采取的态度的重要性。当然，他

们也绝对无法理解，在这场动荡所引发的成千上万种力量的漩涡中，任何个人，无论其智慧和经验如何，都是多么无能为力。

他们不明白，一旦发生地震，或者说台风这样巨大的自然现象，单独的个人是无力对事件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的。一个群体或许可以做些什么——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小得多——在即将到来的波浪表面，它的影响或许会非常明显。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群体的单独的小团体无疑是无能为力的，它们的力量肯定是零。...

我，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处在这个境地。但目前在俄国，即使是人数多得多的政党也处在一个非常相似的境地。

更有甚者，执政党本身也是如此。它不再是执政党，而是被自己一手造成的潮流带着走，而这股潮流现在已经比执政党本身强大千百倍。...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完全不是沿着我们为之准备的道路前进的，而是我们没有时间为之做好充分准备的。现在该怎么办？

阻止革命？荒谬

太迟了。革命将以自己的方式，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丝毫不会理会我们的努力。

目前，俄国革命处于如下境地：它正在制造恐怖；它正在毁灭整个国家；它在疯狂地毁灭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和平进步的原因，因为它在破坏，却不知道破坏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要破坏到哪里去。

目前，我们还无力将它引导到另一个渠道，直到它发挥完自己的作用。它必须自我消磨。

然后呢？然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反应。这就是历史的规律，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人们幻想我们可以改变革命的发展形式。这是幼稚的幻想。革命是一种力量，它的发展是无法改变的。而反动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就像每一次浪潮过后，水中的凹陷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狂热活动后，虚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能量来减轻即将到来的反作用力的狂暴和力量。

但是，我们的努力能包括什么呢？

改变一方和另一方的激情？谁会听我们的？即使有这样的外交家可以在各方面有所作为，但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还没有到；无论是一方还是另一方，都还不愿意听他们的意见。我只看到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能够在革命失败后在每一个政党中从事建设性工作的人聚集起来。

《呼吁年轻人》的摘要

这篇呼吁上层社会青年男女加入工人革命事业的文章是克鲁泡特金的“社论”中最著名、读者最多的一篇。这篇社论最早发表在1880年的《起义报》上，很快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后来被收入《起义者的颂歌》一书中。

它专门针对职业青年男女——律师、医生、教师、科学家——敦促他们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技术训练为工人服务，放弃个人利益的生活。克鲁泡特金描绘了在更广阔的同志生活和欢乐中以及在创造性表达能力的增长中得到的补偿。

它很好地激发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尽管像所有此类呼吁一样，它在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实践方面是薄弱的。克鲁泡特金在俄国的亲身经历，以及支持革命事业的学生和职业男女的“到人民中去”运动，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它的动力。

我想说的是年轻人。让年长者——当然是指心灵和思想上的年长者——来读这本书吧，不要让他们眼睛疲于阅读那些对他们来说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假定你们大约十八、二十岁，已经完成了学徒生涯或学业，刚刚步入人生的殿堂。我想，你们的头脑中应该没有老师强加给你们的迷信；你们不惧怕魔鬼，也不去听

牧师和神父咆哮。更重要的是，你不是那些纨绔子弟，不是社会衰败的悲哀产物，他们在公园里展示他们剪裁得体的裤子和猴子脸，甚至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也只是贪得无厌地渴望着不惜任何代价的享乐……恰恰相反，我认为你有一颗温暖的心，因此我才与你交谈。

我知道，你会想到第一个问题。你们经常问自己——“我将来要做什么？”事实上，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在学习了几年的是一门手艺或一门科学之后——这是以社会为代价的——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利用他所学到的知识作为掠夺自己利益的工具，他一定是真的堕落了，完全被恶习所玷污了，他没有梦想过有一天他会运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知识来帮助那些今天在苦难和无知中卑躬屈膝的人获得权利。

你也有这样的梦想，不是吗？很好，让我们来看看你必须做些什么来实现你的梦想。

我不知道你出生在什么阶层。也许，在命运的眷顾下，你将注意力转向了科学研究；你将成为一名医生、一名律师、一名文学家或一名科学工作者。你的面前是一片广阔的天地。你带着广博的知识和训练有素的智慧进入生活。另一方面，你可能只是一个工匠，对科学的了解仅限于在学校学到的一点知识。但你有优势，可以亲身体会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人是多么辛苦地工作。

致“知识分子”

你能做些什么

你终于阻止了我！“什么鬼东西！”你说。“但是，如果抽象科学是一种奢侈，医学实践只是一种滑稽；如果法律意味着不公正，而机械发明不过是抢劫的手段；如果学校与‘实践者’的智慧相悖，就一定会被克服，而没有革命思想的艺术只能堕落，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是一项艰巨而令人着迷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你的行动将与你的良知完全一致，这项工作能够激发你最崇高、最旺盛的天性。

什么工作？现在我来告诉你。

你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永远泯灭自己的良知，终有一天会说：“只要我还在尽情享乐，只要人们还傻傻地让我这样做，人类就可以去见魔鬼”。否则，你就会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与他们一起为彻底改造社会而努力。这就是我们所作分析的必然结果。这是每一个聪明人都必须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要他公正地判断他所看到的周围事物，不理睬他所受的中产阶级教育和他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观点给他提出的诡辩。

得出这一结论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离开你们所处的环境，离开习惯于把工人说成是一群畜生的环境；到人民中间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你们会发现，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无论在意大利还是美国，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特权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就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一劳永逸地摧毁资本家强加给他们的奴役，为建立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新社会奠定基础。人民再也不能用十八世纪农奴所唱的那些旋律令人心碎的歌曲来表达他们的苦难了。今天，他在工作中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尽管他的权利受到了种种阻碍。他一直在思考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生活不再仅仅是对人类四分之三的人的诅咒，而是成为所有人的祝福。他攻克了社会学中最棘手的问题，并努力用他的常识、观察力和悲惨的经历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与不幸的同胞达成共识，他试图组成团体，组织起来。他组建社团，靠微薄的捐助艰难地维持着。他试图与边疆以外的同胞达成协议。他比所有大嘴巴的慈善家做得更多，以加速国家间战争不可能发生的那一天的到来。为了了解他的兄弟们在做什么，为了增进与他们的了解，为了阐述和传播他的思想，他不惜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持他的工人阶级报刊。这是一场多么无休止的斗争！多

么艰苦的劳动啊，需要不断地重新开始。有时是为了填补因开小差而造成的空白——开小差是倦怠、腐败和迫害的结果；有时是为了重组被炮火和葡萄弹击中的队伍；有时是为了恢复因大屠杀而突然中断的学习。

这些报纸是由那些不得不废寝忘食地从社会中攫取知识碎片的人撰写的。工人们从生活必需品中省吃俭用，用一分一毫支撑着宣传活动。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总是担心，一旦主人发现他的工人、他的奴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贫困。

如果你走到人民中间，就会看到这些情况。在这场无休止的斗争中，工人们在重重困难下沉沦，多少次徒劳地叹息：“那么，那些由我们出资受教育，在学习期间由我们提供衣食的年轻人在哪里？我们背着沉重的包袱，空着肚子，为他们建造了这些房子、这些学院、这些博物馆？我们用苍白的面孔为他们印刷了那些我们连读都读不懂的精美书籍？那些自称掌握人类科学，但在他们眼里人类连一种稀有的毛毛虫都不如的教授们在哪里？那些宣扬自由，却从不起身捍卫我们的自由，每天被踩在脚下的人在哪里？这些作家，这些诗人，这些画家，所有这些伪君子，总之，他们含着泪水谈论人民，却从未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工作？”

一些人自鸣得意地享受着懦弱冷漠的生活，而另一些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则蔑视“乌合之众”，一旦他们胆敢攻击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随时准备扑上去。

的确，时不时会有年轻人出现在舞台上，他们梦想着鼓声和街垒，追求轰动性的场面和局面，但当他们发现通往街垒的道路是漫长的，他们指望在途中赢得的桂冠掺杂着荆棘时，他们就背离放弃了人民的事业。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他们在第一次尝试失败后，会设法获得人民的选票，但如果人民敢于尝试和实践他们自己倡导的原则，他们以后就会第一个谴责人民；如果无产阶级敢于在他们这些领袖发号施令之前行动，他们甚至会把大炮对准无产阶级。

再加上许多人的愚蠢侮辱、傲慢蔑视和懦弱诽谤，这就是中产阶级青年在其强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给予人民的所有帮助。

然后你会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当整支青年大军发现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用他们青春的全部活力、他们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来帮助人民完成他们所承担的巨大事业时！”

我们该怎么办？听着。

你们这些热爱纯科学的人，如果你们接受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熏陶，如果你们已经理解了这场革命的真正含义，而这场革命现在就在敲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为了使科

学与新的原则相一致，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重新塑造吗？在这一领域完成一场比十八世纪在每一个科学分支中完成的革命都要伟大得多的革命是你们的事业吗？难道你们不明白，历史——今天只是一个老太太关于伟大国王、伟大政治家和伟大议会的故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历史本身必须从人民的角度来书写吗？社会经济——今天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抢劫的神圣化——必须在其基本原则及其无数的应用中重新加以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然科学本身，无论是在自然现象的概念上还是在阐述方法上，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

很好，那就开始工作吧！用你的能力为美好的事业服务。特别是用你清晰的逻辑帮助我们消除偏见，用你的综合能力为更好的组织奠定基础。此外，还要教导我们在日常的争论中运用真正的科学调查的大无畏精神，并像你们的前辈那样，向我们展示人类是如何为了真理的胜利而敢于牺牲生命的。

你们这些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社会主义的医生们，无论今天、明天，还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还停留在目前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下，人类本身就会匆匆走向衰亡；当大多数人在与科学告诉我们的

健康条件完全相反的条件下生活时，你们所有的药物都对疾病无能为力。让人们相信，必须铲除疾病的根源，并告诉我们消除这些根源所需的一切。

带着你的手术刀来吧，用准确无误的手为我们解剖我们这个濒临腐烂的社会。告诉我们理性的生存应该是可能的。像真正的外科医生一样，坚持认为当坏疽的肢体可能会毒害整个身体时，就必须截肢。

你们这些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的人，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你们的发现取得了什么成果。让那些不敢向未来大胆迈进的人相信，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孕育着什么样的新发明，工业在更好的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如果人类总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而生产，那么他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

你们这些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如果你们明白自己真正的使命和艺术本身的旨趣，就跟我们走吧。用你们的笔、铅笔、凿子和你们的思想为革命服务。用你们雄辩的文笔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作，向我们展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斗争，用光荣的革命热情点燃我们青年的心，这种热情曾燃烧过我们祖先的灵魂。告诉妇女们，为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献身的丈夫是多么崇高的事业！让人们看看

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多么丑陋，并找出丑陋的根源。告诉我们，如果理性的生活不是在每一步都遭遇到我们当前社会秩序的愚蠢和无耻，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

最后，所有拥有知识、才能、能力和产业的人，如果你们的天性中闪烁着同情的火花，那么你们和你们的同伴们，来吧，把你们的服务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来了，请记住，你们不是作为主人来的，而是作为斗争中的同志来的；你们不是来管理的，而是来为自己在新生活中获得力量的，这种新生活是向着征服未来的方向前进的：你们不是来传授知识的，而是来把握许多人的愿望的；你们要把它们描绘出来，把它们塑造出来，然后带着青春的激情和年龄的判断力，不休息、不匆忙地工作，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它们。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过上完整、高尚、理性的生活。到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你们的行动与良知的指令之间一旦建立起这种崇高的和谐，就会赋予你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力量，为真理、正义和人民的平等而不懈奋斗，你们将赢得人民的感激——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事业是各国青年所向往的呢？

我花了很长时间向你们这些富裕阶级表明，鉴于生活给你们带来的困境，如果你们有勇气、有诚意，你们将被迫与社会主义者并肩工作，在他们的队伍中捍卫社会革命

事业。

然而，这个道理毕竟是多么简单！但是，当我们对那些深受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人说话时，我们必须与多少歪理邪说作斗争，克服多少偏见，摒弃多少利欲熏心的反对意见！

致医生

我说第一个假设（supposition），然后再谈第二个；我假定你接受过科学教育。假设你打算成为一名医生。

明天，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男人会来接你去看一个生病的女人。他会把你领进一条小巷，在那里对面的邻居几乎可以在路人的头上握手。你借着一盏不整齐的小灯的微弱光亮，爬进一个肮脏的环境。你爬上二层、三层、四层、五层肮脏的楼梯，在一间阴暗冰冷的房间里，发现生病的女人躺在铺着肮脏破布的托盘上。脸色苍白的孩子们在单薄的衣服下瑟瑟发抖，睁着大眼睛望着你。丈夫终其一生都在工作，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现在已经失业三个月了。失业在他的行业里并不罕见，每年都会定期发生。但是，以前他失业的时候，他的妻子出去做女招待——也许是给你们洗衬衫；现在她已经卧床不起两个月了，家庭的悲惨景象一览无余。

医生，你要给这位患病的妇女开什么药方呢？你一眼就能看出，她的病因是全身贫血、缺乏良好的食物和新鲜空气。每天吃一块上好的牛排？在郊外锻炼一下？干燥通风的卧室？真是讽刺！如果她能负担得起，早就不用等你的建议了。

如果你心地善良，说话坦率，表情真诚，家人会告诉你很多事情。他们会告诉你，隔墙那边那个咳嗽得让你心碎的女人是个可怜的熨斗工；再往下一层楼，所有的孩子都发烧了；住在基础层的洗衣妇活不过春天；隔壁的房子情况更糟。

你会对这些病人说什么？向他们推荐丰盛的饮食、更换空气、减少劳累……。你只希望你可以，但你不敢，你带着心碎和诅咒离开。

第二天，当你还在为这个狗窝里的住户的命运耿耿于怀时，你的伙伴告诉你，昨天有一个脚夫来接他，这次是坐着马车来的。这是为一栋漂亮房子的主人准备的，是为一位彻夜难眠的女士准备的，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打扮、拜访、舞会以及与愚蠢丈夫的争吵。你的朋友给她开了一些处方，让她养成一种不那么荒谬的生活习惯，少吃热气腾腾的食物，在新鲜空气中散步，保持平和的性情，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她缺乏有用工作的缺憾，还让她在卧室里做一些体操。

一个奄奄一息，因为她一辈子都没有吃饱过，也没有休息够。另一个憔悴，是因为她从出生起就不知道工作为何物。

如果你是那种没有性格的人，什么都能适应，看到最令人厌恶的景观就会轻轻叹息一声，以示安慰，那么你就会逐渐习惯这些对比，野兽的天性有利于你的努力，你唯一的想法就是把自己维持在享乐者的行列中，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是个可怜虫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如果你的每一种情感都转化为意志的行动，如果你身上野兽没有压垮智慧的存在，那么有一天你回到家会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公平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仅仅治疗疾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预防疾病。只要有一点好的生活和智力发展，我们的名单上就会减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把药扔给狗吧！呼吸新鲜空气，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繁重的劳动——这就是我们的起点。没有这些，医生的整个职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就在那一天，你会理解社会主义。如果利他主义对你来说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如果你把自然哲学家的严谨归纳法运用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你最终会发现自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你将和我们一样为实现社会革命而努力。

致科学家

但也许你会说，“单纯的实际业务可能会走向魔鬼！作为一名天文学家、生理学家和化学家，我将献身科学。这样的工作总会结出硕果，哪怕只是为了子孙后代。”

首先，让我们试着了解你投身科学所追求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我们从研究自然和锻炼心智中获得的无疑是巨大的快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问你，哲学家追求科学是为了让自己愉快地度过一生，那么，他在哪一方面不同于那里的酒鬼，后者只追求杜松子酒带给他的直接满足感？毫无疑问，哲学家更明智地选择了他的享受，因为它带给他的快乐比酒鬼的快乐更深刻、更持久。但也仅此而已！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但是不，你们不想过这种自私的生活。你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而这一理念将指导你们的工作。一个迷人的幻想！我们中有谁在初次献身科学时没有拥抱过它呢？

但是，如果你真的为人类着想，如果你的目标是人类的利益，那么你面前就会出现一个艰巨的问题。因为，无论你多么缺乏批判精神，你都必须立即注意到，在我们当

今的社会中，科学只是奢侈的附属品，它使少数人的生活更加惬意，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绝对不可及的。

自科学提出关于宇宙起源的合理命题以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又有多少人掌握了这些命题，又有多少人具备真正的科学批判精神呢？在数以亿计的人中间，他们还沉浸在野蛮人的偏见和迷信之中，因此随时准备充当宗教骗子的傀儡。

或者，再进一步，让我们看看科学在为身体和道德健康奠定合理基础方面所做的工作。科学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保持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告诉我们如何使我们人口中拥挤的人群保持良好的状态。但是，在这两个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在我们的书本上难道不是一纸空文吗？我们知道确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科学只为少数特权阶层而存在，因为社会不平等将社会分为两个阶级——雇佣奴隶和资本攫取者——使得科学关于合理生存条件的所有教导对十分之九的人类来说只是最尖锐的讽刺。

当下，我们不再需要积累科学真理和发现。最重要的是传播已经获得的真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它们，使它们成为共同的遗产。我们必须合理安排一切，使全人类都能吸收和应用这些真理，使科学不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正义要求我们这样做。

此外，科学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只有当科学的真理找到了可以接受的环境时，科学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热的机械起源理论在学术记录中被埋没了八十年，直到物理学知识得到足够广泛的传播，使公众能够接受它。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关于物种变异的观点要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能从他的孙子那里得到认可，并被学术界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即便如此，也离不开公众舆论的压力。哲学家就像诗人或艺术家一样，总是他所处的社会的产物。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这些思想的熏陶，你就会明白，最重要的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今天，这种状况使哲学家被科学真理塞得满满的，而几乎整个人类都还停留在五个或十个世纪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处于奴隶和机器的状态，无法掌握既定的真理。有一天，当你受到广泛、深刻、人道和深奥的科学真理的熏陶时，你就会失去对纯粹科学的兴趣。你们将着手寻找实现这一转变的方法，如果你们在研究中秉持指导你们科学研究的公正性，你们就必然会接受社会主义事业；你们将结束诡辩，来到我们中间。你们厌倦了为这一小撮人谋取享乐的工作，你们将把你们的信息和献身精神用于为被压迫者服务。

请相信，当你的责任感得以实现，当你的情感与行动真正达成一致，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做梦也想不到的力量。同样，当有一天我说，你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变革已经实现——无论如何，这一天已经不远了——那么，从集体的科学工作中获得新的力量，从前来为科学服务的劳动者大军的强大帮助中获得新的力量，科学将迈出新的步伐，与之相比，今天的缓慢进步将显得只是暴发户的简单实践。到那时，你们将享受到科学的乐趣；这种乐趣将成为所有人的乐趣。

致律师

如果你已经读完法律，即将被授予律师资格，也许你也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抱有一些幻想——我假定你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你知道利他主义意味着什么。也许你会这样想：“将我的生命投入到与一切不公正现象进行不懈而有力的斗争中去；运用我的全部能力去取得法律的胜利，公开表达最高的正义——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业吗！”你开始了人生真正的工作，对自己和所选择的职业充满信心。

很好；让我们翻开法律报告的任何一页，看看现实生活会告诉你什么。

这里有一个富有的地主。他要求赶走一个没有支付租金的农民佃户。从法律角度来看，这起案件毫无争议。既然贫农付不起房租，他就必须搬走。但是，如果我们对事实进行调查，就会了解到一些情况：地主挥霍房租，恣意享乐；佃农终日辛勤劳作。房东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改善他的房产。然而，由于铁路的修建、新公路的修建、沼泽地的疏浚、荒地的圈占和开垦，地价上涨，五十年间庄园的价值翻了三番。但是，为这一涨价做出巨大贡献的佃户却毁了自己。他落入了高利贷者的手中，负债累累，再也无力偿还地主的债务。法律总是站在财产的一边，很清楚，

地主是对的。但你们，你们的正义感还没有被法律的虚假所扼杀，你们会怎么做呢？你是会认为农民应该被赶出公路——这是法律的规定，还是会主张地主应该把农民劳动所得的全部财产增值偿还给农民——这是公平的规定？你会站在哪一边？是支持法律而反对公正，还是支持公正而反对法律？

或者，当工人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罢工反对主人时，你会站在哪一边？是站在法律的一边，也就是站在利用危机时期牟取暴利的主人的一边，还是站在反对法律的一边，而站在那些在整个罢工期间只得到可怜工资、眼看着自己妻儿消逝的工人的一边？你们会支持这种以肯定“契约自由”为目的的骗局吗？或者你们会维护公平，根据公平，一个吃得很好的人和一个出卖劳动力勉强糊口的人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根本就不是合同？

再举一个例子。在伦敦，有个人在一家肉店附近闲逛，他偷了一块牛扒，然后带着它跑了。他被逮捕并受到审问，原来他是一个失业的工匠，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屠夫被要求放过这个人，但他支持正义的胜利！他提起诉讼，这个人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当你每天听到类似的判决时，你的良知难道不会对社会产生反感吗？

或者，你们会要求对这个人执行法律吗？这个人从小就被抚养长大，饱受虐待，到了人世间，连一句同情的话都没听过，就为了抢劫而杀害了邻居，从而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你们是否会要求将他处死，或者更糟糕的是，将他监禁二十年，而你们明明知道他是个疯子而不是罪犯，无论如何，他的罪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过错？

你们会要求把这些在绝望中放火烧了磨坊的纺织工人关进监狱，要求把这个向戴着王冠的杀人犯开枪的人终身监禁，要求把这些在街垒上插上未来旗帜的起义者击毙吗？不，千真万确不！

如果你对法律进行推理，而不是重复别人教给你的东西；如果你对法律进行分析，并剥去那些为了掩盖法律的真正起源——即强者的权利——而披上的朦胧的外衣；你会明白，继续做成文法的奴仆，就等于每天把自己置于良心法则的对立面，就等于站在错误的一边讨价还价。既然这种斗争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你要么沉默自己的良心，成为一个无赖，要么打破传统，和我们一起彻底摧毁这一切不公正——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正。这样，你们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革命者！

致工程师

而你，年轻的工程师，梦想着通过将科学发明应用于工业来改善工人的命运，多么可悲的迷失，多么大的欺骗在等着你。你们把年轻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设计铁路的计划中，在悬崖峭壁上蜿蜒盘旋，在大山腹地穿行，将两个被大自然隔开的国家连接起来。但是，当工程开始后，你会看到整团工人在这条阴暗的隧道里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你会看到其他人只带着一点钱和消费的种子回家；你会看到线路的每一码都被人的尸体标记出来，这是卑躬屈膝的贪婪的结果。最后，当线路终于开通时，你会看到它被用作入侵军队的炮兵通道。

你把青春献给了一项旨在简化生产的发现，经过无数次努力，无数个不眠之夜，你终于有了这项宝贵的发明。你把它付诸实践，结果却出乎你的意料。一、两万人被赶出了工作岗位；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孩子，沦为了纯粹的机器！三、四个，甚至十个资本家将赚得盆满钵满，喝上一瓶瓶香槟。这就是你的梦想吗？

最后，你研究了最近的工业进步，你会发现，缝纫机的发明让女裁缝一无所获，绝对是一无所获；尽管有了金刚石钻头，圣哥达隧道的工人还是死于甲状腺肿；泥瓦匠和日工还是和以前一样失业。如果你以指导你进行机械研

究的那种独立精神来讨论社会问题，你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私有财产和工资奴隶制的统治下，每一项新发明非但不会增加工人的福利，反而会使他的奴役更重，劳动更有损尊严，怠工的时间更频繁，危机更尖锐，而唯一从中获益的人，是那些已经拥有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快乐的人。

得出这个结论后，你会怎么做呢？要么，你开始用诡辩来压制自己的良知；然后，在某一天，你将告别年轻时真诚的梦想，试图为自己获取那些能带来快乐和享受的东西——然后，你将投靠营地剥削者。或者，如果你有一颗温柔的心，你会对自己说：“不，现在不是搞发明创造的时候。让我们首先努力改造生产领域。当私有财产被终结时，工业的每一个新进步都将造福全人类，那些今天还只是机器的工人群众到那时将成为有思想的人，将他们的智慧运用到工业中，通过学习得到加强，并熟练掌握体力劳动，这样，机械的进步将向前迈进一大步，在五十年内实现我们现在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致教师

我应该对校长说些什么呢？我不应该对那些把自己的职业看成是一件令人厌烦的事情的人说，而应该对那些被一群快乐的年轻人包围着、被他们欢快的神情和他们快乐的笑声所感染的人说，对那些努力在他们的小脑袋里植入他自己年轻时所珍视的人性观念的人说。

我常常看到你愁眉不展，我知道是什么让你蹙起了眉头。就在这一天，你最喜欢的学生，拉丁文的确不太好，但他的心却很好，他朗诵威廉·退尔的故事时是那么有活力！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似乎恨不得当场刺死所有的暴君；他激情澎湃地朗诵了席勒的诗句：……

在挣脱锁链的奴隶面前，在自由人面前，不要颤抖。

但当他回到家时，母亲、父亲和叔叔都厉声斥责他不尊重牧师或乡村警察。他们一刻不停地对他说：“要谨慎，要尊重权威，要服从上司”，直到他为了读《自助》而把席勒放在一边。

就在昨天，你还被告知，你最好的学生都出了问题。一个只梦想当官；另一个和他的主人串通一气，抢走了工人们微薄的工资；而你，曾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厚望，如今却为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悲惨反差而耿耿于怀。

你还在为此耿耿于怀。我预料，在外面待上两年，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你会把你最喜欢的作家放在书架上，最后你会说，泰尔无疑是个非常诚实的家伙，但终究是小毛病；诗歌是炉边的第一好东西，尤其是当一个人整天都在教“三则运算”的时候，但诗人总是在云里雾里，他们的观点与今天的生活毫无关系，也与学校监察员的下一次来访无关……

或者，另一方面，你们年轻时的梦想将成为你们成熟后的坚定信念。你们希望在学校内外为所有人提供广泛的人性化教育。看到在现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就会攻击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当你们被教育委员会开除后，你们将离开学校，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你要告诉那些比你年长但比你水平低的人，知识是多么诱人，人类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将与社会主义者一起，为彻底改变现有制度而努力，与我们并肩奋斗，为世界实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爱和永无止境的自由。

致艺术家

最后，你，年轻的艺术家、雕塑家、画家、诗人、音乐家，你难道没有注意到，激励你的前辈的神圣之火在今天的人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艺术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平庸至上？

难道不是这样吗？重新发现古代世界，重新沐浴创造文艺复兴杰作的自然之泉的喜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中已不复存在。革命的理想使它冷酷无情，直到现在，没有理想，我们的艺术幻想在现实主义中找到了理想，当它痛苦地用色彩拍摄植物叶片上的露珠，模仿牛腿上的肌肉，或用散文和诗歌细腻地描写下水道令人窒息的污秽，描写高级妓女的闺房时，它就找到了理想。

"你们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如果你们说自己拥有的圣火只不过是一根燃烧的灯芯，那么你们就会一如既往，而你们的艺术也会迅速堕落为商人店铺的装饰者、三流歌剧剧本和圣诞读物故事的提供者——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个行当里跑得满头大汗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真的和人类的心一起跳动，如果你像一个真正的诗人一样有一双聆听生命的耳朵，那么，当你凝视着这悲伤的海洋，它的浪潮席卷而来；当你面对着

这些即将饿死的人们，面对着这些堆积在矿井里的尸体、在被征服者的痛苦呼喊声和胜利者的狂欢声中，在英雄主义与懦弱的冲突中，在高尚的决断与卑鄙的狡诈的对峙中，你不能保持中立。你们将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为你们知道，美丽、崇高、精神或生命本身都站在那些为光明、为人性、为正义而战的人一边！

你能做些什么

你终于阻止了我！“什么鬼东西！”你说。“但是，如果抽象科学是一种奢侈，医学实践只是一种滑稽；如果法律意味着不公正，而机械发明不过是抢劫的手段；如果学校与‘实践者’的智慧相悖，就一定会被克服，而没有革命思想的艺术只能堕落，那我还能做什么呢？”

这是一项艰巨而令人着迷的任务，在这项工作中，你的行动将与你的良知完全一致，这项工作能够激发你最崇高、最旺盛的天性。

什么工作？现在我来告诉你。

你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永远泯灭自己的良知，终有一天会说：“只要我还在尽情享乐，只要人们还傻傻地让我这样做，人类就可以去见魔鬼”。否则，你就会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与他们一起为彻底改造社会而努力。这就是我们所作分析的必然结果。这是每一个聪明人都必须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要他公正地判断他所看到的周围事物，不理睬他所受的中产阶级教育和他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观点给他提出的诡辩。

得出这一结论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离开你们所处的环境，离开习惯于把工人说成是一群畜生的环境；到人民中间去，问题就会迎

刃而解。

你们会发现，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无论在意大利还是美国，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特权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就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一劳永逸地摧毁资本家强加给他们的奴役，为建立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新社会奠定基础。人民再也不能用十八世纪农奴所唱的那些旋律令人心碎的歌曲来表达他们的苦难了。今天，他在工作中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尽管他的权利受到了种种阻碍。他一直在思考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生活不再仅仅是对人类四分之三的人的诅咒，而是成为所有人的祝福。他攻克了社会学中最棘手的问题，并努力用他的常识、观察力和悲惨的经历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与不幸的同胞达成共识，他试图组成团体，组织起来。他组建社团，靠微薄的捐助艰难地维持着。他试图与边疆以外的同胞达成协议。他比所有大嘴巴的慈善家做得更多，以加速国家间战争不可能发生的那一天的到来。为了了解他的兄弟们在做什么，为了增进与他们的了解，为了阐述和传播他的思想，他不惜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维持他的工人阶级报刊。这是一场多么无休止的斗争！多么艰苦的劳动啊，需要不断地重新开始。有时是为了填补

因开小差而造成的空白——开小差是倦怠、腐败和迫害的结果；有时是为了重组被炮火和葡萄弹击中的队伍；有时是为了恢复因大屠杀而突然中断的学习。

这些报纸是由那些不得不废寝忘食地从社会中攫取知识碎片的人撰写的。工人们从生活必需品中省吃俭用，用一分一毫支撑着宣传活动。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总是担心，一旦主人发现他的工人、他的奴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贫困。

如果你走到人民中间，就会看到这些情况。在这场无休止的斗争中，工人们在重重困难下沉沦，多少次徒劳地叹息：“那么，那些由我们出资受教育，在学习期间由我们提供衣食的年轻人在哪里？我们背着沉重的包袱，空着肚子，为他们建造了这些房子、这些学院、这些博物馆？我们用苍白的面孔为他们印刷了那些我们连读都读不懂的精美书籍？那些自称掌握人类科学，但在他们眼里人类连一种稀有的毛毛虫都不如的教授们在哪里？那些宣扬自由，却从不起身捍卫我们的自由，每天被踩在脚下的人在哪里？这些作家，这些诗人，这些画家，所有这些伪君子，总之，他们含着泪水谈论人民，却从未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工作？”

一些人自鸣得意地享受着懦弱冷漠的生活，而另一些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则蔑视“乌合之众”，一旦他们胆敢攻击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随时准备扑上去。

的确，时不时会有年轻人出现在舞台上，他们梦想着鼓声和街垒，追求轰动性的场面和局面，但当他们发现通往街垒的道路是漫长的，他们指望在途中赢得的桂冠掺杂着荆棘时，他们就背离放弃了人民的事业。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他们在第一次尝试失败后，会设法获得人民的选票，但如果人民敢于尝试和实践他们自己倡导的原则，他们以后就会第一个谴责人民；如果无产阶级敢于在他们这些领袖发号施令之前行动，他们甚至会把大炮对准无产阶级。

再加上许多人的愚蠢侮辱、傲慢蔑视和懦弱诽谤，这就是中产阶级青年在其强大的社会进化过程中给予人民的所有帮助。

然后你会问，“我们该做些什么？当整支青年大军发现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用他们青春的全部活力、他们的全部智慧和才能来帮助人民完成他们所承担的巨大事业时！”

我们该怎么办？听着。

你们这些热爱纯科学的人，如果你们接受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熏陶，如果你们已经理解了这场革命的真正含义，而这场革命现在就在敲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为了使科

学与新的原则相一致，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重新塑造吗？在这一领域完成一场比十八世纪在每一个科学分支中完成的革命都要伟大得多的革命是你们的事业吗？难道你们不明白，历史——今天只是一个老太太关于伟大国王、伟大政治家和伟大议会的故事——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历史本身必须从人民的角度来书写吗？社会经济——今天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抢劫的神圣化——必须在其基本原则及其无数的应用中重新加以研究？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必须彻底改头换面，从另一个角度看自然科学本身，无论是在自然现象的概念上还是在阐述方法上，都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

很好，那就开始工作吧！用你的能力为美好的事业服务。特别是用你清晰的逻辑帮助我们消除偏见，用你的综合能力为更好的组织奠定基础。此外，还要教导我们在日常的争论中运用真正的科学调查的大无畏精神，并像你们的前辈那样，向我们展示人类是如何为了真理的胜利而敢于牺牲生命的。

你们这些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社会主义的医生们，无论今天、明天，还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人类还停留在目前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下，人类本身就会匆匆走向衰亡；当大多数人在与科学告诉我们的

健康条件完全相反的条件下生活时，你们所有的药物都对疾病无能为力。让人们相信，必须铲除疾病的根源，并告诉我们消除这些根源所需的一切。

带着你的手术刀来吧，用准确无误的手为我们解剖我们这个濒临腐烂的社会。告诉我们理性的生存应该是可能的。像真正的外科医生一样，坚持认为当坏疽的肢体可能会毒害整个身体时，就必须截肢。

你们这些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的人，请坦率地告诉我们你们的发现取得了什么成果。让那些不敢向未来大胆迈进的人相信，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孕育着什么样的新发明，工业在更好的条件下可以做什么；如果人类总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而生产，那么他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

你们这些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如果你们明白自己真正的使命和艺术本身的旨趣，就跟我们走吧。用你们的笔、铅笔、凿子和你们的思想为革命服务。用你们雄辩的文笔或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作，向我们展示人民反抗压迫者的斗争，用光荣的革命热情点燃我们青年的心，这种热情曾燃烧过我们祖先的灵魂。告诉妇女们，为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献身的丈夫是多么崇高的事业！让人们看看

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多么丑陋，并找出丑陋的根源。告诉我们，如果理性的生活不是在每一步都遭遇到我们当前社会秩序的愚蠢和无耻，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

最后，所有拥有知识、才能、能力和产业的人，如果你们的天性中闪烁着同情的火花，那么你们和你们的同伴们，来吧，把你们的服务提供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来了，请记住，你们不是作为主人来的，而是作为斗争中的同志来的；你们不是来管理的，而是来为自己在新生活中获得力量的，这种新生活是向着征服未来的方向前进的：你们不是来传授知识的，而是来把握许多人的愿望的；你们要把它们描绘出来，把它们塑造出来，然后带着青春的激情和年龄的判断力，不休息、不匆忙地工作，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它们。只有到那时，你才能过上完整、高尚、理性的生活。到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而你们的行动与良知的指令之间一旦建立起这种崇高的和谐，就会赋予你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力量，为真理、正义和人民的平等而不懈奋斗，你们将赢得人民的感激——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事业是各国青年所向往的呢？

我花了很长时间向你们这些富裕阶级表明，鉴于生活给你们带来的困境，如果你们有勇气、有诚意，你们将被迫与社会主义者并肩工作，在他们的队伍中捍卫社会革命

事业。

然而，这个道理毕竟是多么简单！但是，当我们对那些深受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人说话时，我们必须与多少歪理邪说作斗争，克服多少偏见，摒弃多少利欲熏心的反对意见！

致工人阶级青年

今天对你们——人民的青年——的讲话很容易变得简短。事件的压力促使你们成为社会主义者，无论你们多么缺乏理性和行动的勇气。

从劳动人民的行列中脱颖而出，而不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就等于误解了利害攸关的真正利益，就等于放弃了事业，放弃了真正的历史使命。

你是否还记得，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一个冬日，你去那黑暗的球场玩耍？寒冷透过单薄的衣服侵袭着你的肩膀，泥泞浸透了你破旧的鞋子。即使在那时，当你看到远处衣着华丽、胖乎乎的孩子带着鄙视的眼光看着你时，你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小鬼无论在智力、常识还是精力方面，都无法与你和你的同伴相提并论。但后来，当你被迫从早上七点钟起就把自己关在肮脏的工厂里，一连几个小时紧靠着一台旋转的机器，而你自己也是一台机器，被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着它的动作不停地跳动——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其他人，都在安静地接受高级学校、学院和大学的教育。而现在，同样是这些孩子，虽然智力不如你们，但比你们教得好，成了你们的主人，享受着生活的一切乐趣和文明的一切好处。你们呢？等待你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你回到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五六个人挤在几平方英尺的地方。在那里，你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年事已高，只能给你提供干面包和土豆作为唯一的食物，再用一种在讽刺中被称为“茶”的黑色液体来冲洗。为了分散你的注意力，你永远都有一个永无休止的问题：“我明天怎么付得起面包师的钱？后天怎么付得起房东的钱？”

什么！你必须像你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疲惫地生活三四十一年吗？难道你必须一辈子辛辛苦苦地为别人谋取一切福利、知识和艺术的享受，而自己却只能永远为能否得到一点面包而忧心忡忡吗？难道你要永远放弃生活的所有美好，一心一意为一小撮游手好闲的人提供一切奢侈吗？你会不会因为辛勤劳作而疲惫不堪，当艰难的日子——令人恐惧的艰难日子——来临时，换来的即使不是痛苦，也只是麻烦？这就是你渴望的生活吗？

也许你会放弃。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情况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整整几代人都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而我，在这件事上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也必须屈服。那就让我们继续努力，尽力活得更好吧！”

很好。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本身会不厌其烦地启迪你。有一天，一场危机来临了，这场危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短暂的现象，而是一场摧毁整个行业、使成千上万的工人陷入苦难、使整个家庭崩溃的危机。你和其他人一样

在灾难中挣扎。但你很快就会看到，你的妻子、孩子、朋友是如何在你的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屈服于匮乏，逐渐消逝。纯粹因为缺乏食物，因为缺乏照顾和医疗救助，他们在穷人的担架上终老，而富人的生活却在大城市阳光明媚的街道上欢快地流淌，全然不顾那些挨饿和死亡的人。这样，你就会明白这个社会是多么令人厌恶。到那时，你们就会反思这场危机的原因，你们的审视就会深入到这种憎恶的深渊，这种憎恶使千百万人任由一小撮无用的庸碌之徒的残暴贪婪摆布。到那时，你们就会明白，社会主义者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而且必须从上到下进行重组，他们是对的。

从一般危机转到你的特殊情况。有一天，当你的主人试图通过新一轮的减薪来从你身上多榨取几块钱，以进一步增加他的财富时，你会提出抗议。但他会傲慢地回答：“如果你不按我开的价干活，就去吃草吧。”然后你就会明白，你的主人不仅要像剪羊毛一样剪你的羊毛，他还把你看成是一种低等动物；他不满足于通过工资制度无情地控制你，他还急于让你在各方面都成为奴隶。然后，也许你会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你会放弃人类尊严的感觉，你会以遭受一切可能的羞辱而告终。或者，你会热血上涌，你会为自己正在滑下的可怕斜坡而颤抖，你会反驳，你会成为大街上的无业游民，你会明白社会主义者说的“造反！

起来反抗这种经济奴役！”是多么正确。然后，你们就会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与他们一起为彻底摧毁一切奴役——经济、社会和政治奴役——而努力。

到那时，你们每一个人，诚实的年轻人，男人和女人，农民，工人，工匠和士兵，都会明白什么是你们的权利，会和我们一起走。你们来是为了和你们的兄弟们一起准备这场革命，它将扫除一切奴役的残余，撕碎枷锁，打破陈旧的传统，为全人类开辟一个崭新、更广阔的欢乐生存空间，最终在整个人类社会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平等和无怨无悔的博爱。与所有人一起工作，为所有人工作——充分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面发展他们的所有能力，过上理性、人性化的幸福生活！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一小撮人——太弱小了，无法达到我们所追求的宏伟目标。数一数，看看有多少人在遭受这种不公。我们这些为别人干活的农民，在主人吃麦子的时候喃喃自语，我们自己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我们这些织丝绸和天鹅绒以让自己衣衫褴褛的工人，我们也是一大群人；当工厂的铿锵声让我们有片刻的安宁时，我们就会像春潮中的大海一样涌向街道和广场。我们这些被命令驱使或被殴打的士兵，我们这些挨子弹的人，我们的军官因此而得到十字勋章和抚恤金，我们这些可怜的傻瓜，我们这些迄今为止只知道向我们的兄弟

开枪的人，为什么我们只要向这些好心指挥我们的头戴翎毛和勋章的人看一眼，就会发现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可怕的苍白。

是啊，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每天受苦受难、受尽侮辱的人，我们是无人能数的芸芸众生，我们是能包容和吞噬一切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有意愿，正义就会在那一刻得到伸张：就在那一刻，地球上的暴君们将灰飞烟灭。

关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文章的说明

收录这篇写于 1905 年为《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11 版撰写的学术文章，是因为它是用英语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先驱进行的最好的简要阐述。它的客观论述使其立刻脱离了宣传的范畴，在如此权威的出版物中出现，是为了向那些与劳工或革命运动无关的人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对于那些希望由最有资格阐述共产无政府主义的人对共产无政府主义有一个简明扼要的看法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对于那些想知道共产无政府主义是怎么回事的陌生询问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

当然，它在克鲁泡特金自己的教学中没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份冷静的声明，它的优点和实用性是重印它的唯一原因。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源于希腊文。an- 和 pax，违背权威），是对一种生活和行为原则或理论的称呼，在这种原则或理论下，社会是没有政府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和谐不是通过服从法律或服从任何权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各个团体之间达成的自由协议来实现的，

这些团体既有地域性的，也有职业性的，它们是为了生产和消费而自由组成的，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文明人无限多样的需求和愿望而自由组成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现在已经开始覆盖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志愿团体将得到更大的扩展，从而取代国家的所有职能。它们将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由无穷无尽的各种团体和各种规模和程度的联合会组成，有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有临时性的、或多或少永久性的，用于所有可能的目的：生产、消费和交换、通讯、卫生安排、教育、相互保护、保卫领土等等；另一方面，也用于满足日益增多的科学、艺术、文学和社交需要。

此外，这样的社会并不代表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恰恰相反，正如在整个有机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和谐将（据说）产生于各种力量 and 影响之间不断变化的调整和重新调整平衡，而这种调整将更容易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享有国家的特殊保护。

我们认为，如果社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在生产劳动中自由行使其权力时，就不会受到由国家维持的资本主义垄断的限制；人在行使其意志时，也不会受到对惩罚的恐惧或对个人或形而上学实体的顺从的限制，因为这两者都会导致主动性的压抑和思想的奴性。他将以自己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这种理解必然会在

他的自我和周围环境的伦理观念之间产生自由行动和反应的印象。这样，人就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智力、艺术和道德等所有能力，而不会因垄断者的过度劳累或大多数人的奴性和惰性而受到阻碍。这样，他就能实现完全的个性化，而这在目前的个人主义制度下，或在所谓的人民国家（Volkstaat）的任何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制度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无政府主义作家认为，他们的构想不是乌托邦，不是在把一些理想作为假设之后，用先验的方法构建出来的。他们认为，尽管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可能会暂时得到改革者的青睐，但他们的构想是通过对已经在起作用的趋势的分析得出的。现代技术的进步极大地简化了所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独立精神的不断增强，以及自由倡议和自由理解在所有活动领域（包括那些过去被认为是教会和国家职责的）的迅速传播，都在不断加强无政府的趋势。

至于他们的经济观念，无政府主义者与所有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的左翼）一样，都认为目前盛行的土地私有制和我们为利润而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垄断，既违背了正义原则，也违背了实用性的要求。它们是阻碍现代技术成果为所有人服务、从而创造普遍福祉的主要障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完

全是进步的障碍。但是，他们也指出，国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允许少数人垄断土地、允许资本家把每年积累的剩余生产成果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据为己有的主要工具。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目前的土地垄断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力量反对作为这一制度主要支撑的国家。不是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而是整个国家，不管它是君主制还是通过全民公决来管理的共和国。

国家组织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在自治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欧洲国家），一直是建立有利于少数统治者的垄断的工具，不能让它为摧毁这些垄断而工作。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把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来源——土地、矿山、铁路、银行、保险等——以及所有主要工业部门的管理权，除了已经积聚在国家手中的所有职能（教育、国家支持的宗教、保卫领土等）之外，都移交给国家，就意味着创造一个新的暴政工具。国家资本主义只会增加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权力。真正的进步在于领土和职能的权力下放，在于地方和个人主动精神的发展，在于从简单到复杂的自由联合，而不是目前从中心到边缘的等级制度。

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与自然界的进化一样，社会的缓慢进化之后也会不时出现加速进化的时期，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他们认为革命

的时代尚未结束。在缓慢进化的时期之后，还会有快速变化的时期，必须利用这些时期——不是为了增加和扩大国家的权力，而是为了通过在每个乡镇或公社组织当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团体，以及这些团体的地区性联合会，最终是国际性联合会，来减少国家的权力。

根据上述原则，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加入现存的国家组织，也拒绝通过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来支持它。他们不谋求在议会上建立政党，请工人们也不要建立政党。因此，自1864—1866年国际劳动人民协会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在劳工组织中直接宣传他们的思想，并促使这些工会直接与资本斗争，而不寄希望于议会立法。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

刚刚勾勒出的社会概念和作为其动态表现的趋势，一直存在于人类之中，与统治阶级的概念和趋势相对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在是一种占上风，现在是另一种占上风。正是由于前一种趋势，我们才有了由群众自己演化出来的各种机构——氏族、村社、行会、自由的中世纪城市，群众通过这些机构抵御征服者和追求权力的少数人的侵犯。在中世纪的伟大宗教运动中，尤其是在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先驱中，同样的趋势以巨大的能量表现出来。同时，自老子时代以来，它显然也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尽管由于其非学术性和通俗性，它在学者中得到的同情显然少于对立的倾向。

正如阿德勒教授在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昔里奈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阿里斯提甫斯（Aristippus，约生于公元前430年）已经教导人们，智者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交给国家。他在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时说，他既不想属于统治阶级，也不想属于被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态度似乎只是伊壁鸠鲁派对大众生活的态度所决定的。

无政府主义哲学在古希腊的最佳代表是来自克里特岛的芝诺（公元前 342—267 年或 270 年），他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创始人。他摒弃了国家的万能、干预和管制，宣扬个人道德法则的主权——他已经指出，虽然必要的自我保护本能会导致人的利己主义，但大自然为人提供了另一种本能——交际本能，从而纠正了利己主义。当人类足够理智地遵循自己的本能时，他们就会跨越疆界团结起来，组成宇宙。他们将不需要法庭或警察，不需要寺庙和公共礼拜，也不需要使用无偿的礼物来代替交换。遗憾的是，芝诺的著作并没有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引文来了解他。然而，他的措辞与现在使用的措辞相似，这表明他所代表的人性倾向是多么深刻。

在中世纪，我们发现杰出的阿尔巴主教马尔科·吉罗拉莫·维达在他的第一部对话录《De dignitate reipublicae》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Ferd. Cavalli, in Men dell'Istituto Vento, xiii.; Dr. E. Nys, Research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但是，特别是在一些早期基督教运动中，从九世纪亚美尼亚开始，以及在早期胡斯派（特别是乔耶茨基）和早期再洗礼派（特别是汉斯·登克）的布道中（参见凯勒：《Ein Apostel der Wiedertäufer》），人们发现同样的思想得到了有力的表达，当然特别强调的是其道德方面。

拉伯雷和费奈隆在他们的《乌托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中也很流行，这可以从卢梭的著作、狄德罗的《布干维尔航海记序言》等中偶尔出现的单独表述中得出结论。然而，由于罗马天主教会严格的审查制度，这些思想很可能无法在当时得到发展。

这些思想后来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中得到了体现。虽然雅各宾派政府竭尽全力把一切都集中到政府手中，但从最近出版的文件来看，人民群众在他们的城市和“部门”中完成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他们把法官的选举、军队和大城市的物资和装备的组织、失业者的工作、慈善机构的管理等等都划归了自己。他们甚至试图通过国民议会之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法国36 000个市镇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参见Sigismund Lacroix, *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正是戈德温在他的《政治正义探究》（1793年，两卷本）中首先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概念，尽管他并没有为他这部杰出著作中提出的观点命名。他写道：

“法律不是我们祖先智慧的产物，而是他们的激情、胆怯、嫉妒和野心的产物。它们所提供的补救措施比它们假装要治疗的邪恶更糟糕。如果而且只有废除所有的法律和法庭，并让为此目的而选出的通情达理的人对出现的争论

作出裁决，真正的正义才会逐渐形成。至于国家，戈德温坦率地主张予以废除。他写道，一个社会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政府的情况下存在：只是社区应该很小，而且完全自治。在谈到财产时，他指出，每个人“对每一个实体能够为人类的利益做出贡献的人”的权利必须仅由正义来调节：实体必须“归于最想要它的人”。他的结论就是共产主义。然而，戈德温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后来完全重写了关于财产的一章，并在《政治正义》（8开本，1796年）第二版中缓和了他的共产主义观点。

蒲鲁东是第一个在1840年（《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第一部回忆录）使用“无政府主义”这一名称，并将其应用于无政府的社会状态的人。无政府主义者这一名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吉伦特派随意用于那些不认为推翻路易十六就完成了大革命任务，并坚持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废除封建权利而不赎买、将1669年以来圈占的公有土地归还给村社、将土地财产限制在120英亩以内、累进所得税、在公正价值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交换，这些措施已经开始付诸实践，等等）。

现在蒲鲁东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并用“无政府状态”来形容它。蒲鲁东众所周知，他反对一切共产主义计划，根据这些计划，人类将被赶进共产主义修道院或兵营，他还反对路易·勃朗和集体主义者所主张的一切

国家或国家援助的社会主义计划。当他在第一本关于财产的回忆录中宣称“财产是偷窃”时，他指的只是目前罗马法意义上的财产，即“使用和滥用的权利”；另一方面，他认为财产权是对占有的有限理解，是抵御国家侵犯的最佳保护。同时，他并不想用暴力剥夺土地、住宅、矿山、工厂等的现有所有者。他倾向于通过使资本不能赚取利息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他建议通过国家银行来实现这一目的，而国家银行的基础是所有从事生产的人的相互信任，他们将同意通过代表生产每一个给定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的劳动支票来按成本价值交换他们的产品。在这种蒲鲁东被称为“互助”的制度下，所有服务的交换都将是严格等价的。此外，这样的银行可以无息贷款，只征收1%甚至更少的利息，以支付管理费用。这样，每个人都能借到买房子所需的钱，没有人会再同意每年为使用房子支付租金。这样，在不征用的情况下，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普遍的“社会清算”。矿山、铁路、工厂等也是如此。

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将毫无用处。公民之间的主要关系将建立在自由协议的基础上，仅仅通过记账来调节。争执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蒲鲁东对国家和所有可能的政府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对所有经济问题有深刻的洞察力，这是蒲鲁东作品众所周知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互助主义的前身是英国的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互助主义，他的追随者还有约翰·格雷（《人类幸福讲座》，1825 年；《社会制度》，1831 年）和 J. F. 布雷（《劳动的错误与劳动的补救》，1839 年）。它在美国也有先驱。生于 1798 年的约西亚·沃伦（参见 W. 贝利：《约西亚·沃伦，美国第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波士顿，1900 年）属于欧文的“新和谐派”，他认为这一事业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压制个性以及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他认为，这些缺陷是每一个以权威和货品群体为基础的计划所固有的。因此，他主张完全的个人自由。1827 年，他在辛辛那提开了一家乡村小商店，这是第一家“公平商店”，人们称其为“时间商店”，因为它的基础是以小时为单位交换各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价格的极限”，因此“没有利息”是他的商店的座右铭，后来他在纽约附近的“公平村”也是如此，1865 年该村仍然存在。基思先生于 1855 年在波士顿创办的“公平之家”也值得一提。

虽然蒲鲁东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互助银行思想在美国得到了支持，甚至得到了实际应用，但他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在法国却鲜有回响，因为在法国，拉曼奈和傅立叶主义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路易·勃朗和圣西门追随

者的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思想在德国的左翼黑格尔式人士中得到了一些暂时的支持，1843年的摩西·赫斯 (Moses Hess) 和 1845年的卡尔·格伦 (Karl Grün) 主张无政府主义。此外，威廉·魏特林 (Wilhelm Weitling) 的专制共产主义在瑞士工人中引起了反对，威廉·马尔 (Wilhelm Marr) 在40年代表达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在德国的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原名卡斯帕·施密特) 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他的杰出作品《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和为《莱茵报》撰写的文章在被约翰·亨利·麦凯 (John Henry Mackay) 重新发掘之前一直被忽视。

巴什教授 (V. Basch) 在其有趣的著作《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L'Individualisme anarchiste: 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1904年) 中指出，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以及谢林的“绝对”和黑格尔的 Geist，是如何在反黑格尔式起义开始时必然引起起义者在营地中宣扬同样的“绝对”的。施蒂纳就是这样做的，他不仅主张彻底反抗国家，反对专制共产主义强加给人的奴役，而且主张把个人从一切社会和道德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我”的复活、个人至上、彻底的“a-道德主义”

和“利己主义者的联合”。巴什教授已经指出了这种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结论。它认为，一切高级文明的目的不是让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正常发展，而是让某些天赋较好的人“充分发展”，甚至不惜牺牲人类大众的幸福和生存。因此，这些个人主义者所反对的，正是回归到最普通的个人主义，即所有可能成为优越少数派的人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以否定自己的出发点而告终，更不用说个人在“美丽的贵族”压迫大众的条件下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了。他的发展仍将是单侧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这种思想方向无疑正确而有益地倡导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但却只能在有限的艺术和文学界中听到。

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无政府主义

众所周知，在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失败和共和国垮台之后，社会主义各派的宣传工作普遍萧条。在长达二十年的反动时期，所有社会主义报刊都被封杀。然而，即使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开始取得一些进展，即在贝勒加里克（Cæurderoy）的著作中，特别是约瑟夫·德雅克（Joseph Déjacque）的著作《Les Lazaréennes》、《L'Humanisphère》，一部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最近被发现并重印。1864年后，一些法国工人（均为“互助主义者”）在伦敦世界博览会期间与罗伯特·欧文的英国追随者聚会，成立了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复兴。这个协会发展非常迅速，采取的政策是直接与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干涉议会的政治鼓动，这一政策一直沿用到1871年。然而，法德战争后，公社起义后国际协会在法国被取缔，在新成立的帝国议会中获得成年选举权的德国工人坚持要改变国际协会的策略，并开始建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很快导致了工人协会的分裂，拉丁联合会、西班牙联合会、意大利联合会、比利时联合会和尤拉希克联合会（法国不能派代表参加）相互之间组成了一个联邦联盟，与国际马克思主义总委员会完全决裂。在这些联合会内部，现在可以说是发展出了现代

的无政府主义。在“联邦主义者”和“反专制主义者”的名称被这些联合会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无政府主义者”的名称占了上风，他们的对手坚持把“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名称用在他们身上，最后这个名称又被恢复了。

巴枯宁很快成为这些拉丁联合会中发展无政府主义原则的领军人物，他在许多著作、小册子和书信中都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彻底废除国家，他写道：国家是宗教的产物，属于较低级的文明状态，代表着对自由的否定，甚至破坏了它为普遍福祉而承诺做的事情。国家在历史上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但它的彻底消亡迟早也是必要的。巴枯宁摒弃一切立法，即使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立法，他主张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每个公社只要不对邻国构成威胁，就应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个人也应享有完全的独立。公社的自由联盟将构成自由的国家。

至于他的经济观念，巴枯宁和他的在国际联盟中的联邦主义同志们一样，自称是“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这不是四十年代维达尔和佩克尔的意思，也不是他们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追随者的意思，而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状态：所有生产必需品都由劳动团体和自由公社共同拥有，而劳动的报偿方式，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其他方

式，都将由每个团体自行解决。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预言社会革命即将来临，社会革命将是实现新条件的手段。

尤拉希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联合会和分会，以及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宣传的主要中心。他们不参与议会政治，始终与劳工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初，当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力开始在罢工、五一示威（他们在示威中宣传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总罢工思想）和军队中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中显现出来时，针对他们的暴力起诉就出现了，尤其是在拉丁国家（包括在巴塞罗那城堡的肉刑）和美国（1887年五名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被处决）。针对这些起诉，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暴力行动进行报复。这在公众中造成了暴力是实体的无政府主义的印象，这种观点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实际上，只要公开行动受到镇压的阻挠，所有党派都会诉诸暴力，而特殊的法律会使他们成为不法之徒。

无政府主义继续发展，部分方向是蒲鲁东派的“Mutuellisme”，但主要是共产无政府主义。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加入了第三个方向，即基督教

的无政府主义；而第四个方向可以说是文学的无政府主义，在一些著名的现代作家中开始出现。

蒲鲁东的思想，特别是关于互助银行的思想，与约西亚·沃伦的思想相一致，在美国得到了相当多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流派。其中的主要作者有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威廉·格林、莱桑德·斯普纳（1850年开始写作，其未完成的作品《自然法》充满希望），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可以在内特劳博士的《无政府主义书目》中找到。

本杰明·R·塔克（Benjamin R. Tucker）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于1881年创办了《自由》杂志，其理念是蒲鲁东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念的结合。塔克认为，严格来说，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利己主义者，每一个人的团体，无论是几个人的秘密联盟，还是美国国会，只要有权力，就有权压迫全人类；塔克继续证明，普遍而彻底地应用这些原则是有益的，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因为每个人的权力都会受到其他人行使平等权利的限制。他还指出（继H. 斯宾塞之后）侵犯他人权利与反抗这种侵犯之间的区别；统治与防卫之间的区别：前者同样应受到谴责，无论是罪犯对个人的侵犯，还是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的侵犯，或是所有其他人对一个人的侵犯；而反抗侵犯则是可以辩护的，也

是必要的。为了自卫，公民和群体都有权使用任何暴力，包括死刑。为了履行遵守协议的义务，暴力也是合理的。因此，塔克追随斯宾塞，并像他一样（在本文作者看来）为在“防卫”标题下重组国家的所有职能开辟了道路。他对当前国家的批判非常深刻，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也非常有力。关于他的经济观点，B.R. Tucker如下蒲鲁东。

然而，美国的蒲鲁东无政府个人主义在劳动群众中却很少得到同情。那些信奉个人主义的人——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所高度赞扬的个性化是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的，他们要么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被驱赶到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个人主义中去，要么隐退到一种伊壁鸠鲁式的道德主义或超人理论中，类似于施蒂纳和尼采的理论。大部分无政府主义工人更喜欢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的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逐渐演变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法国的埃利塞·雷克鲁斯、让·格拉夫、塞巴斯蒂安·福雷、埃米尔·普热；意大利的恩里科·马拉泰斯塔和科维利；R. 梅拉、A. 洛伦佐，以及西班牙许多优秀宣言的作者（大多默默无闻）；德国人中的约翰·莫斯特；美国的斯皮斯、帕森斯及其追随者等等；而多梅拉·尼乌文赫伊斯在荷兰则占据着重要的中介地位。自1880年以来出版的主要无政府主义报纸也属于这一方向；而这一方向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加

入了所谓的工团主义者运动——非政治劳工运动的法文名称，致力于与资本主义进行直接斗争，这一运动最近在欧洲变得如此突出。

作为无政府共产主义方向的一员，本文作者多年来一直努力发展以下思想：说明现代自然科学哲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乎逻辑的联系；通过研究目前社会中明显的、可能预示着社会进一步演变的趋势，将无政府主义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以及制定无政府主义伦理的基础。至于实体本身，克鲁泡特金的目的是证明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共产主义——比集体主义有更多的机会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公社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而自由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是唯一有机会被文明社会接受的共产主义形式；因此，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两个相互完善的进化条件，一个使另一个成为可能和可以接受。此外，他还试图说明，在革命时期，一个大城市——如果它的居民接受了这一思想——如何按照自由共产主义的方针组织起来；城市如何保证每个居民的住所、食物和衣服，达到现在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到的舒适程度，以换取半天或五小时的工作；如果每个人在一天的另一半时间里参加各种自由协会，追求各种可能的目标——教育、文学、科学、艺术、体育等等——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所有这些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为了证明上述第一个论断，他

分析了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可能性，这两种劳动都与脑力劳动相结合。为了阐明人类进化的主要因素，他分析了民众互助的建设性机构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以及国家的历史作用。

列夫·托尔斯泰没有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与15世纪和16世纪民间宗教运动的前辈乔耶茨基、登克等人一样，在国家和财产权问题上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从基督教义的总体精神和必要的理性要求中推导出自己的结论。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教会、国家和法律，尤其是现行的财产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尤其是在《上帝的国度在你们自己》一书中）。他把国家描述为恶人的统治，以残暴的武力为后盾。他说，强盗远没有组织严密的政府危险。他对目前流行的关于教会、国家和现行财产分配赋予人们的利益的偏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从基督的教义中推导出不抵抗的规则和对所有战争的绝对谴责。不过，他的宗教论点与对当前罪恶的冷静观察所得出的论点结合得非常好，因此他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部分对宗教读者和非宗教读者都有吸引力。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简短地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对现代文学的渗透以及当代优秀作家的自由主义思想对无政府主义发展的影响。我们只要查阅一下《革命》报和后来的《新时代》报的十卷《文学补编》（Supplement

littéraire)，其中收录了数百位表达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就会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思想运动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米尔（J. S. Mill）的《自由》、斯宾塞（Spencer）的《个人与国家》（Individual versus The State）、马克-居约（Marc Guyau）的《没有义务或制裁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Obligation or Sanction）、富耶（Fouillée）的《道德、艺术与宗教》（La morale, l'art et la religion）、多图利（E. Douwes Dekker）的作品、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艺术与革命》（Art and Revolution）、尼采、爱默生、W.Lloyd Garrison、梭罗、亚历山大-赫尔岑、爱德华-卡彭特等人的作品；在小说领域，易卜生的戏剧、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左拉的《巴黎》和《苦难》、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最新作品以及无数鲜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都充满了各种思想，显示出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思想中正在进行的工作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朝着使人摆脱国家束缚和资本主义束缚的同一方向前进。

克鲁泡特金革命、历史和社会 学著作部分书目

面包与自由，299 页，查普曼和霍尔出版社，伦敦，1906 年（绝版）；普特南出版社，纽约，1907 年（绝版）；先锋出版社，纽约，1926 年。

《伦理：起源与发展》，350 页，L. McVeagh 出版社，纽约，1914 年。

《田野、工厂和车间》。475页，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波士顿，1899年（原初版，315页）；Putnam's，纽约，1913年（修订版，477页）；T. Nelson and Sons，伦敦，1919年（同上）。

《伟大的法国大革命》。610 页，海尼曼出版社，伦敦（绝版）；普特南出版社，纽约，1909 年（绝版）；先锋出版社，纽约，1927 年。

《俄罗斯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341页，Alfred A. Knopf，纽约，1915。（原版为《俄罗斯文学》，纽约，1905年。）这本著作中有一些与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有关的材料。

《俄罗斯和法国监狱》，387页，沃德和多尼出版社，伦敦，1887年。（早已绝版）。

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小册子，112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12年；社会科学俱乐部，费城，1903年，94页。本卷部分转载。

《革命家回忆录》，519 页，霍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1899 年。

互助论 348页，Heinemann出版社，伦敦，1902年；（修订版，1904年）；Alfred A. Knopf出版社，纽约，1921年，240页。

俄国的恐怖75页，由（英国）议会俄罗斯委员会发行，1909年由伦敦Methuen出版社出版。（关于沙皇针对政治反对派的恐怖活动的报告；绝版）。

英语小册子

《无政府主义：哲学与理想》。自由出版社，伦敦。
（演讲稿修订本；重印于本卷中）。

《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基础和原则》，35页，自由出版社，1891年。另由联谊出版社出版，伦敦，1899年。
（本卷重印）。

《无政府主义道德》，36 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09 年；美国版，大地母亲出版公司，1916 年。（重印于本卷中）。

《对年轻人的呼吁》。16页，自由出版社，伦敦；Kerr and Company，芝加哥，1899年。1880年6-8月为Le Révolté（巴黎）撰写；1884年由H. M. Hyndman翻译，伦敦正义出版社出版。（重印于本卷中）。

巴黎公社·16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09年；自由图书馆，爱荷华州，1896年。

《征用》。39 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09 年。
（转载自《面包与自由》）。

《法律与权威》，第23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886年。（重印于本卷中）。

《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进化中的地位》。16 页，H. Seymour 出版社，伦敦，1887 年。（演讲稿修订本）。

《革命政府》。16页，自由出版社，1892年。（重印于本卷中）。

《革命研究》。31页，《公益报》，伦敦，1892年。译自La Révolte，“Etude sur la Revolution”，但未作为小册子以法文或其他语言出版。

国家：它的历史作用》。42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03年；更好的译本重印于《人或国家》，沃尔多·R·布朗编译的论文集，由B·W·休布希出版，纽约，1921年。

《工资制度》。15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20年。（初版于1889年，转载自《面包与自由》）。

战争 H·Seymour，伦敦，1888年。

《战争与资本主义》，第20页，自由出版社，伦敦，1914年。（转载自《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其他语言

Paroles d'un Révolté.共 343 页，《Le Révolté》1879—1882 年的文章集，由 Élisée Reclus 选编，巴黎，1885 年。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出版的章节（如上所述）有《呼吁年轻人》、《巴黎公社》、《战争》、《革命政府》、《法律与权力》和《征用》。最后一章也作为《面包与自由》中的一章出现。《起义精神》的新译本出现在本卷中。未翻译的章节有《国家的解体》、《革命的必要性》、《下一场革命》、《政治权利》、《即将到来的秩序》、《理论与实践》、《革命的少数派》、《代议制政府》、《土地问题》和《所有社会主义者》。

《监狱》。（对一篇演讲稿的修订；译文刊载于本卷中）这篇演讲稿也刊载于俄文版和法文版《监狱》中，但有一些改动。

《有组织的复仇被称为正义》，16 页，Temps Nouveaux，巴黎，1901年。

La Science Moderne et L'Anarchie.402 页，P. V. Stock et Cie. 出版社，巴黎，1913 年。其中包括《La Science Moderne et l'Anarchie》，136 页；

《Communisme et Anarchse》，32 页；《L'Etat: son rôle historique》，63 页；《L'État Moderne》，102

页；以及《Herbert Spencer: sa Philosophie》，25 页。这些文章中的大部分以前都以单独的形式出现过，并被翻译成几乎所有文明语言，尤其是《国家：历史的角色》。

《Un Siècle d'Attente: 1789-1889》。32页，La Révolté, 1893年。

Syndikalismus und 无政府主义. 11 页，Der Syndikalist, 柏林，1908 年。此文摘自《新时代》（Les Temps Nouveaux），法文和英文版均未以小册子形式出现。

《Les Temps Nouveaux》，63 页，La Révolté, 巴黎，1894 年。

面包与自由

这是克鲁泡特金对自由合作趋势最透彻的研究，自由合作是废除资本主义、阶级控制、工资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最佳手段。它只涉及经济和政治因素，主要是生产和分配的重组。根据历史上自愿合作作为实现大自由的动力的例子，分析了当前的弊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行性正是建立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之上。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论证一个观点——极其简单明了——即工人无需借助国家来夺取经济权力。当然，他与国有社会主义 (state socialism) 者进行了论证，并补充了他对集约化农业和去中心化的工业的看法。

伦理

这本书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笔记整理而成，并在他死后出版，是对1904年至1906年间发表在伦敦《十九世纪》杂志上的文章的阐述和发展。

在追溯了自然界和原始人的伦理原则之后，克鲁泡特金介绍了伦理理论和教义的历史，首先是古希腊的伦理理论和教义，其次是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的伦理理论和教义。他讨论了正义观念的演变、社会主义伦理、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等，最后说明了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伦理学的必要性。

克鲁泡特金否认道德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联系，并试图建立纯粹的科学基础。他的伦理理论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团结，因为他认为团结和平等是建立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因此，他的公式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道德。”

田野、工厂和车间

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是对1888年至1890年间撰写的杂志文章的修订。书中讨论了“工业与集约农业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会给文明社会带来的好处”。

原初追溯制造业从英国和法国的克鲁泡特金中心逐渐扩散的过程，克鲁泡特金得出的结论是，每个国家都将依次成为制造业国家，因此，每个地区都必须成为自己的制成品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对集约农业成果的研究，他还得出结论：“空间和劳动经济”，即机械和手工劳动的结合，几乎可以使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大部分原材料。此外，通过在农业中更多地使用应用科学，以及通过将电力方便地输送到离其源头很远的地方，消除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将使“综合人类活动”成为可能。

全面的技术教育和“综合”教育将取代把社会划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做法，把这两种活动结合起来。其结果是，人类的努力将更加经济，个人生活将更加平衡，人类不同的和沉睡的能力将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发展，从而获得幸福。

因此，乡村和城市、工厂和实验室、车间和工作室将不再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相反，这些活动将同时成为个人未来综合生活的组成部分。

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之所以撰写这部法国大革命史，是因为克鲁泡特金认为以往的历史学家完全忽视了使这场革命如此重要的两个基本因素——筹备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赋予这场革命力量的群众。除了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外，它的优点还在于通篇贯穿了一种独特的解释。它与无政府主义宣传毫无关系；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在其中只字未提。它是忠实的历史阐释，是克鲁泡特金唯一的同类作品，被许多人视为他的最高成就。

互助论

这项科学研究是克鲁泡特金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整个《智慧的少数派》都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它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的回答，其直接灵感来自对赫胥黎对达尔文主义解释的反叛。克鲁泡特金书中提出了物种内部相互合作的原则，认为这是生存、保护和进步的主要力量。其中一章专门论述了这一原则在动物社会中的影响，其余章节则对这一原则从原始部落至今的发展和力量进行了历史研究。虽然没有任何宣传，但无政府主义哲学显然是基于对社会生活的这种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题观点时说：“对于个人的进步来说，就像每一个人征服自然一样，互助和密切的交往一如既往，比相互斗争有利得多。”

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

本卷重印了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后来的法文修订版对其进行了扩充。该书还发表了另外三篇研究报告——《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现代国家》以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只有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国家》是一部关于国家起源和功能的历史研究，主要以中世纪的欧洲为研究对象，当时现代国家兴起并摧毁了自由市镇。克鲁泡特金不仅将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市镇，而且将希腊的自由市镇视为艺术、思想和福祉的自然激发者，正是这些激发者使自由市镇具有了重要意义。他认为国家是创造力和自由主动性的破坏者，他说：“在我们文明的整个历史中，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直在冲突：罗马传统和人民传统；帝国主义传统和联邦主义传统；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

当然，这项研究是针对国家及其臣民的各种形式的自由联邦的论证。

在《现代国家》一书中，他继续研究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国家保护下垄断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英国和德国。他还阐述了战争在使大众贫困和使富人更富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说，国家不能帮助群众获得自由，现代宪政形式的

国家也不能帮助群众获得自由，君主制形式的国家也不能帮助群众获得自由。因此，任何加强国家、扩大国家权力或职能的企图都只会加重对人民的奴役。

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他以新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熟悉的原则，并就孤立的共产主义社区为何会失败、家庭是否是性关系的必要基础以及共产主义下的个人自由问题提供了补充材料。